

● 易学智慧丛书

易 学 与 建 筑

韩增禄 著

沈 阳 出 版 社

题辞

阐发易学的精湛思想
深研天地人三才之道

张岱年



一九九六年六月

易学智慧丛书编委会

主 编 朱伯崑

副主编 刘长林 郑万耕

序

任继愈

《易经》这部书幽微而昭著，繁富而简明。五千年间，易学思想有形无形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人生哲学。

《周易》经传符号单纯（只有阴阳两个符号），文字简约（约两万四千余字），给后代诠释者留出驰骋才学的广阔天地。迄今解易之书逾数千家。近年已有光电传播媒体，今后阐释易学的各种著作势将更为丰富。

历代有真知灼见的易学研究者，从各个方面反映各时代、各阶层的重大问题。前人研究易学的成果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研究易学，古人有古人的重点，今人有今人的重点。今天中国人的使命是加速现代化的步伐，迎接二十一世纪。

易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也要为文化现代化而做贡献。当代新易学的任务之一是摆脱神学迷信。易学虽起源于神学迷信，其出路却在于摆脱神学迷信。凡是有生命的文化，都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中，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大到社会治乱，小到个人吉凶，都想探寻个究竟。人在世上，是听命于神，还是求助于人，争论了几千年，这两条道路都有支持者。

哲学家见到《易经》，从中悟出弥纶天地的大道理；德国莱布尼兹见到《易经》，从中启悟出数学二进制的前景；严君平学《易经》，构建玄学易学的体系；江湖术士不乏“张铁口”、“王半仙”之流，假易学之名，蛊惑愚众，欺世骗财。易学研究走什么道路，是易学研究者普遍关心的大事，每一位严肃的易学研究者负有学术导向的责任。

本丛书的撰著者多是我国近二十年来涌现的中青年易学专家，他们有系统的现代科学训练的基础，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有严肃认真的学风，易学造诣各有专攻。这部丛书集结问世，必将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助于易学健康开展，为初学者提供入门津梁，为高深造诣者申一得之见以供参考。

这套丛书的主旨，借用王充《论衡》的话——“疾虚妄”。《论衡》作于二千年前，旧迷雾被清除，新迷雾又弥漫。“疾虚妄”的任务远未完成。如果多数群众尚在愚昧迷信中不能摆脱，我们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精神文明就无从谈起。我们的任务艰巨而光荣。

本丛书的不足之处，希望与读者同切磋，共同提高。

自序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历来被尊为群经之首。其易道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于中华文化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建筑文化在内，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文化的概念，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演变的。在中国古代，文化指的是文治与教化。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文化（Culture）概念，是与自然（Nature）相对而言的，泛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有别于纯自然的东西。其中，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劳动产品。狭义的文化概念，特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易学文化，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建筑作为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人工自然物和人工自然环境，它既是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有其精神方面的文化内涵。就狭义的文化概念而言，易学文化本身，就包括了建筑文化。在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建筑体系中，中国建筑之所以被公认为是独立发展之历史最悠久、风格最统一、特点最显著的建筑体系，

也是唯一能够延续至今的建筑体系，同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建筑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和立体的文化，它不仅涉及经济、科学、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的诸多因素，而且还具有哲学、美学、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宗教学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造就了中国建筑，中国建筑体现了中国文化。

《周易》的经、传中有许多记载都直接涉及到建筑问题。

在中国的历史上，《周易》是最早论及建筑起源及其基本功能的一部经典。《周易·系辞下传》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上古时代，人们冬天居住洞穴，夏天露宿野外。后来，圣明之人建筑了房屋，上有栋梁，下有椽檐，用以遮风避雨。从卦象而言，这都是取法于大壮卦。大壮卦的卦象为乾下，震上，其下方的四个阳爻（—）象征着栋梁，上方的两个阴爻（--）象征着铺在椽檐上的茅草。若用最早的阴爻符号（∧）来表示的话，大壮卦的卦象即为如下所示：

这样的大壮卦象，恰似一座从侧面看去的房屋。就大壮卦所象征的自然现象而言，其上卦为震，象征着“雷”，其下卦为乾，象征着“天”。震卦之性为“动”，乾卦之性为“健”。震为“雷”，乾为“天”。天上打雷，谓之大壮。



大壮

壮。上有剧烈之雷动，下有刚健之苍天。这好比是上有雷雨

隆隆、风雨交加，下有刚健严实的房屋建筑，足以遮风避雨。

此外，在《周易》的经文中，还有许多与建筑直接相关的记载。诸如：

“屋”，即房屋（丰卦，上六“丰其屋”）；

“庐”，即房舍（剥卦，上九“小人剥庐”）；

“栋”，即梁檩（大过卦，“栋挠，利有攸往，亨”、九三“栋挠，凶”、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户”（丰卦，上六“窥其户”）；

“门”（同人卦，初九“同人于门”）；

“牖”，即窗（坎卦，六四“纳约自牖”）；

“庭”，即院（夬卦，“扬于王庭”；艮卦“行其庭，不见其人”）；

“门庭”（明夷卦，六四“于出门庭”；节卦，九二“不出门庭”）；


“户庭”（节卦，初九“不出户庭”）等等。

其中，“门”、“户”的主要功能，在于通风与供人出入；“牖”的主要功能，在于采光；“庭”院，则是一个内外有别的活动空间。“栋挠，凶”、“栋隆，吉，有它吝”，则反映了梁檩的弯曲与隆起在结构功能上的利弊。

上述文字，从易卦之自然取象的角度，谈到了建筑的起源，阳宅的庭院、门窗、栋梁结构，及其预防来自自然方面侵害的遮风避雨的基本功能。

在《周易》中，还谈到了关于预防来自社会方面侵害的

建筑功能的记载。《周易·系辞传下》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意思是说，设置多重的门户，并敲击木梆巡夜，以防备外人侵入，就卦象而论，都是取法于豫卦。豫卦的卦象为坤下，震上，即：

其中的五个阴爻象征着多重之“门”，中间一个阳爻象征着巡夜打更的人。就豫卦的自然取象而言，其上卦为震，象征着“雷”；其下卦为坤，象征着“地”。地上之雷鸣，象征着敲击木梆的声音，相当于预防

豫

强盗的警戒措施。在这里，“门”具有阻止、禁止、与防卫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说，“门”与艮卦的象征又有密切关系。《周易·说卦传》曰：“艮为山，……为门阙，……为阍寺”。艮象征着山，因而有阻挡、阻止之义。“阙”，是门楼，高高耸起，其形似山。东汉经学家、文学家许慎（约58—约147）在《说文解字》中说：“阙，门观也”。最初，它具有守望的功能。“阍”，是守门的人。《说文解字》称：因“常以昏闭门”，故而得名。“寺”，同侍，是后宫的宦官、内侍，其职责是禁止闲人闯入。由于“门”特别是“重门”所具有的禁止和防卫的功能，从周代起，在宫城的规划、设计中，就非常重视宫门的设置，并形成了一定的宫门制度。据贺业钜先生考察，从《周礼·考工记·匠人》等文献记载来看，周代已有“三门三朝之制”。“三朝”，由外而内，依次为“外朝”、“内朝”（又称“治朝”）、“燕朝”（路寝之廷或寝宫）。“三门”与这种宫廷的分区规划有关，一座门就是一

个分区的入口。由外而内，依次为“皋门”（最南面的正门）、“应门”、“路门”（又称“毕门”），它们分别为相应宫廷分区的正南门。至隋、唐，又有“三朝五门之制”。到了明、清两代，有关宫廷分区和重门设置的规划、设计，更加严整并趋于完善。在四合院等民居建筑中，重门设置也占有突出的地位。

除了与建筑直接相关的上述记载之外，《周易》的经、传以及研究《周易》经、传的易学中，所蕴含的象、数、义、理等方面的思想观念，对中国建筑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迄今为止，在中国仅以“八卦”命名的聚落、建筑和人文景观就有许多。例如：福建闽南漳浦县的“八卦堡”；台湾高雄县的“八卦村”；台湾彰化县的“八卦山”；新疆特克斯县城之“八卦城”；天津黄崖口关内城之“八卦街”；四川成都青羊宫、河南淮阳县画卦台等地的“八卦亭”；河南开封的“八卦监狱”等等。在历代都城和宫城的皇家建筑特别是在明、清北京城的建筑中，易学文化的影响和体现尤为讲究。探讨易学文化对中国建筑的具体影响，从文化内涵上去认识中国建筑，并力图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正是本书作者的一个努力方向，也是本书所要反映的主要内容。

中国建筑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特殊的外在形式上，更重要的是由此而表达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待中国建筑，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加以简单地否定，也不宜只停留在其外在的形式上，做出某些盲目的模仿或随心所欲的组合。认真地研究和探讨中国建筑的深刻内涵，继承和发展中

国建筑的优良传统，并融合外来建筑的长处，可以为创造新时期的中国建筑开拓思路。本书在理解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内涵方面，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其目的不过是抛砖引玉罢了，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兴趣，通过共同的研究和探讨，以更好地理解历史，开拓未来。

易学对中国建筑的影响，往往是以中国古代特有的堪舆之学即风水理论为中介的。这里，首先就有一个关于风水的评价问题。对于风水的评价，至今都是毁誉交加、莫衷一是的。评价风水所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风水是不是迷信？”

首先，这里有一个问题的提法问题。按照上述问题的提法，只能有“是”、“否”两种回答。然而，无论采取那一种回答，都难以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楚。因为，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只适用于那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对于复杂的问题，除了“非此即彼”之外，还应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而风水问题，恰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可以把上述问题转换一个提法。并加以适当地分解。例如，风水理论是怎样产生的？在风水理论中，哪些是属于神秘主义的成分或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哪些是属于经验性的知识并具有科学研究意义的东西？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在这里，除了认真地去作扎扎实实的考察和研究之外，一切神话、空话和大话都是无济于事的。为此，本书在进行有关讨论的时候，在考虑到行文可读性的同时，尽量列出其相应的文献依据。以求雅俗共赏。

其次，这里还有一个观察事物的角度与视野问题。早在战国时期，思想家荀子（约前 313 - 前 238）就曾经说过：“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荀子·天论》）意思是说，求了雨，接着就下雨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回答是：没有什么缘故，这和不求雨而下雨是一样的。日月食了，人们就设法去抢救，天旱了就设法去求雨，还有通过卜筮然后决定大事，这种举动并不是说明以为真的会求得什么东西，不过是君王为了表示重视灾害，用以顺应人心的一种文饰罢了。所以，君子认为这是一种文饰，而百姓却认为当真有神。把这些看作是一种文饰的，会收到好的效果；若是认为当真有神，就会招致坏的结果了。若将这里的“文饰”之“文”，转义为“文化”之“文”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借用荀子的这一说法，来形容人们对待风水问题的不同态度与不同后果。把风水作为文化来研究，可以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途径，从中受益；反之，把风水奉为神明去盲目崇拜，就会因之而受害。

事实上，对于风水理论，无论是盲目崇拜还是简单否定，都不需要做甚么研究，也都不需要甚么学问。但是，盲目地崇拜，会导致迷信，并且会使人上当受骗而身受其害；简单否定，也难以在破除迷信、唤醒民众方面收到应有的实效。对于有关的诸多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以求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从中获得启发，从而收

到温故而知新之效，则是一件有益而无害的事情。然而，这就需要认真地做大量的和系统的研究工作。

其三，这里还有一个分析事物的方法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历史分析的方法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的精神文化（包括科学在内的）大都起源于巫术。中国文化，也不例外。从中国古代典籍的记载来看，最初，人们对许多事情的决策，都是通过卜筮而做出的。例如，军事行动，靠“卜战”而定；一般事物，靠“卜事”而定；建筑选址，靠“卜地”、“卜居”或“卜宅”而定；对疾病的治疗，有所谓“巫医”；对天象的认识，有所谓“占星”等等。后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许多领域已经逐步地相继摆脱了这种幼稚的状态。在军事问题上，摆脱“卜战”而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孙子兵法》的诞生。在对于一般事物的判断决策上，以《易传》的诞生为标志，《周易》已经从最初的卜筮之书变为人生哲理的无咎寡过之书。在医疗疾病方面，医术逐步取代了巫术。在建筑领域，也逐渐由单纯的“卜地”、“卜宅”向“相地”、“相宅”即考察其天文、地理、气象等自然环境方面过渡。后来，在一些建筑专著，例如明代计成的《园冶》中，虽然沿用了“卜地”之词，却已非其原初之义了。此外，一些思想家很早就对“卜地”中的迷信行为进行了质疑和批判。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王充（27-97）在《论衡·诂术篇》中，就对风水问题进行了无神论的分析和评价。

其实，源于“卜地”、“卜宅”的风水理论，既是古代先

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于生活经验的总结，也是他们对于复杂现象认识之历史局限性的记录。由于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中有些神秘性的猜测和断语一直流传了下来，并在民间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中国教育界相继建立起来的建筑学专业，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建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风水理论，一向难登大雅之堂。再加上，由于风水理论长期以来主要是流行于建筑工匠之间，甚至是被一些江湖术士作为骗取钱财的手段，因而，其内容鱼龙混杂，其价值鲜为人知。正如许多人一提起《周易》只知道与占卦算命有关，而不了解其真正的价值一样，许多人一谈到“风水”除了认为是一种迷信之外就再无下文了。这样，迷信风水者，仍然是盲目信仰；“批评”风水者，也就非常省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科学的方法，对风水理论进行历史的和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就成为新的课题了。近年来，有关风水的书籍和文章逐渐多了起来。但就其内容来看，却又存在着较大的层次差别。除了那些非学术性质的“时尚”之作以外，其中，难能可贵的是，有许多专家学者已经从建筑、历史、社会等不同的侧面，对风水问题进行了学术性的考察和探讨，并在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本书由于题目范围之局限，虽然不能对风水理论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和分析，但又离不开对有关风水问题的讨论。凡涉及风水理论之处，如同涉及其它领域的学科知识一样，作者在吸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做出自己的探讨，

以就教于学人。

易学与建筑的相关，其内容十分广泛。由于篇幅所限，本书只能就其中的部分题目进行讨论，因而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弊。同时，本课题涉及到易学、建筑学、中国建筑史、中国城市建设史以及风水理论等诸多方面的学科知识，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其中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予以匡正。

最后，本书之所以能够迅速地同读者见面，同朱伯崑教授、董光壁研究员等友人的推荐和支持，以及沈阳出版社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此，谨致谢忱！

韩增禄

1996年6月9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自序

第一章 天人合一与建筑境界

1 天人合一的建筑哲学

三极之道与堪輿之学/天时地利与建筑选址/法地则天与建筑象征/天人观念与测量工具

27 崇尚和谐的理想境界

天人之和的园林建筑/内和外安的皇宫建筑

第二章 自然方位与建筑环境

40 辨方正位的建筑原则

辨方正位,以正朝夕/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46 丰富多彩的自然方位

天文空间方位/地理空间方位/四季时空方位/八风气象

方位/自然阴阳方位

第三章 文化方位与建筑象征

76 河洛方位

河图方位/洛书方位

83 易卦方位

先天八卦方位/后天八卦方位/十二月卦方位

92 八门方位

93 四门方位

97 四德方位

101 五行方位

正五行方位/八卦五行方位/天干五行方位/地支五行方位

107 五色方位

京师之地，分为五城/八旗拱卫，方位相胜/社稷坛台，五方五色

111 二十四山方位

113 文化阴阳方位

易卦方位，阴阳分明/传统习俗，左阳右阴

118 大游年方位

八门套九星变爻大游年原理/八门套九星变爻大游年方位

第四章 方圆意识与建筑造型

126 方圆意识的自然象征

尊崇天地的自然文化/象征天地的方圆文化

131 方圆意识的社会象征

体圆法方，其国乃昌/苍璧礼天，黄琮礼地/规天为圆，矩地取法

137 方圆意识的建筑象征

方圆造型的坛庙建筑/体法方圆的明堂建筑/内圆外方的城门建筑/上圆下方的龙井结构/天地相交的方圆建筑/地久天长的方圆建筑/等级分明的方圆造型

第五章 易学象数与皇家建筑

153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

以“三”为根本的易学文化/以“三”为象征的中国建筑

158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天德用九/象征用九/建筑用九

173 飞龙在天，九五至尊

176 至哉坤元，用六永贞

180 阴阳象数，法地则天

圜丘方泽，阴阳分明/朝日夕月，阴阳各异/宫殿建筑，阴阳有序/景山五亭，众阴捧阳/干支象数，阴阳对应

193 河图象数，精心营筑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八九门钉，精妙绝伦

第一章

天人合一与建筑境界

建筑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一种人工自然物和人造自然环境，建筑活动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同人们对“人与自然界”的认识密切相关。在人类的历史上，以易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有着独特的认识和追求。这种认识和追求，在建筑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具体体现。

天人合一的建筑哲学

“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称作“天人关系”，又叫作“天人之际”。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据说，孔子（前 551 - 前 479）作《春秋》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陈述天人关系。所谓“孔子作《春秋》，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春秋纬·握诚图》）战国思想家庄子

(约前 369 - 前 280) 认为, 能够认识到什么是天的作为, 什么是人的作为, 就是最高的见识了。所谓“知天之所为, 知人之所为者, 至矣。”(《庄子·大宗师》) 汉代, 史学家司马迁作《史记》, “亦欲以穷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把探究天人关系作为其首要的宗旨。汉朝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前 53 - 18) 则认为, 能够通达天地人之道理的人, 才可以称之为儒者; 只通天地之道而不通人道者, 只能算作是有一技之长的匠人。所谓“通天地人曰儒; 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法言·君子》) 《淮南子·主术训》曰: “遍知万物而不知人道, 不可为智”。北宋哲学家邵雍甚至认为: “学不际天人, 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 做学问若不涉及天人关系, 就称不起为学问。中国古代对“天人关系”的重视程度, 由此可见一般。

在“天人关系”上, 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见解, 就是“天人合一”。即: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与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种观点, 萌芽于西周时代的天命论, 发展于战国时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 “万物一体。”(《庄子·德充符》) “万物一也”, “故曰: ‘通天下一气耳。’ 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 《吕氏春秋·有始》曰: “天地万物, 一人之身也。此之为‘大同’。”这里, 明确地把天地万物看作是统一的有机体。荀子说: “天地者, 生之本也。”(《荀子·礼论》) 他在《天论》中认为: “万物为道一偏, 一物为万物一

偏，愚者为一物一偏”。即“万物”是“道”的一部分，“一物”是“万物”的一部分，“愚者”（即作为个体的人）为“一物”（即人类）的一部分。荀子进一步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自然界的运行是有规律的，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不是因为有了贤明的君主才存在的，也不会因为有了残暴的君主而灭亡。以合理的行为对待它，就能收到好的结果；以错乱的行为对待它，就会招致凶险的结果。并且强调地说：“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即人们在社会混乱时期所遇到的天时，和在太平时期所遇到的天时是一样的，然而人们所遇到的祸殃却与太平时期大不相同，这是由于乱世而引起的，不能怨天。明白了自然与社会的区分，明白了天灾与人祸的区分，就是一种最高的智慧了。荀子在这里说的是，应当认清天道与人事、天灾与人祸、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而不能把由于社会原因而招致的灾祸归咎于天。这是对上述“天人合一”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到了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前180—前115）明确提出了“天人之际，合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宋代以后，“天人合一”的观点，几乎为各派哲学家所接受。北宋哲学家张载（1020—1077）认为，世界的本原以太虚，太虚就是气，天人合一的基础就是气。既肯定了人与自然统一于物质性的气，又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明、清之际，清思想家王夫之（1619—1692）继承了张载的天人合一

思想。






这种强调天与人之间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天人合一”的观念，可以说是数千年来中国农业文化的产物。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的。农业生产的一大特点，就是“靠天吃饭”，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吕氏春秋·审时》曰：“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庄稼，种它的是人，生它的是地，养它的是天。《黄老帛书·君正》曰：“人之本在地”。土地，是人的根本。人以土为本，以水为命，顺天时，因地利，靠人和，这是农业文化的特点。中国古代的先民，之所以如此重视“天人关系”，之所以把天、地、人看作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与这种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三极之道与堪輿之学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周易》一书中，就有过许多的体现。所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周易·序卦传》）。这里，把有男女之分的人，视为天地万物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周易·系辞上传》）即六爻的变动，就体现了“三极”的道理。“三极”，乃“天、地、人”三者的总称，又称作“三才”。“易之为书也，广大备悉，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

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周易·系辞下传》）《周易》作为一部书，其内容广博宏大，世上的各种道理无所不备，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三画卦，象征天、地、人“三才”，再将两个三画卦重叠在一起成为六画卦；而六画卦并无其它含义，而是各以阴阳匹配之两爻象征天、地、人“三才”的道理，见表1。

表1 易卦爻位的名称、性质及其三极象征对照表

易 卦 爻 位		爻位名称	爻位性质	三极象征
三画卦	六画卦			
		上	阴	天
		五	阳	天
		四	阴	人
		三	阳	人
		二	阴	地
		初	阳	地

《周易》是“三极之道”、“六位成章”的学问。《周易》六十四卦，是由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按照六画为一卦的原则而组成的、兼天地人“三极之道”为一体的符号系统。《周易》谈天说地，主要是讲人生；讲人生哲理，又从不脱离天地之道。不仅如此，《周易》之中，还体现着人与天地自然的统一。这种观念，同《老子》所说的

“自然无为”，是一致的。在老子哲学中，“无为”即“自然”；“无为”，是相对“人为”而言的；“人为”，即违反“自然”。老子哲学认为，宇宙间有“四大”，即：“道”、“天”、“地”、“人”。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周易》同样主张师法自然、法地则天。

《周易·乾·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所谓“大人”，指的是其思想行为与天地之道相合、与日月之明相同，其动静进退同四季更替一样井然有序，其扬善惩恶与鬼神所降之吉凶相当的人。这里所说的“鬼神”，“不是宗教迷信的鬼神，所指乃造化之迹，亦即自然规律的功用。吉凶不过是成败得失而已。”^① 这样的德行，谓之天德、君德。中国古代的先民认为，只有这样能够贯通三才之道、能够知天命（即自然规律）的人，才有资格成为管理天下之君王。这就是所谓的“内圣而外王”。

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和法地则天的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建筑理论即堪舆之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堪舆之学，又称为风水理论。堪舆与《周易》之间，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两者都是关于天地之道与人道之间相互关系的学问。据史箴先生考察，在汉代前期淮南王刘安主持其门客所著的《淮南子·天文训》中，就有所谓“堪舆徐行”之说。

①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31页。

从其上下文来看，全文主要说的是天地运行之道，及其相应的月令阴阳变化。这里所说的“堪輿”，其本义应为天地之道。司马迁在《史记·列传第六十七·日者传》中，言及当时卜筮者中有“堪輿家”，并且说，自古有卜筮者，而“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时，顺于仁义，分策定卦，旋式（按，即拭盘）正棊，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盖当时之“堪輿家”，不外以天地之道，占卜日辰吉凶者流。西汉末年，扬雄作《甘泉宫赋》。其中，有“属堪輿以壁垒兮”的句子。此处的“堪輿”，与《淮南子·天文训》及《史记》中“堪輿”之义同。东汉初年，史学家班固（32-92）作《汉书·艺文志》，始见有堪輿专著的记载，谓之“《堪輿金匱》十四卷”。其奥旨与《史记》所述相同。至唐代，学者颜师古（581-645）在注《汉书·艺文志》中“《堪輿金匱》十四卷”时说：“许慎云：堪，天道；輿，地道也。”（今本许慎《说文解字》无此语）此解说与上述诸多关于“堪輿”之记载相符。因此，“堪輿”之本义，即天地之道；堪輿之学，即天地之学。它主张“法天地，象四时”。将堪輿学用在建筑上，就意味着从建筑的选址到建筑的规划、设计和营造，都要周密地考虑到天文、地理、气象等环境因素，从而创造出兼天时、地利、人和为一体的良好的居住环境，以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

堪輿学所涉及的环境，相对而言，大体上可分为如下两类：其一，是自然环境；其二，是文化环境。前者，是利用各种各样的自然因素，所营造起来的实实在在的客观自然环

境；后者，是依据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相应的文化心理之需求，所建构出来的妙在其中的行为心理环境。前者，体现了古代先民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对生活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后者，体现了古代先民在精神领域中的执着追求，并残留着古代先民由于对诸多复杂现象的认识局限，而做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和猜测。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人们所追求的上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或者是作为建筑的自然环境而被物化出来，或者是作为建筑的文化环境而被蕴含其中。

● 天时地利与建筑选址

谈到人类建筑，首先就有一个选址的问题。在住宅、村落、城镇等聚落地址的选择方面，堪輿学（风水术）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主要体现为如下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相形取胜”。

所谓“相形取胜”，就是通过对山川地貌、地形地势等自然景观方面的观察比较，而选用其优胜之地。按照这一原则，堪輿学关于聚落选址的最佳格局，可用六个字来表达，即：“背山、面水、向阳”。堪輿学家关于建筑选址的问题，有一句话，叫做“前要照，后要靠”。“照”，就是照水；“靠”，就是靠山（又称背山）。向阳，则背阴；面南，则背北。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背山，可以阻挡冬天北来之寒流；面水，可以迎接夏天南来之凉风；向阳，可以取得良好

的日照。同时，近水还可以获得必须的生活用水、灌溉用水，以及方便的交通、天然的水产等便利的生活条件。由于背山而形成的缓坡地形，又便于雨季排水，以免水涝之灾；山上的植被，又利于水土保持，以调节局部的小气候；山上的果树林木，又可以提供建筑所用之木材、燃料所需之能源，生活所需之干鲜山果等物品。由此可见，按照这一原则所选择的建筑基址，有利于形成优越的小气候和良性的生态循环，是有益于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的一块吉祥福地^①。在这样一个自然环境中安家落户，上应天时，下取地利，必然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此外，这种优越的自然环境，再加上精心设计的人工建筑，还有利于形成一种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简而言之，凡是有人之所在，都需要一个适当的生活环境。其中，水和阳光甚为重要。人没有水不行，阳宅（活人居住之所）如此，阴宅（即陵墓）亦然；陵墓虽是死人安居之所，也是活人凭吊之处，一些皇亲贵族的陵墓，还长期驻有看坟之人。他们都需要最起码的生活用水。人没有阳光也不行，世俗之人如此，出家之人亦然。其中，与阳光充足与否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方位坐向问题（详见本书“自然方位与建筑环境”部分）。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从京师到村镇，从皇宫到民居，从阳宅到阴宅，从道观到寺庙，其选

^① 参见《天津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建筑学专辑——风水理论研究”，第26-30页。

址均以背山、面水、向阳之所为最佳。例如，就都城而言，周代的王城洛阳，北靠邙山南临洛河；明清北京城，北靠燕山南临永定河。在清代名著《日下旧闻考》一书中，前面有四卷的篇幅，都是用来论述北京之“形胜”的。此外，历来的城市也大都建在渡口附近。就陵墓而言，从明代北京十三陵到清代北京东、西陵，都是坐北向南的背山、面水、向阳之所在。就道观寺庙而言，河南登封的中岳庙和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奉先寺，都是坐北向南的背山、面水、向阳之所在；山西浑源的悬空寺、大同的云冈石窟，甘肃的敦煌石窟等，都是坐西向东的背山、面水、向阳之所在。就民居而言，至今在中国所处之地理纬度上，依然是以坐北向南的背山、面水、向阳之处为最好的自然环境。在风水术中，有“穴位”之说。风水论穴，是一种比喻：“盖犹人身之穴，取义至精”。“穴者，山水相交，阴阳融凝，情之所钟处也”。^①

“相形取胜”的基本原则，在历来的都城选址中，还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在经济上，一般都选在京畿物产丰富之处，以利于保证城市人口的生活供应；在政治上，大都选在与各地方之间交通方便之处，以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在军事上，还要考虑到周围的有利地形等因素，以利于国家社稷之安全保卫。

此外，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还提出了有关建筑选址的

① 参见《天津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建筑学专辑——风水理论研究”，第89页。

许多禁忌。其中，有些禁忌，虽然也带有明显的神秘色彩，但实际上却是对于长期生活经验的一种概括和总结。《阳宅十书》曰：“凡宅不居当冲口处。不居寺庙。不近祠社窑冶官衙。不居草木不生处。不居故军营战地。不居正当流水处。不居山脊冲处。不居大城门口处。不居对狱门处。不居百川口处。”“凡宅居滋润光泽阳气者，吉；干燥无润泽者，凶。”等等。其中之道理是不难理解的。以“凡宅不居当冲口处”为例。所谓住宅“居当冲口处”，是指宅院大门正对着车马行人来来往往之大街的要冲。身居这样的宅院，一开门就会遇到迎面而来的车马行人，出门时会令人有一种不安全感，有悖于人们所愿望的“出门见喜”或“开门大吉”。因此，以前人们开设院墙大门时，往往是尽量避开这一方位；或者在这一方位上，不建住宅，而建一小庙什么的。若是因周围的条件限制实在难以避开这一方位的话，就只好在门前立一块石板，并刻上“泰山石敢当”（或简称“石敢当”）、“姜太公在此”之类的文字，借以壮胆和自我安慰了。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有一个行为建筑学、环境心理学与建筑心理学的问题。又如，《阳宅十书》中所说的“凡人家屋角不可漫街，主招讼祸。”所谓屋角“漫街”，是说住宅房屋的墙角两面临街。这样的住宅，由于其墙角直接暴露在大街上，就容易被来往的车辆所撞伤，从而会损坏墙体。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自然就容易引起口角争讼之事了。

在风水理论中，建造于某些自然环境禁忌之地的住宅，被称作“凶宅”，民间又称作“鬼屋”、“癌屋”等。这是一

种无论什么人住进去，都会使人生病的房屋。现在，根据科学的测量和分析，已经证明，这是由于其地下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氡气或强电磁辐射，或者是由于其建筑材料中就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类似辐射的缘故。氡是唯一的天然放射性气体，它是铀、钍等放射性元素在衰变过程中的中间产物。所以，富含铀、钍的花岗岩、辉绿岩等都能产生氡。地层深处的氡还可以通过地质断裂带和地下水流向上运动，进入大气圈。有些受工业污染的煤渣中，就含有一定剂量的化学元素氡。研究表明，室内的氡有96%来源于地基，其余来自带有放射性的建筑材料。室内氡的放射性剂量超过一定的标准，就会损害人体健康。高剂量的氡可以导致肺癌、白血病和呼吸道病变。据美国统计，每年的肺癌死亡者之中大约有8-20%的人是由氡所致。其危险度已经超过交通事故。现在，“氡”已成了“藏在屋内的杀手”^①。此外，科学研究表明，在强电磁场（包括地下的和地上的）附近，也不宜建住宅。电磁污染是一种很厉害的物理污染，被称作“电磁魔鬼”。它能够扰乱人体的内分泌机制，特别是对于孕妇极为不利。风水中还有所谓不宜在“太岁”头上动土的说法，这里所说的“太岁土”，在地质学上叫做膨润土（俗称膨胀土）。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遇水膨胀；吸满水之后，其体积能成倍地增大。脱水之后，其体积又会相应地缩小。在这种土质上建筑地基，房屋会不牢靠的。即便是在建筑材料中混

① 参见《光明日报》1995年6月23日第4版的有关报道。

进了膨润土，其房屋也是会裂缝的。上述这些发现，都使得人们对于中国古老的风水理论不得不另眼看待。因此，对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凶宅，的确是不可大意的。

只要自然环境是好的，至于在文化环境意义上的所谓“凶宅”，就不必太认真了，所谓“画匠不给神磕头”。否则，就会陷入迷信的。对于迷信之人来说，即便是自然环境很好的住宅，只要有人说是凶宅，他住进去之后也会闹心病的。心病闹久了，也会导致身体不适的。有的人闹了病之后，甚至会更加迷信。

二、“相土尝水”。

这是堪輿学在建筑选址方面，有关水土质量的一个基本原则。直到今天，民间还流传着“水土不服”的说法。所谓“水土不服”，主要是就水土质量而言的。指的是，当地的水土成分与人体的需要不相符合。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某些地方病的发生同当地的水土质量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据《吕氏春秋·尽数》记载：

轻水所多秃与癭人，重水所多尪与臂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伧人。

其中，“癭”是中医所说的生长在脖子上的一种囊状瘤子，主要指甲状腺肿大等疾病，俗称大脖子病。“尪”，即肿腿。“臂”，指的是两腿瘤。“疽”、“痤”，二者皆为毒疮。

“𪔐”，即鸡胸。“伛”，即伛偻（腰背弯曲）病。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水轻的地方，多出秃头和患大脖子病的人；水重的地方，多出肿腿和不能走路的人；水甜的地方，多出仪容端庄、美丽的人；水辣的地方，多出长恶疮的人；水苦的地方，多出鸡胸、驼背的人。此外，与这种水质以“甘”为贵的说法相关，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水质以“轻”为贵。按照后一种说法，古人多以江西庐山谷帘水为第一，或以扬子江金山水为第一，而以惠山虎跑泉水为第二。到了清代，很注重养生之道的乾隆皇帝认为：就水质来说，“其味贵甘，其质贵轻”、“质轻者味必甘”。因而，他曾命令内务府特制一银斗，以较量天下各大名泉的水质。较量的结果，发现只有玉泉、伊逊两地之水质最轻，为斗重一两，且质轻而味甘。为此，乾隆还特地写下了《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其文曰：

水之德在养人，其味贵甘，其质贵轻。然三者正相资，质轻者味必甘，饮之而痼疾益寿。故辨水者恒于其质之轻重分泉之高下焉。制银斗较之，京师玉泉之水斗重一两，塞上伊逊之水亦斗重一两，济南珍珠泉斗重一两二厘，扬子江金山泉斗重一两三厘，则较玉泉重二厘或三厘矣。至惠山、虎跑则各重玉泉一分。是皆巡幸所至，命内侍精量而得者。然则更无轻于玉泉之水者乎？曰有。为何泉？曰非泉，乃雪水也。常收积素而烹之，较玉泉斗轻

三厘。雪水不可恒得。则凡出山下而有冽者，诚无过京师之玉泉。昔陆羽、刘伯刍之论，或以庐山谷帘为第一，或以扬子为第一，惠山为第二，虽南人享帚之论也，然以轻重较之，惠山固应让扬子。具见古人非臆说，而惜其不但未至塞上伊逊，并且未至燕京。若至此，则定以玉泉为天下第一泉矣。

.....

在明、清两朝，玉泉山泉水一直都是皇帝御用之水。据说，北京紫禁城内的水质还是比较好的，但皇帝却不饮用。至于紫禁城内初建时打出的七十二眼井，则是为了防火和供太监、宫女一千人等饮用的。明代皇帝去明陵祭祖，后面也跟着取自玉泉山泉水的甜水车。据《宛署杂记》记载：“圣驾谒陵，随甜水车一百辆”。用玉泉水灌溉的稻米、水果，也成了宫廷的御用食品。其中，关于雪水因其水质最轻而贵于玉泉山泉水的说法，在《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萃庵”一节中，就有所反映。其中写到：

黛玉因问：“这也是旧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这么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得的雪，统共得了那一鬼脸青的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回，这是第二回了。——你怎么尝不出来？隔年蠲的雨

水，那有这样清醇？如何吃得！”

《红楼梦》作者的这种以雪水为贵的文学描绘，同乾隆的上述说法如出一辙。

现代科学证明，中国古代人关于水质的这种认识，虽属经验之谈，但却是颇有道理的。人体和其他生物体一样，都是地壳物质演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的物质组成和地壳的物质组成之间，始终都保持着一定的动态平衡。人们经过化验和分析、比较，已经发现：人体血液中 60 多种化学元素的含量，与地壳及海水中同样的化学元素的分布之间，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丰度曲线，也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如果在某一地区地壳中的化学元素分布的不均匀，并且超出了人体所适应的正常变动范围，比如，人体所必须的某种（或某些）化学元素的含量过低或过高，都会引起相应的地方病。^①

中国古代，人们基于上述经验性的朴素认识，在选择聚落基址的时候，非常重视其水土质量。所为“凡立国者，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乘马篇》）这就是说，在城市的建设中，最重要的是与其选址相关的水土质量问题。据《吴越春秋》

① 吴沈春主编：《环境与健康》，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年 9 月第 1 版，第 13—16 页。

记载：春秋时期，吴王阖闾的都城（今苏州城），就是伍子胥受王命而营建的。他首先勘察了当地的土质和水质，即所谓“相土尝水”，而后才选定其地理位置。隋文帝在统一天下之后，之所以决定在汉代长安城的东南方位另建都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长安旧城已建都数百年，城内水量不足，而且，“水皆咸卤”^①。东晋时期，著名的风水师郭璞（276-324）在《葬经》中，曾经强调地指出：“风水之法，得水为上。”古人对水的重视，由此可见一般。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古都（如娄兰古城）之所以被废弃，首先就是由水循环的破坏而引起的。

关于土的质量方面，中国古代，有所谓验土以“土细而不松，油润而不燥，鲜明而不暗”为佳之说，并有所谓用秤称量土重而验之的方法，此所谓“土壤原来有虚实，称量见古书”。按照风水术，确定坐向（又称山向）和穴位之后，还需要开挖验土之深井；在天心十道之处或穴位上所挖者，称之为“金井”。验土的具体方法是：“入土实一斗，称之，六七斤为凶，八九斤吉，十斤以上大吉”。据戚珩、范为先生考察，这一基于“累朝郡邑多废置”的历史经验的相土之法，从今日土力学的角度来看，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相传，郭璞当年曾经相土定址，营建温州城。据《浙江通志》、《温州府志》记载，郭璞相建温州城，“初谋城于江北，郭璞取

① 《中国城市建设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27页。

土称之，土轻，乃过江”。后经权衡，则江南吉，始筑城。此事在温州民间传为佳话，并立祠纪念。经今日地质勘探证实，现在温州城的地质情况也确乎优于江北。

由此可见，古人从实践经验中所总结出来的风水相土之法，即根据土质的轻重来判断吉凶的方法，是有其科学道理的。所谓的吉凶，不过是好坏、优劣的同义词罢了。

三、“藏风聚气”。

北宋张载：“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故聚而有间则风行而声闻具述，清之验与！不行而至，通之极与！”（《正蒙·太和》）清末，王夫之注曰：“神则合物我于一原，达死生于一致，氤氲合德，死而不亡。间，形中之虚也。心之神居形之间，惟存养其清通而不为物欲所塞，则物我死生，旷然达一，形不能碍，如风之有牖即入，笙管之音具达矣。神，故不行而至。至清而通，神之效也。”（《张子正蒙注》）这里，从哲学的意义上论述了气与人的关系。

“风水”一词，语出郭璞所撰的古本《葬经》。其中说道：“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不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较早的《青乌先生葬经》云：“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

建筑选址，除了水、土之外，最重要者莫过于气。古人有所谓“风水以气为主”的说法。并且，把气聚之处称之为“穴”。所谓“夫山止气聚名曰之穴”（《雪病篇四》）。这些经验性的认识，无论是从住宅建筑的外环境而言，还是从其内

环境来说，都是很有道理的。中国古代，人们把宇宙天地之自然环境视为“大宅”。《后汉书·冯衍传·显志赋》曰：“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在风水中，有所谓“人在气中游”之说。

至于风水中所说的“气”究竟都包括些什么内容，人们可以作进一步的考证和探讨。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它应当包括人们通常所说的也是人生所不可缺少的新鲜空气。中医在卫生保健方面，有“生气通天”之说（《黄帝内经·素问》）。这里所谓的“生气”，即有利于人生之气。据说，一个人，七天不吃饭，就会饿死。若有水喝的话，七天不吃饭，也未必就会饿死。但是，一个人若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或者把他的所有呼吸器官都给堵严实的话，又会怎么样呢？不要说几天了，几分钟之内，恐怕就会要命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冠心病”，就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缩小了其内部血液流通的空间，进一步导致了血流量减小、供氧不足，致使全身处于缺氧状态的一种疾病。一座住宅，若处于充满有害气体（如民间所谓的“瘴气”）的外空间之中，或者其室内空间的通风性能不好，即污浊空气出不去、新鲜空气进不来，就无异于使其主人长期地处于缺氧状态。这样，住在里边的人，轻者会生病，重者会致命。即便是气壮如牛的人，也不会例外的。因而，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就“水”而言，极为重视“水口”（包括来自水源的“入水口”和排水而出的“出水口”）；就“气”而言，极为重视“气口”即“气”出入之口。“口、鼻”，为“人体”之“气口”。“门”、

“窗”，为“住宅”之“气口”。《阳宅大全》曰：“门通出入，是为气口”。实际上，“住宅”之“气口”，也是处于其中的“人体”之间接的“气口”。住宅，是人生之根本，是家庭之所在。《黄帝宅经·序》曰：“故宅者，人之本。人以宅为家”。住宅，特别是门户，犹如服装一样，是关系到人体健康的基本因素。《搜神记》曰：“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屋舍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三元经》云：地善即苗茂，宅吉则人荣。……故人之居宅，大须慎择。”

风水中所说的“藏风聚气”，应为避开有害之风与有害之气，而藏聚有利之风与有利之气。按照这一原则，风水术在宏观上，非常注意住宅外部空间的干湿气流和当地季风之方位走向（现在还有一个空气污染的问题）；在微观上，非常重视住宅内部空间的空气质量。正如一位建筑学家所说的那样，“气的空间”是中国建筑区别于西方建筑“灵的空间”的特点之一。住宅建筑，首先应当具有通风、采光、保温、安全等必备的基本功能。否则，对于人体健康是不利的，甚至是很危险的。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条件的改善，室内家用电器的增多，再加上室内装饰之风日盛，真可谓是“富润屋”了。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发生了。诸如，“空调病”、“室内电器综合症”等等。大众传媒对于因室内空间密封程度之提高、室内装饰物品所散发的有毒气体之增加，以及室内通风不畅等原因，而花费钱财、自招其祸、殃及人命的报道，已不止一起。这种违反自然的豪华住宅，无异于一口活

棺材。由于这种违反自然的行为，已经将原来的吉宅变成了凶宅。中国风水中所说的自然环境方面的凶宅，正是指的这种对人体健康直接有害的住宅。据科学调查，室内空气污染的程度要比室外严重几十倍。而一般说来，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室内渡过的。室内空气的新鲜程度，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因而，在现代通风技术中，又有了所谓“室内新风”的专用名词。“新风量”，成了星级宾馆空调设备的一个重要参数。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风水”二字的重要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风水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古老而神圣的涉及天文、地理、气象、生态、景观、城市建筑、住宅建筑等多种学科的综合性的潜科学。

● 法地则天与建筑象征

建筑作为一种人工自然物，它不仅是对自然环境的选择，也是对自然环境的改造。选择自然环境，应当了解其对人体之吉凶利害；改造自然环境，应当顺任其客观的规律性。中国古代所谓的“法地则天”或“法天地，象四时”，就是指人的思想行为要以天地的自然规律为准则而予以效法，要以自然为师、师法自然、与自然规律相一致。这是“天人合一”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观念，除了体现在物化出来的人工自然环境中，还以比喻、借喻、隐喻和象征的方式渗透在内在文化心理环境之中。中国的传统建筑特别

是皇家建筑，往往以宇宙天地之象作为仿效的模本。

中国古代的君王，自秦王政始皆称“皇帝”。据许慎《说文解字》：“皇，大也。”《风俗通义》：“皇者，天。”用“皇”来称乎人，表示其权力其大无比，其行为代表着天的意志。《风俗通义》又曰：“皇者，中也，光也。”《管子》曰：“明一者皇。”这就是说，“皇”是居中心、统万物、神圣而高贵的称号。《说文解字》又称：“帝，谛也，王天下之号也。”《白虎通义》解释说：“德合天地者称帝”，帝的作用乃“表功名德号令臣下者也”。由此可见，“帝”是权力的象征，是上通天地之德下管臣民之众者的称号。“皇帝”，又称作天帝之子，即所谓“天子”，以表明其君权天授之义。因此，历来的皇帝，在其宫城的建筑上，都力图以天象为象征。

传说，当年秦始皇（前 259 - 前 210）在营造咸阳都城时，就曾经运用天体观念来规划城市、仿效天象兴建宫殿。据《三辅皇图》记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秦始皇极端奢侈，在建筑咸阳宫城时，因形就势地在城北高原的位置上营造宫殿，宫居北原高地之上显得更加巍峨壮观。其城门四通八达，以仿效紫微宫为群星拱拜之中央地位来象征皇帝之所居。引渭水横贯都城，以象天河（又称银河、星河、天汉、云汉、银汉）。在渭水之上，又横跨天桥而南渡，以象征牛郎星（又称牵牛星，即河鼓二）和织女星隔河相对之势。据《史记·秦始皇

本纪》记载：秦咸阳都城的规划建设，以城市本体为中心，结合畿内离京别观，“乃令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余道甬道相连”，“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宫室也。”这里，以渭河作天河，以宫殿比拟天体星座，用复道、甬道、桥梁为联系手段，将诸多宫殿按照天体星象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以咸阳县为中心的庞大宫城群，犹如众星辰拱卫天极一般，突出了帝居咸阳县之核心地位。^①

传说，隋、唐时代的东都洛阳城，也是以贯穿全城之洛水来象征天河的。据《地利人子须知》这本风水书中的记载：该城前当龙门山，后靠北邙山，左为瀍水，右为涧水，城中心洛水穿流而过。这种以天上紫微宫为象征的都城建筑形式，一直传到明、清时代。

在明、清北京城中，象征天上紫微垣的紫禁城位居中央；外面是皇城，位于皇城南北中轴线上的南、北二城门分别以天、地命名，曰：“天安门”、“地安门”；皇城外面是内城，内城四周分设“天、地、日、月”四坛；紫禁城内，建筑的规划布局，以及宫殿、宫门的命名，也以宇宙天象为象征。《清宫史续编》称：乾清宫、坤宁宫象征天、地；乾清宫东西两庑之日精门、月华门象征日、月；东、西六宫，合起来象征十二辰；乾东、西五所，合起来象征十天干。如此

^①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论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第127-144页。

等等。

这种以天地自然为象征的建筑规划和布局，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先民特殊的审美心理。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论及“中国建筑的精神”时，对风水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中的应用做了精辟的概括。他认为：“再没有其它地方表现得像中国人那样热心体现他们伟大的设想‘人不能离开自然’的原则……皇宫、庙宇等重大建筑自然不在话下，城乡中无论集中的，或是散布在田园中的房舍，也都经常地呈现一种对‘宇宙图案’的感觉，以及作为方向、节令、风向和星宿的象征主义。”^①

● 天人观念与测量工具

“天人合一”、“法地则天”的观念，对中国古代社会心理的影响，还突出地表现在建筑选址、建筑设计和建筑施工中所经常使用的测量工具上。这里主要指的是“罗盘”和“门尺”。

一、罗经三盘，象征三极。

风水师用来测定方位的“罗盘”（又被尊称为“罗经”），是以天、地、人三极之道为象征的。罗经，就是以天、地、人三盘合为一体的测量工具。罗经的三盘，分别为：正针、

^① 转引自《天津大学学报》1989年增刊“建筑学专辑——风水理论研究”，第2页。

中针、缝针。所谓正针，是指向地盘正午方位的磁针；中针，是指向地盘正丙方位的磁针；缝针，是指向地盘丙午两字中间的磁针。以正针为主的二十四方位，称作“地盘”；以中针为主的二十四方位，称作“天盘”；以缝针为主的二十四方位，称作“人盘”。

清代乾隆年间，金陵有一位连同其著作被地方举荐到清廷的堪舆名家倪化南，他在其堪舆著作《地学形势·卷五·罗经渊源》中说：“罗经，盘为体，针为用；体法璇玑，用法玉衡。璇玑随天转运。以玉衡纪其方位、度数，下有方位，上有天机也。”这里所说的“璇玑”，是北斗七星（即大熊星座）中第一至第四颗星（依次为天枢、天璇、天玑、天权）的总称，又称“斗魁”；“玉衡”，是其中第五至第七颗星（依次为玉衡、开阳、摇光）的总称，又称“斗柄”，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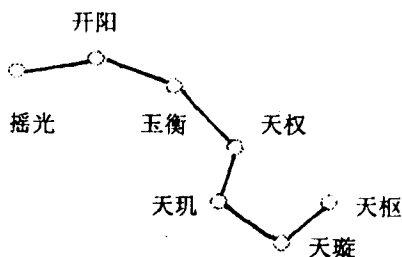


图1 北斗七星示意图

在罗盘中，“针”和“盘”的关系，象征着北斗星“斗柄”和“斗魁”的关系。在测量中，使用的是“针”，依据的是“盘”。在地上用罗盘测定的方位，是以天上的北斗星为象征的。

二、鲁班真尺，天人合一。

中国古代，为了表示对住宅“气口”的重视，建筑工匠还特制了一种专门用来量度门、窗的尺子，叫做“门尺”，又称“门官尺”、“鲁班尺”、“鲁班真尺”。明代，王君荣在他所撰写的《阳宅十书·论开门修造门第六》中说：“夫人生于大块，此身全在气中。所谓分明人在气中游者是也。惟是居房屋中，气因隔别，所以通气祇此门户耳。门户通气之处，和气则致祥，乖气则致戾，乃造化一定之理。故先圣贤制造门尺，立定吉方。慎选月日以门之关最大故耳。昔人云：宁与人家造十坟，不与人家修一门。”其中，所谓的“和气”，是指有利于人生的新鲜空气；所谓的“乖气”，即不利于人生的污浊空气。“人在气中游”，犹如“鱼在水中游”一样。这里所强调的门的通气功能之科学道理，已如上述。但用来量度门、窗的“门尺”，则是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和社会心理，被赋予了效法天地自然的象征意义。风水术中所使用的这种“门尺”，不是十寸，而是依据“八卦”均分为“八寸”，全长合市尺一尺四寸四分。其正面的八寸，各用一个星辰来命名，并且，各有四句象征吉凶的警句；其背面的八寸，相应地也是各用一个星辰来命名。每一寸，不是十分，而是依据“五行”均为五分。每一寸和每一分，又分别用黑、红两种颜色写出星象的名称和象征吉凶的文字。匠人在决定门、窗的尺寸时，依据房屋的功能用途，选取适宜的红字，即将门、窗尺寸的尾数落在红字上，以求“吉利”。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工匠在住宅建筑中，

开门立户，除了要以人体及其行为需要的实际尺度为依据之外，还要以“八卦”、“五行”所反映的宇宙天地之美为象征。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也是中国传统建筑最基本的哲学内涵。

崇尚和谐的理想境界

《周易·乾·彖传》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南宋哲学家朱熹（1130—1200）注曰：“大音泰，后同。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大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后。此言乾道变化，无所不利，而万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释利贞之义也。”今通称“大和”为“太和”。当代易学家金景芳等释曰：“保为常存，合为常和。‘保合太和’，使太和之气常运不息，永远融洽无偏；万物得此气以生以成。”^① 这里所说的“和”，指的是阴阳之和。纯阳不生，纯阴不长。阴阳合而万物生。以天地自然为模本的《周易》六十四卦，就是以象征纯阳、纯阴的乾、坤二卦为开端的。其余六十二卦，皆为阴阳相交合的产物。这

^① 金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14页。

种崇尚和谐的思想，是易学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各有千秋，但他们崇尚和谐的思想观念却大都是一致的。这种思想观念，又为后来的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

诸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道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之道稟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产生第三种中和之气，由中和之气继而产生万物。万物背阴而向阳，阴、阳二气相互激荡而成为和谐之气。“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老子·五十五章》）“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我守其一，以处其和。”（《庄子·在宥》）“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吕氏春秋·有始》）“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礼论》）。“天地不合，则万物不生”（《大戴礼记·哀公问》）。“阴阳和，而万物生矣。”（《淮南子·泰族训》）“天地之气，莫大于和。”（《淮南子·祀论训》）。“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妻合气子自生矣。”（王充：《论衡·自然》）等等。随之，还形成了以“和”为美的审美观。所谓“天地之道而美于和”，“天地之美莫大于和”（董仲舒：《春秋繁·天地阴阳》）。这里所说的“和”，即“和谐”。它包括“天地之和”、“天人之和”、“人际之和”、“身心之和”等等。

“崇尚和谐”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

为政之道，所崇尚的是“政通人和”、“内和而外安”。

足国之道，讲究的是“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荀子·富国》）

与国之道，讲究的是“协和万邦”（《尚书·虞夏书·尧典》）。

用兵之道，讲究的是“内和而外威”，并主张“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阵）；不合于陈（阵），不可以进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吴子·卷上·图国第一》）。

邻里之道，讲究的是“和睦相处”。

交际之道，讲究的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

君子之道，讲究的是“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流”（《礼记·中庸》）。

齐家之道，讲究的是“家和万事兴”。

夫妻之道，讲究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诗·小雅·常棣》）。

男女之道，讲究的是“以和为贵”（《玉房要指》）、“神和意感”（《千金要方·养性》）；甚至主张“取鰥寡而合和之”（《管子·入国》）。

伦理之道，讲究的是，君臣之和、父子之和、兄弟之和。“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墨子·兼爱中》）在古代的伦理观念中，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弟和睦，皆为人际之和。

养生之道，讲究的是和于天地之气，“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情感之道，讲究的是“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礼记·中庸》）。

音乐之道，讲究的是“八音克谐，无相争夺，神人以和”（《尚书·虞夏书·舜典》）、“音声相和”（《老子·二章》）、“乐以道和”（《庄子·天下》）、“乐以发和”（《史记·滑稽列传》）、“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吕氏春秋·大乐》）、“和六率以聪耳”（《国语·郑语》）“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乐者，天地之和也”、“大乐与天地同和”（《礼记·乐记》）。

烹调之道，讲究的是“和五味以调口”（《国语·郑语》）

生财之道，讲究的是顺应天理，“和气生财”；伤害天理，财破人亡。如此等等。

这样一种崇尚和谐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心理，必然会在建筑领域有所反映。

“和谐”，是中国文化所崇尚和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的“天人合一”，实际上就是讲的“天人之和”。在中国古代，“合”与“和”通用。“夫合者，和也。乃阴阳相合，其气相合。”（《三命通会·论支元六合篇》）所以，“天人合一”，实为“天人和一”，即天人之间构成一个和谐的、有机统一的整体，人作为天（即自然）的一部分，理应与其和谐相处。中国建筑，非常讲究“天人之和”、“人际之和”以及“身心之和”。

● 天人之和的园林建筑

中国建筑，从选址定位到规划布局，从空间分割到室内设计，都注重顺天时、应地利，以求天人之和。在住宅的台基高矮和室内的空间大小方面，强调阴阳之和，即主张其高矮大小适当为宜，不主张盲目地追高求大。所谓“室大多阴、台高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吕氏春秋·孟春季第一·重己》）“高台多阳，广室多阴，君子弗为也。”（董仲舒：《春秋繁露》）在室内采光方面，也强调阴阳之和、明暗适宜。所谓“山斋宜明净不可太厂（敞，下同），明净可爽心神宏，厂则伤目力。”^①在通风方面，注重其“气口”的方位朝向和尺寸大小。在排水方面，注重其“水口”的地势方位。明、清北京紫禁城内，就有很好的排水系统。紫禁城南北长 961 米，东西宽 753 米，其自然地形，自西北景山门外到紫禁城东南隅外侧，有下降约 2 米的坡度。内有上万米的水道通过重重院落，却能够达到雨后不积水的效果。在水土质量及其相应的生态环境方面，重视各种环境因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天人之和的观念，在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讲究来自“天然之理”的

^① 转引自《建苑拾英——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科技史料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361 页。

“天然之趣”、讲究虽属人工建造而又宛自天成的“天然图画”。正如北京颐和园里一块匾额上所题的那样：“山色湖光共一楼”。明代著名的造园学家计成在其《园冶》一书中，曾经明确地指出，在园林建筑的选址方面，“园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涉门成趣，得景随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立基先究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总之，要“相地合宜，构园得体”，要“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①。这种因任自然的园林意境，在中国的文学著作中也有很生动的描绘。如，《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节，就曾写道：贾宝玉不喜欢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就是因为“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而成的：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悄然孤出，似非大观”；因为它“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它有背于古人所云“天然图画”之“天然”二字，远不及“有凤来仪”等处的建筑，“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

中国园林与欧洲园林相比较而言，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因任自然”。在欧洲园林中，总是按照一定的几何图形把花草树木修剪得整整齐齐，其人工雕琢之匠心随处可见。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则是紧密地依托着自然环境而存在的。高

① [明] 计成著，陈植注释：《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5月第2版，第58页。

处建“阁”、峰回路转处设“亭”、临水为“榭”、僻静之处造“馆”，其建筑形式与自然环境是相辅相成的。至于垒石、引水、聚池、架桥、开路、围篱、设门，乃至花草树木的种植等，无一不是人工建造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产物。即便是建筑密度较大的一些小园林，如苏州的留园、怡园、耦园、沧浪亭、网师园、狮子林，扬州的个园、何园等，也富有天然的情趣和气氛。在这些园林中，人们虽然身处人造环境的有限空间之中，却令人有一种天然环境的无限情趣之感。所谓的“别有洞天”、“美在其中”。这是一种超乎一般人际之乐的天人之乐。正如古人所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天人之和”是一种最高境界的乐趣。

在中国的住宅建筑中，也往往渗透着这种天人之和的园林气氛。如，民间住宅庭院之花木、盆景、垒石等。即便是在封建时代政治气氛最为浓重的北京紫禁城的建筑群中，也要设置若干花园（如，御花园、西花园、宁寿宫花园），以缩短人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谓“移天缩地在君怀”。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首次国际造园会议（IFLA），所规定的今后造园的发展方向是：“以庭院为起点向大自然发展”^①。这一规定，同中国园林建筑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① 陈植：《陈植造园文集》自序，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6月第1版，第3页。

●内和外安的皇宫建筑

中国古代，在建筑上对于和谐境界的追求，还突出地表现为文化心理方面的各种象征。其中运用了文字、图案、色彩、数字等象征手段。这里，仅以清代皇宫中的有关文字方面的命名为例，加以讨论。

清朝北京皇宫的建筑，基本上是沿用了明代的形制。但是，到了清朝，已经对明代皇宫中宫殿、宫门的名称，做了较大的改动。值得注意的是，经过这一改动，更加体现了在政治上崇尚和谐、追求内和而外安之理想境界的文化内涵。

清顺治二年（1645年），将明末宫城中轴线上的一些宫殿、宫门的名称做了较大的改动。如，将“皇极殿”、“中极殿”、“华盖殿”分别改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将“皇极门”改为“太和门”；将通向文华殿的“会极门”改为“协和门”；将通向武英殿的“归极门”改为“雍和门”（乾隆元年即1736年又改为现在的“熙和门”）。明代时，在天坛内圜丘坛西北方向原来有一座“太和殿”，清代将“皇极殿”改称“太和殿”时，即将它改称“凝和殿”了。经过这样的改动之后，宫城内部更加淋漓尽致地渲染了一派和气致祥的气氛。

就后廷而言，其主体建筑是在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只有两个人能够居住的“乾清宫”和“坤宁宫”。前者是皇帝居住之所，后者是皇后居住之处。虽然，就其宫名来看，这里

并没有一个“和”字。但将二者合起来看，“和”字已经寓意其中了。内廷这两座主要的宫殿，分别是以八卦之中的“乾”、“坤”二卦命名的。就方位而言，在地面是以北为上。这样，两者的方位就是：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乾为健，坤为顺。乾为纯阳，坤为纯阴。阳为大，阴为小。在六十四卦（六画卦）中，以内外卦而言，由内而外曰“往”，由外而内曰“来”。乾下坤上、小往大来，谓之“泰”卦，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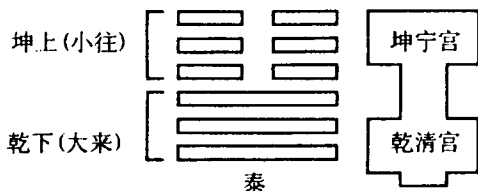


图2 乾清宫与坤宁宫之泰卦象征示意图

“泰”卦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其卦为阴阳相交之象：阳气轻盈上升，阴气重浊下降；二者一上一下，谓之交合。《周易·泰·彖传》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明代易学家来知德（1525－1604）注曰：“天地以气交，气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上下之泰

也。阴阳以气言，健顺以德言。”^①《周易·象传》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故而，“乾清宫”和“坤宁宫”，二者合起来就是一个“泰”卦。其主要象征是“夫妻之和”（国家第一夫妻之和諧相处）。对一般家庭来说，夫妻之和是家庭之和的根本。对于皇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否则，皇宫之内若是夫妻不和，则必将祸起萧墙。清乾隆八年（1743年）御制冬至斋宫叠旧韵中的诗句“小往大来堪体验，民情物理入筹量”，即蕴含着此意。

至于在“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的“交泰殿”，是后来在明嘉靖年间才改建的，清顺治十二年又重建。首先，将其命名为“交泰”，已经把本来是含蓄的意境说白了。再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其地位也有些局促逼仄，颇不相称。据于倬云先生考证，将后廷南北中轴线上的“乾清宫”、“坤宁宫”之间，增加一个“交泰殿”，改称后三宫的做法，也是不合乎古代礼制与原来的设计思想的。内廷位于紫禁城的后部，属阴，因而其布局多用偶数。位于后宫中轴线上的乾清、坤宁二宫，与此相符。据古代的文献记载：“礼，王后六宫，诸侯夫人三宫也。”因此，明代设计宫殿时，决不敢以诸侯的三宫之制取代皇帝的六宫。此说有一定道理。此外，这种改动，很可能是为了凑出一个“三生万物”的

^① [明] 来知德：《易经来注图解》，巴蜀书社，1989年5月版，第177页。

“三”，而做出的一种蛇足之举。不过，这与其所象征的“夫妻之和”，并无什么妨碍。

就前朝而言，“太和门”内的“太和殿”主要是举行国家大典、进行君臣议事之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注曰：“和者，万物一致之理”，“太和，和之至也”（《张子正蒙》）。它主要象征的是“君臣之和”。在“太和门”外，分别通向文华殿和武英殿的两个大门即“协和门”和“熙和门”，则主要象征的是“文武之和”、“将相之和”。“协，和也。风气和，时候至也。”（《国语·周语》韦解）熙，昌盛也。这些命名，充分体现了“将相之和”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这样，宫城之内前朝的三大殿即“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以及三大门即“太和门”、“协和门”、“熙和门”，六者皆以“和”命名。这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于其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之和谐一致的强烈愿望。这里接连用了六个“和”字，在易学中六是阴爻的称乎，六为顺。与宫城之“六和”相应的，是皇城城门命名之“六安”，即“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六六谓之大顺。这些命名，又蕴含了其“内和而外安”的政治内涵，见图3。

此外，在“人际之和”的建筑表达方面，还渗透着中国古代的其中主要是儒家的伦理观念。诸如：尊卑分明、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等等。从而，有所谓等级建筑、辈分建筑、围墙建筑。在“身心之和”的建筑表达方面，则渗透着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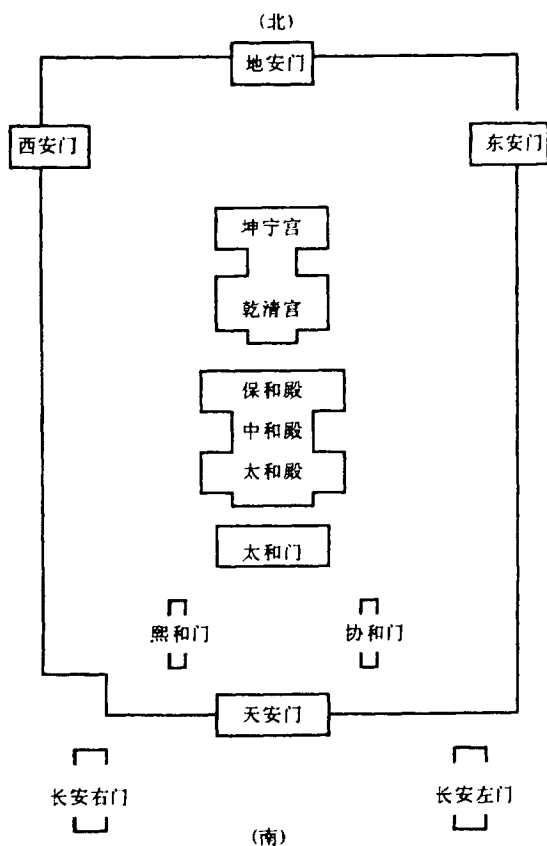


图3 清代皇宫“内和外安”建筑命名之方位布局示意图

古代的包括儒家和道家在内的养生观念。如：养身（养命）与养心（养性）并举，贵在养心（养性）等等。从而有所谓“养心殿”、“养性殿”、“养性斋”等等。在“音声之和”的建筑效果方面，呈现出了诸多有趣的声学建筑，诸如：北京

的天坛和易州昌西陵的回音壁、回音石等。在建筑的方位布局中，则除了追求自然方位之和以外，在自然方位不理想的情况下，还利用八卦、五行等手段，追求文化方位之和，以达到某种心理上的平衡与美感。

总之，在中国古老的风水理论及其相应的有关建筑活动中，当我们撇开其神秘的因素之后，就会发现它所探索和追求的理想境界正是中国哲学的精髓：和谐。

第二章

自然方位与建筑环境

《周易·系辞上传》：“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周易》这部著作是依照天地自然的法则而作成的，是以天地自然为模本的，故能与天地相齐一。作《易》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所以知道天地万物生成变化中的幽暗与明显之处。

中国古代的风水理论，在建筑的规划与布局上，仰观俯察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选择最佳的天地自然方位，以获得良好的建筑环境。

辨方正位的建筑原则

中国传统建筑，在选择基址与规划布局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辨方正位”。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堪輿学”（风水学），由于对建筑方位的格外重视，及其丰富多采的方

位系统，又称之为“方位理论”（theory of orientations）。中国历代的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都非常重视风水理论中的坐向方位。如，在《大清会典》中曾明确规定：“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位、諏（zōu）吉兴工，典至重也。”

● 辨方正位，以正朝夕

传说，早在神农氏时代，中国古代的先民，在城池建筑的选址中，就已经注重“辨方正位”了。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炎帝神农氏始课功定地，置城邑，设陶冶。按《路史》：神农氏……于是辨方正位，经土分域，乃课功定地为之城池以守之。”

《周礼·地官司徒》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地中，天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据贺业钺先生考证，周代第一次城市建设的高潮，是在西周开国之初适应宗法封建的政治要求的产物。当时，所谓的“国”，就是指的“城”；所谓的“建国”，就是指的实行封国制度，建置城邦国家^①。为了更好地顺应天

^① 贺业钺：《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第24-38页。

时、地利，在营建城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用土圭测量日影，以辨方正位。所谓的“辨方正位”，即辨别东、西、南、北四正方位。

“辨方正位”的具体手段，除了土圭测向之外，还有所谓立表测向、司南测向、景表测向、日晷测向、指南针测向和罗盘测向等诸多方法。

据《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槲以悬，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之景，夜考天之极星，以正朝夕。”这里所说的“水”，指的是水准或水平。“槲”，指的是木杆。“置槲以悬”，是以绳悬重物，使木杆垂直立于地面。然后，以木杆为圆心作圆，即“为规”。“眡”，即视。“景”，即位于日光下面之木杆的影子。将日出与日落时，木杆的影子与“为视”之圆周相交的两点相连所得出的一条直线，便可得出正东、正西之方位。然后，再参照正午时木杆的影子，或夜晚北极星的方向来加以校正，即可“以正朝夕”。将正午日中时，木杆的影子与“为视”之圆周相交之点，同圆心相连所得出的一条直线，便可得出正南、正北之方位。在《周髀算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即所谓“以日始出，立表而视其晷，日入复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上述“置槲以悬，以正朝夕”之法，可作如下图示。

见图 4。^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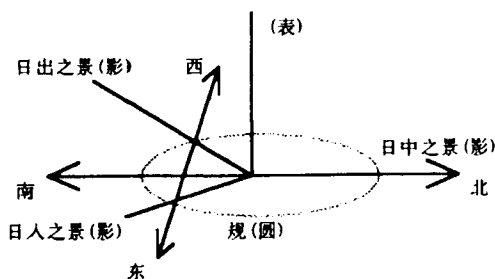


图 4 《周礼·考工记》“置表以悬，以正朝夕”之法示意图

“正朝夕”，又称“端朝夕”。如，在最早记载用司南辨别方位的《韩非子·有度》中，就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是指南针和罗盘的前身。

到了汉代，还出现了另一种立表测向、以正朝夕之法。《淮南子·天文训》曰：“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即，先树一个固定的表（木杆），再在定表东面日出的方向距离固定表十步之处立一个游动的表，由定表经游表望日出；到日入之时，又在定表的东面距离定表

^① 《天津大学学报》1989 年增刊“建筑学专辑——风水理论研究”，第 103 页。

十步之处另立一个游表，由定表经此游表望日落。则两个游表连线之中点与西面之定表之间的连线，即正东正西之方向。其中之道理，与上述《考工记》所记载的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

此外，在北宋管城（今河南郑州）人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这一建筑专著中，还记载有“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的“取正之制”的三种方法，即运用景表板、望筒、水池景表等仪器测定方向的方法。后来，在建筑方面，最常用的也是最方便的测向定位仪器是罗盘。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中国古代，不仅注重建筑选址和建筑布局方面的“辨方正位”，而且，还注重依据星象的方位来选择建筑施工的良好时机。

《诗经·国风·邶风·定之方中》曰：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其中，“定”，星名。即，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的第六宿“室宿”，又称“营室”星。《尔雅·释天》：“营室谓之定。”《注》：“定，正也。作宫室皆以营室中为正。”《集传》：“定，北方之宿，营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于是

时，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国语·周语》：“营室之中，土工其始。”《注》：“定，为之营室也。建亥小雪中，定星昏正于午，土工可以始也。”

“营室”，最早包括“室”、“壁”两宿，每宿各两颗星，共计四颗星，略呈一长方形。在春秋战国时代，每当这四颗星的中心于黄昏时出现在日中（正南方）的季节，即每年的立冬前后，正是农事已毕、天气未寒、从事营造宫室房屋的大好时机。因此，定星，又称作营室星，即兴作土木、营造宫室之星。后来，“营室”专指“室宿”。“于”，清文字学家王引之（1766-1834）《述闻》曰：“当读曰‘为’。谓作为此宫室也。古声‘于’与‘为’通。”“楚”，《传》释为楚丘。“揆”，测度。即根据日影，以测定方位。因此，上面这首诗，可译作如下白话：

营室星辰照天中，初冬兴建楚丘宫。

测定方位看日影，营造宫室兴工程。

这首诗中的“揆之以日”，也有“辨方正位”之义。

在自然方位体系中，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数理等诸多方面的知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古代的诸多方位体系中，时间和空间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即，时间方位与空间方位，往往是相互一致的。两者统一的基础，就是天体运行、四季交替等自然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中国古代，对自然事物存在形式的总称，叫作“宇宙”。然而，“宇宙”的本义就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尸子》卷下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日宙。”《墨经·上经》曰：“久（宙），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在这里，“宇”指的是空间；“宙”指的是时间。因此，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中国文化的方位系统中，既可以用时间来表达空间之方位，又可以用空间来表达时间之方位。

丰富多彩的自然方位

中国传统建筑，格外重视其方位朝向。相对而言，风水理论中的方位系统，又有自然方位与文化方位之分。其中，最基础的是天地自然方位系统，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是各种易学文化方位系统。在实践中，两者经常是相结合而使用的。

在天地自然方位系统中，有天文、地理、气象、季节、阴阳等诸多类型的方位系统。中国古代的先民，对自然方位的表述，又有其特殊的文化色彩。

●天文空间方位

一、三垣恒星方位。

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上，从《步天歌》开始，将全天的恒星分为三垣、二十八宿（xiù）、三十一个天区，每区以一

垣或一宿为主体，并包括其它多少不等的星官。所谓的三垣，即太微垣、紫薇垣和天市垣。每一垣既是星官名称，也是天区名称。

其中，太微垣，又称作上垣。位于北斗之南，轸宿、翼宿之北，有星十颗，以五帝座为中枢，成屏藩形状。包括：东藩四星、西藩四星、南藩两两星。紫薇垣，又称作中垣。位于北斗东北，有星十五颗，东西列，以北极为中枢，成屏藩形状。包括：东藩八星，西藩七星。左右枢之间叫作“闾阖门”。天市垣，又称作下垣。位于房宿和心宿东北，有星二十二颗，以帝座为中枢，成屏藩形状。包括：东藩十一星，西藩十一星。

三垣之中，“中垣”即“紫薇垣”，多为皇家建筑所仿效。

中国古代的皇宫是禁止平民百姓靠近的“禁地”，以天子自居的君主，根据“紫薇垣”为天帝所居的古老传说，往往将自己的皇宫比作“紫薇垣”。因而，其宫城又称作“紫禁城”。

二、二十八宿方位。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把黄道（太阳和月亮所经过的天区）上的恒星分为二十八个星座，并称之为二十八宿。“宿”字的象形犹如一座房子。据许慎解释：“宿（𠙴），止也。”二十八宿犹如二十八座房子一样，被想象为恒星落脚休息之处。

二十八宿的方位分布，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

1. “四方二十八宿方位”。

《淮南子·天文训》：五星、八风、二十八宿。《注》：“东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虚、危、室、壁；西方：奎、娄、胃、昂、毕、觜、参；南方：井、鬼、柳、星、张、翼、轸。”

其中，二十八宿的方位分布，列表2示意。

表2 二十八宿方位分布表

四方	二十八宿
东方	七宿： 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	七宿： 井、鬼、柳、星、张、翼、轸
西方	七宿： 奎、娄、胃、昂、毕、觜、参
北方	七宿： 斗、牛、女、虚、危、室、壁

2. “四象二十八宿方位”。

据《三辅黄图·未央宫》，“四象”为“苍龙、白虎、朱雀、玄武”。“苍龙”，又称青龙，是东方七宿的总称；“白虎”，是西方七宿的总称；“朱雀”，又称作朱鸟，是南方七宿的总称；“玄武”，又称灵龟，是北方七宿的总称。《史记·天官书》：“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咸池，参为白虎；北宫玄武。”后来，“四象”又被道教奉为“四神”。即，“苍龙”为东方之神，由东方七宿组成龙象，又称为“太岁”。《后汉书·律历志》：“青龙移辰，谓之岁。”《淮南子·天文训》：“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朱雀”为南方之神，由南方七宿组成鸟象。“白虎”为西方之神，由西方七宿组成

虎象。旧时，以“白虎”为凶神。《协纪辨方书》引《人元秘枢经》曰：“白虎者，岁中之凶神也。”明、清北京城外，永乐大钟所在位置的变迁，就与此有关。永乐大钟，原来悬挂在城西万寿寺内。到了明天启年间，“有言寺在帝里白虎分，不宜鸣钟，遂卧铜于地”（《燕都游览志》）。到了清代，统治者也不敢在白虎方位（万寿寺）鸣钟。为了“岁时求雨”的需要（祈雨时需要鸣钟），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城西北曾家庄建觉生寺，次年告成，并于乾隆八年（1743年）将永乐大钟从万寿寺移至觉生寺。从此，觉生寺又俗称大钟寺^①。“玄武”为北方之神，由北方七宿组成龟蛇相缠之象。《礼记·曲礼上》：“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唐代学者孔颖达（574-648）疏：“玄武，龟也。”《后汉书·王梁传》：“玄武，水神之名。”明大臣李贤（1408-1466）注：“玄武，北方之神，龟蛇合体。”玄武（又称元武）之所以呈龟蛇合体之象，其说有二。其一，是说因为北方七宿中虚、危两宿，形似龟蛇，故称玄武。“玄”，指“龟”；“武”，指“蛇”。其二，按西晋著作家张华《博物志》，传说“大腰无雄，龟鼃类也，无雄，与蛇通气则孕”。粗腰的动物没有雄性，乌龟、鼃龙就属于这一类，正因为没有雄性，它们便与蛇相交来怀孕。甚至说“屠龟，解其肌肉，唯肠连其头，而经日不死，……遇神蛇复续”。宰割乌龟时，把肌肉剖开，只让肠子连着龟头，过一天都不会死，遇到神灵的蛇，它又

^① 岳岱：《北京趣闻1000题》，中国旅游出版社，第170页。

能重新孕育后代。前一种说法，有一定的根据。后一种说法，多半是古人因其动物知识的局限性而做出的猜想。“玄武”又称“真武”。据宋代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九》中的记载：“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为四方之神。祥符间，避圣祖讳，始改玄武为真武，……后兴醴泉观得龟蛇，道士以为真武现，绘其像为北方之神。”

“四象二十八宿方位”与“四方二十八宿方位”之间，有如表3的相互对应的关系。

表3 四象二十八宿方位分布表

四 象	苍 龙	朱 雀	白 虎	玄 武
星 宿	东方七宿	南方七宿	西方七宿	北方七宿

“四象二十八宿方位”，在京城建筑规划中，常常被用来象征其中央之地位。

3. “五帝二十八宿方位”。

东汉科学家张衡（78—139）说：“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黄神轩辕于中。”（《灵宪》）注：“黄神轩辕”，是星座名。

《晋书·天文志》：“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轩辕黄帝之神，黄龙之体也。”

《春秋纬·运斗枢》又称：“岁星帅五星，聚于东方七宿，苍帝以仁良温让起，皆以所舍占国。荧惑帅五星，聚于南方七宿，赤帝以宽明多智起。填星帅五精，聚于中央，黄帝以重厚贤圣起。太白帅五精，聚于西方七宿，白帝以勇武诚信

多节义起。五星以辰星聚于北方，黑帝起，以宿占国。”

《春秋纬·文耀钩》又称：“太微宫有五帝星座。苍帝春起受制（即承受辖制权，下同（引者注），其名灵威仰。赤帝夏起受制，其名赤熛怒。白帝秋起受制，其名白招矩。黑帝冬起受制，其名汁光纪。黄帝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枢纽。”六月又称长夏。三国时吴太子少傅薛综在为《文选》中张子平（衡）《东京赋》作注时，引《河图》文称：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协光纪。并称其中的四帝为“四灵”。这里，所假托之五帝，将二十八宿方位与五行、五色方位，以及五季时间方位联系了起来。“五帝二十八宿方位”与五季方位的对应关系，可用表4示意。

表4 五帝二十八宿与五季方位对应一览表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帝	苍帝	赤帝	轩辕黄帝	白帝	黑帝
星宿	东方七宿	南方七宿		西方七宿	北方七宿
五季	春季	夏季	长夏	秋季	冬季

《淮南子·天文训》中，还有另外一种关于五帝方位的如下记载，如表5示。

表5 五帝方位分布表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帝	太皞	炎帝	黄帝	少昊	颛顼

以上表述，都是把地上的人事与天上的星宿相附会的结果。由于轩辕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古人将太微垣中枢

五帝座的中央之帝，用轩辕黄帝来命名。轩辕黄帝在天上所位居之中央地位，又多为后来之皇家建筑所仿效。

4. “九野二十八宿方位”。

《吕氏春秋·有始》：“天有九野，……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昂、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这里，把二十八宿分为“东、西、南、北”四正方位，“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四维方位，和中央方位等九野，又称九天。（见表6）

表6 九野二十八宿方位分布表

九 野	二 十 八 宿
东北变天	箕、斗、牵牛
正北玄天	婺女、虚、危、营室
西北幽天	东壁、奎、娄
正西颢天	胃、昂、毕
中央钧天	角、亢、氐
西南朱天	觜、参、东井
正南炎天	舆鬼、柳、七星
东南阳天	张、翼、轸
正东苍天	房、心、尾

中国古代的君主自称是真龙天子，因而常常要效法天上被称作“黄龙之体”的“轩辕黄帝之神”，位居“中央”。明、清

北京紫禁城内，悬在太和殿龙井中央的硕大明珠，又称轩辕宝镜。

天子用“二十八宿”来象征其都城位居天下之中的方式之一，就是以“苍龙、朱雀、白虎、玄武”等四象，作为都城四周水系的象征。据《蓬窗日录》记载：“北京青龙水为白河，出密云南流至通州城。白虎水为玉河，出玉泉山，经大内，出都城，注通汇河，与白河合。朱雀水为卢沟河，出大同桑乾，入宛平界，出卢沟桥。元武水为湿余、高粱、黄乡镇川、榆河，俱绕京师之北，而东与白河合。”^①

天子用“二十八宿”来象征其宫城位居都城之中的流行方式，则是用四象为其宫城四周的城门命名。最起码，也要在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上，用“朱雀、玄武”二象作为命名的标志。或者采用“朱雀、玄武”二象来为宫城的南、北城门或湖泊命名。如：唐代的长安城，其宫城南有朱雀门、北有玄武门。六朝建业都城、建康都城，其南面有朱雀门，北面有玄武湖。北宋东京城，南面也有朱雀门。明代南京城内的皇城、明中都（凤阳）城内的宫城，北面都有玄武门。明、清时代的北京紫禁城，其北面有玄武门（神武门）、玄武水（积水潭），其前面东侧有龙门（长安左门）、西侧有虎门（长安右门）等等。

①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81页。

●地理空间方位

这里所谓的“地理空间方位”，指的是“东、西、南、北、中”这五个自然方位。在中国文化中，用来指称这五个方位的汉字，都是来自对自然事物的象形会意。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东（東），动也，从木。官溥说，从日在木中。”“东”，是指日出的方向。即：日头刚刚升出地面，还未升上树梢时候的方向，谓之“东”方。“西（西），鸟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西”，是指日落的方向。由于鸟是在日落的时候才栖窝儿的，所以，“西”也就是鸟栖窝儿的时候日头所在的方向。“南（南），木至南方有枝任也”。“南”，是指草木的枝叶向阳即朝向日中的那个方向。“北（北），也。从二人相背。”即：与面南相背的方向，谓之“北”方。“中（中），内也，从口上下通”。其方位，在四方之内。据《〈说文解字〉导读》，“中”字。在丨的上下距离相等的部位加一〇号，指明了适中的意思。后来为着书刻方便，易〇为□，便成为中了。

上述“地理空间方位”（四正方位加中央方位），又称为五方。

●四季时空方位

中国古代的时候，基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先民们很早就

知道根据北斗七星（即大熊星，俗称勺星）之“斗柄”方位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更替了。据《鹖冠子》记载：“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运于上，事立于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此道之用法也。”天上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方，地上就是春天。其斗柄指向南方，地上就是夏天。斗柄指向西方，地上就是秋天。斗柄指向北方，地上就是冬天。斗柄运转于天上，四季立于天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天上斗柄指向一方，地上四方之国都成为一个季节。这就是用天象来识别季节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四季与方位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这样建立起来的方位体系，必然是时空统一的体系。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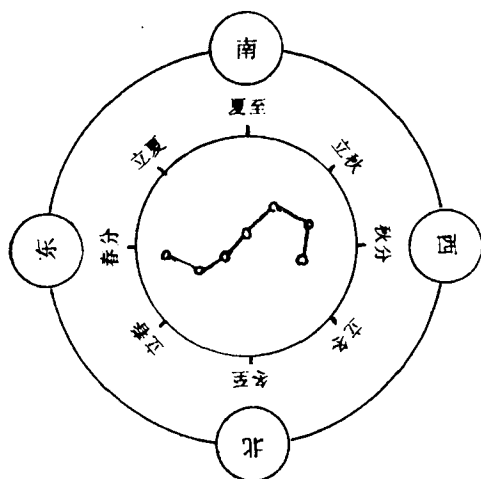


图5 四季时空方位示意图

中国文化，作为农业自然文化，对于季节的变化，是极为重视的。一年之中，就农业生产的周期而言，是春耕、夏锄、秋收、冬藏。春日主生，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吕氏春秋·孟春纪》）。秋日主杀，草木枯死。中国文化贵生、重生，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传》）。“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黄老帛书·十六经·观》）古代的时候，每逢立春，天子都要事先斋戒，并率领其文武大臣到东郊举行迎春仪式。据《吕氏春秋·孟春纪》记载：“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日，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而且，天子还要在立春之辰率领其文武大臣亲自躬耕。此外，古人还主张，在春天禁止砍伐树木，不杀害鸟兽，保护鸟巢，不主动兴师动众出兵打仗，以免违逆天道、贻误农时。至于“缮囹圄，具桎梏，慎罪邪，务搏执。……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之类的生杀决断之事，则要到立秋之后再加实施。据史书记载，东汉皇帝把审理处决犯人的时间定在秋季，故而称作“秋审”，刑部又被称作“秋官”。古代执行死刑的时间，一年之中在秋后（冬至以前），一日之中在午后（即所谓午时三刻），以示其顺应天道。

这种顺应天道的观念和行为，还表现在空间方位上。

一、敬天法祖，左祖右社。

中国传统文化重本贵生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敬天法祖。所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荀子

·礼论》)先祖,乃家族繁衍生息之本,为人道之所亲。在空间方位上,坐北面南之宫城的左边即东方属春,春季主生。因而,在建筑布局上,祖庙的位置理应与主生的方位相一致。《周礼·考工记》就曾经明确规定,宫城建筑“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易氏曰:左右前后,据王宫而言。古者建国,王宫居中。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者,地道所尊,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①

从元代的大都城到明、清两代北京城的建筑,都是按照“左祖右社”的方位来规划布局的。不仅如此,清朝皇帝死后,不管是葬于清东陵还是葬于清西陵,大都是从东华门出殡,而不是从西华门出殡的。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东方属春,主生;西方属秋,主杀。按照古代的生死观念,阳间之死,即阴间之生,所谓“视死如生”。皇帝所谓的“万寿无疆”,生前虽然不能实现,死后还要继续追求。此外,按照古代的皇家定制,皇帝死后,不管葬在何处,其灵牌总是要进入祖庙的。清代皇后薨逝,也多由东华门出殡。例外的情况也有,据《翁文恭日记》记载,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二十日,慈安皇太后的灵柩就是从西华门出的殡。这可能同慈禧执政时期的恩怨和淫威有关,不具有普遍性。总之,皇家从生方出殡、设祖庙于生方,均为古人法地则天、重本贵生观念的一种具体体现。

^① 《建苑拾英——中国古代土木建筑史料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91页。

二、阳德阴刑，左文右武。

社会上的生杀大事，对内是依刑律处死，对外则莫过于战争。动乱时期，需要武治。然而，兴兵打仗，诉诸武力，总是要死人的。因此，战争被古代先民看作是不祥之物。即便是不得已而动武，也决非长久之计；“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篇》）。和平时期，需要的是文治。在汉字中，政治的“政”字，由“文”和“正”字组成；所谓的政治，主要讲的是文治，而且，文治还讲究一个正字。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刑律的“刑”字，为竖“刀”旁。“刀，兵也。”（《说文解字》）“刑，剋也。”剋，就是用刀割脖子。在政治上，儒家主张仁政和德政。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用行政命令和严厉刑罚治民，民可能因为害怕而不敢犯法，但不会有道德意识；用道德教育导民并用礼义加以约束，则民将会自觉地遵纪而守法。因而，以道德教育来处理国家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安居其所而为众星所朝拱。德与刑、文与武，犹如光明与黑暗一般。儒家隆礼而重法，主张阳德阴刑、刑德并用。孔子在回答子贡问政时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孔子还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尊周礼。相传春秋末年思想家老子（又称老聃）曾经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并且深通

周礼之制。在《庄子》中，就有七处关于孔子问礼于老聃的记载。据《老子》记载，上述阳德阴刑的观念，早在周代就融汇到人们的方位意识中了。《老子·三十一章》曰：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之，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这就是说，按照周礼，在平时（和平时期）是以左为贵、以左为上、以左为前，战时（战争时期）是以右为贵、以右为上、以右为前；吉事以左为上，凶事以右为上。这种观念，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有着深远的影响。据中国古代的兵书《六韬·立将第二十一》记载，古代君主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都要避开正殿，在偏殿（西偏殿）召见主将，下达帅军征讨的命令。主将接受了任命之后，君主还要斋戒三天，前往太庙，将象征军权的斧钺正式授予主将。在授命仪式上，“君入庙门，西面而立，将入庙门，北面而立。”即君主进入庙门后，以西为上，面向西方而站立，以示其对战事的重视和对主将的尊重和支持；主将进入庙门后，以北为上，面向北方而站立，以示其面北称臣之忠心不二。至今，

在中原一带的传统民俗中，仍然有“喜事尚尊、丧事尚亲”，喜事以左为上、丧事以右为上的习惯。

上述方位意识，在古代君主的都城建筑及其相应的礼制活动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左文右武的总体布局。这种布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由于历来的天子都是面南而治的，其都城均呈坐北向南之方位。这样，左文右武就成了文东武西。

例如，在金中都城的建筑中，文楼位于千步廊之东；武楼位于千步廊之西。在明、清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建筑命名，乃至入朝的礼制上，也体现了文东武西之制。如：内城南面的城门，东面是崇文门，西面是宣武门。贡院、文庙（孔庙）、国子监等，都建在东城，而明代点兵选将的校场在外城西侧的宣武门外（宣武门外至今还留有校场口之地名），明、清两代军队出征打仗都是从西城北面的德胜门出入。“京师正阳门瓮城内，自明代一来，东西建双庙，东祀观音大士，西祀后汉关侯。”皇城第一门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前面的天街（俗称棋盘街）两侧，各有一座牌坊；位于东侧通向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的牌坊名曰“敷文”，位于西侧通向西江米巷（今西交民巷）的牌坊名曰“振武”。皇城正门（天安门）前面千步廊两侧，文职的中央衙署都建在东面，武职的中央衙署都建在西面。皇城正门外，东面为长安左门（又称龙门），进行殿试的贡士从东面的崇文门、长安左门、天安门左门入；西面为长安右门（又称虎门），兵部官员押解俘虏到午门外献俘，从长安右门、天安门右门入。

在紫禁城正门（即午门）内，文华殿在东面，武英殿在西面；太和门内，明代东侧是文昭阁（清代更名体仁阁）简称文楼，西侧是武成阁（清代更名弘义阁）简称武楼。朝廷议事，则是文武大臣按照左文右武的定制位列两厢。清代，乾清门前“东为外奏事处”、“西为军机处”。

明代，大臣们在祭祀日坛和月坛的时候，也有左文右武之分。据《明嘉靖祀典》记载：皇帝祭日，隔一年亲祭一次，皇帝祭祀“夕月坛每三岁一亲祭”，“余年遣官致祭”。位于城外左侧的日坛，派遣文官祭祀；位于城外右侧的月坛，派遣武官祭祀。清代沿袭了这一祭祀礼制。^①

此外，在祭祀活动中，有关服务设施的方位布局，也很有讲究。作为宰牲与神厨等动刀刑杀之所的建筑物的方位，均设在主祭者的右侧前方。因为，在天，南为上（即易图方位，参见本书“文化方位与建筑象征”部分）；在地，北为上（即地图方位，所谓的“北上”、“南下”之说，就是相对地面而言的）。面南称王，面北称臣。按照古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天子为国家社稷之主。因而，社稷坛建在宫城之右侧，北向。天子祭祀社稷坛，从北门入、面南而祭。宰牲亭、神厨，及其相关的神库和井，均在天子之右侧（社稷坛之西侧）。据《大清会典则例》：“社稷坛在阙右，北向”，坛外“西南神库五间，神厨五间，井一，均东向。……坛西门外宰牲亭三间，东向。”天子在祭天的时候，其

① 岳岱编：《北京趣闻 1000 趣》，中国旅游出版社，第 21 页。

有关方位正好相反，是从天坛的南门（即正门）入、面北而祭的。因为，在上天的面前，皇帝不能面南称王，只能面北称臣、自称天子。实际上，清代乾隆在祭天时，往往自称“小子”。所谓“惟予小子，敬捧苍璧。明明帝神，尚其来格。……敢曰予小子，诚通昊苍”云云。不仅如此，一般说来，皇帝在祭天的时候都不走中门，而是从天坛外墙南左门入内墙南左门。这样，宰牲亭、神厨，以及相关的神库、井亭，均设在皇帝之右侧（圜丘坛之东侧与祈年殿东侧）。据《大清会典》记载：圆丘坛外墙“东门外东北隅，神库、神厨各五间，井亭一，……又东为宰牲亭、井亭各一。”在礼制建筑上，大都把刑杀之所设在右侧。这种规划布局的文化内涵，就是对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的一种象征。

三、生死实自取，宽严非我为。

古代的时候，不仅是执行死刑的时间，要选在一年之中的秋后，而且，执行死刑的地点，乃至“朝审”判决死刑的地点，也要选在京城之南北中轴线的西侧。以明、清时代的北京城为例，明代的刑场在西四牌楼，据《旧京遗事》记载：“西市在西安门外四牌楼，凡刑人于市，有锦衣卫、理刑官、刑部主事、监察御史及宛（平）、大（兴）两县正官处决之。”清代的刑场在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据《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菜市口乃“刑人之所”。犯人从长安西门即长安右门押解出去，必经宣武门才可到达菜市口，“宣武门箭楼下吊桥之西，立石碣一，镌‘后悔迟’三字……，犯人见此石碣，恍悟后悔已迟”（《燕京仿古录》）。重大“罪案”，

都要经过秋后的“朝审”，即送到朝廷由皇帝亲自审判。通过“朝审”判决死刑，又称作“勾到”或“勾决”，即用朱笔勾销犯人的名字。据《明宫史》记载：“每年霜降后，吏部等衙门朝审刑部重囚，在门（承天门）前中甬道之西，东西甬道之南。”清代，皇帝主持“勾到”的地方，就在乾清宫的西配殿即“懋勤殿”。据文献记载：“直省秋谳，经九卿会议后，各道御史复奏，请旨勾到。届日，懋勤殿预设御案，东向，案陈黄册。又设低案，一于殿中，西向；一于御案旁，北向，案设朱笔及砚。皇帝升座后，内阁学士一，捧案由、名单匣，由阶中；大学士捧复奏本匣，暨军机大臣、刑部堂官、内阁学士等，由阶右；记注官四，由阶左，均趋入殿。大学士等北向列跪，记注官南向次立。皇帝命大学士一人执笔，就旁案跪，展复奏本。内阁学士就中案跪，启匣，举奏案由、人名。皇帝展阅黄册，详酌宥否。其予勾者，大学士举朱笔加勾。既毕，黄册授红本处，复奏本匣发刑科，仍交刑部。”^①之所以选择在皇宫的西侧进行“勾决”，就是因为在自然方位中，西方属秋，秋天主杀。在此时此地判决死刑，就意味着：判者该判，死者该死；上顺天意，下合刑律；虽属一人主持，决非一人所为。这就是所谓的“其生其死实自取，或宽或严非我为”。

^① [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官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293页。

●八风气象方位

所谓“八风”，指的是来自“八方之风”，又称之为“八面来风”。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上，有关“八风”的记载很多。其具体说法，大同小异。例如：

《吕氏春秋·有始》曰：“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

《淮南子·天文训》曰：“何谓八风？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条风至；条风至四十五日，明庶风至；明庶风至四十五日，清明风至；清明风至四十五日，景风至；景风至四十五日，凉风至；凉风至四十五日，闾阖风至；闾阖风至四十五日，不周风至；不周风至四十五日，广漠风至。”东汉史学家班固《白虎通·八风》曰：“广漠者，大漠也，开阳气也。……广漠风至，则万物伏。”这里是按照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个节气的方位，来论述八风方位的。按照时空方位的对应关系，这里所说的“条风”当指东北风。在《山海经·南山经》中，也有关于“条风”的记载。郭璞云：“东北风为条风。”

《易纬》：“八节之风谓之八风。立春条风至，春分明庶风至，立夏清明风至，夏至景风至，立秋凉风至，秋分闾阖风至，立冬不周风至，冬至广漠风至。”这里的说法与《淮南子·天文训》完全一致，并点明了八风与八节的对应关系。

所谓的“八节”，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冬至、夏至），以及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八个节气。

《淮南子·地形训》曰：“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条风，东南曰景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飊风，西北曰丽风，北方曰寒风。”

《左传·隐公五年》曰：“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西晋作家杜预（222—284）注曰：“八方之风，谓东方谷风，东南方清明风，南方凯风，西南方凉风，西方闾阖风，西北方不周风，北方广漠风，东北方融风。”其中，“谷风”、“凯风”，均出自《诗经》。在《诗经·国风·邶风·谷风》中，有“习习谷风，以阴以雨”的诗句。“邶（bèi）”，古国名，在今中原之汤阴县南。从当地之“谷风”同“以阴以雨”相关的气象特征来看，“谷风”当指来自东方之风。在中原一带，至今尚有“云彩往西，关公骑马披蓑衣”之类的天气谚语。“云彩往西”是在刮东风，“披蓑衣”是在下雨。即刮东风就意味着要下雨。在《诗经·国风·邶风·凯风》中，还有“凯风自南”（凯风来自南方）的诗句。在《山海经·南山经》中，也有所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凯风自是出”的记载。东晋训诂学家郭璞（276—324）云：“凯风，南风。”

《说文解字》：“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闾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漠风，东北曰融风。”

三国时期吴国人杨泉（字德渊）在《物理论》中，说：

“风者，阴阳乱气激发而起者也，犹人之内气，因喜怒哀乐激越而发也。故春气温，其风温以和，喜风也；夏气盛，其风以怒，怒风也；秋风劲，其风清以直，清风也；冬气□（此处缺字——引者注），其风惨以烈，固风也；此四正之风也。又有四维之风，东北明庶，庶物出幽入明也；东南融风，以道以长也；西南清和，万物备成也；西北不周，方潜藏也。此八风者，方土异气，疾徐不同，和平则顺，违逆则凶，非有使之者也。气积自然，怒则飞沙扬砾，发屋拔树；喜则不摇枝动草，顺物布气；天下之性，自然之理也。”这是对八风自然特点的一种拟人化描述。

《观象玩占·八方暴风占》：“北方坎风，名广漠风，又曰大刚风，主冬至四十五日。东北方艮风，名曰条风，主立春四十五日。东方震风，名曰明庶风，主春分四十五日。东南巽风，名曰清明风，主立夏四十五日。南方离风，名曰景风，主夏至四十五日。西南坤风，名曰凉风，主立秋四十五日。西方兑风，名曰闾阖风，主秋分四十五日。西北乾风，名曰不周风，主立冬四十五日。”这里将“八方之风”、“八卦之风”（后天文王八卦方位）、“八节之风”统一了起来。其中，来自西北方的“不周风”，与不周山有关。在《山海经·西山经》中，就记载有“不周之山”。郭璞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币处，因名云。西北不周风自此山出。”

关于“八风时空方位”的以上不同表述可作表7比较。

表7 八风时空方位一览表

空间方位	东北	正东	东南	正南	西南	正西	西北	正北
季节方位	立春	春分	立夏	夏至	立秋	秋分	立冬	冬至
《观象玩占·八方风暴占》	艮风 条风	震风 明庶风	巽风 清明风	离风 景风	坤风 凉风	兑风 闾闾风	乾风 不周风	坎风 广漠风 (大刚风)
《吕氏春秋·有始》	炎风	滔风	熏风	巨风	凄风	飏风	厉风	寒风
《淮南子·天文训》、《易纬》	条风	明庶风	清明风	景风	凉风	闾闾风	不周风	广漠风
《淮南子·地形训》	炎风	条风	景风	巨风	凉风	飏风	丽风	寒风
《左传·隐公五年》杜预注	融风	谷风	清明风	凯风	凉风	闾闾风	不周风	广漠风
《说文解字》	融风	明庶风	清明风	景风	凉风	闾闾风	不周风	广漠风
杨泉： 《物理论》	明庶风	喜风	融风	怒风	清和风	清风	不周风	固风

在中国古代，人们相信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其中之一，叫作“王者八政中，则八风不失；八政不中，则八风失时”（《易纬·易通卦验》）。中者，无过无不及、得中、适中之谓也。

因此，古代的天子在其京城建筑中，往往用“八风”方位，作为其京城城门方位的象征，以示其八政适中。据《吴

越春秋》记载，当年建筑苏州城时，就是仿效天有八风而开了八道陆门、仿效地有八卦而开了八道水门，在西面立“闾门”，以象天门通闾阖风；北魏洛阳城，西面也有“闾阖门”；北魏洛阳城和东晋南朝建康城，西面都有“闾阖门”，北面都有“广漠门”等等。

● 自然阴阳方位

一、以朝阳与正阳为基准的自然阴阳方位。

在中国古代，“阴、阳”是一对很重要的自然观念。“阴、阳”的本义，乃指日光之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万物都有背阴和向阳两个方面。据刘长林先生考察，“在《尚书》中，阳字六见，阴字三见，均为分别使用。其义，阳字大部解作山之南，如‘岳阳’、‘峰阳’、‘衡阳’、‘华阳’、‘岷山之阳’（《禹贡》）等。阴字或为山之北，或以‘暗’作解。如‘南至于华阴’（《禹贡》），‘惟天阴鹭下民’（《洪范》）等。”^①

现在的工具书，也作如是解。所谓“山之北、水之南皆曰阴。”“阳，太阳，阳光；山之南或水之北。”这个说法，就南北方向而言是有道理的，但就东西方向而言又是不完全的。事实上，山之东、水之西亦为阳；山之西、水之东亦为

^① 《国际易学研究》第二辑，华夏出版社，1996年4月，第102页。

阴。即，在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面向太阳的东坡和西水岸为阳；背对太阳的西山坡和东水岸为阴。在太阳升至正南方的时候，面向太阳的南山坡和北水岸为阳；背对太阳的北山坡和南水岸为阴。

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方位是以太阳从东方升起时候的“朝（zhāo）阳”，以及太阳升至中午时候的“正阳”方向为准的。依此为准，能够接受到阳光的山坡和水岸为阳，接受不到阳光的山坡和水岸为阴。若以平原上某地而言，其阴阳方位之区分，与山脉之阴阳方位相同，如表8。

表8 天地自然阴阳方位一览表

地形标志	方 位	
	阳	阴
山 岳	东坡	西山坡
	南山坡	北山坡
平原上 某 地	东 面	西 面
	南 面	北 面
水 岸 (江河湖海)	西 岸	东 岸
	北 岸	南 岸

上述方位如图6。

二、标明自然阴阳方位的中国地名。

这种基于天地自然的阴阳方位，在《山海经》等古籍中有大量的记载。如，《山海经·南山经》曰：“柎阳之山，其阳多赤金，其阴多产白金。”即，柎阳山的南面多赤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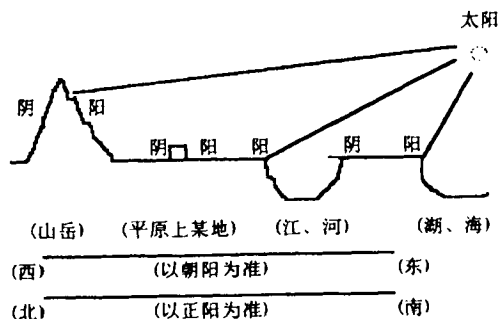


图6 天地自然阴阳方位示意图

的北面多产白金。《山海经·海外东经》曰：“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泊。”朝阳之谷的神名叫天吴，就是所谓的水泊。清嘉庆时进士郝懿行曰：“《尔雅》云：‘山东曰朝阳，水注溪曰谷。’”即山的东面谓之朝阳。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诸多古老的地名中，找到有关自然阴阳方位的大量依据。在带有“阴、阳”二字的中国地名中，大都与其所处之自然阴阳方位有关。它们大体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 以山之南、山之东为“阳”的地名。例如，河南省的“嵩阳县”（今为登封县）、“嵩阳书院”，都位于嵩山之南。甘肃省的“陇阳”，在陇山之南。广西省的“都阳”，在都阳山之南。河北省的“阳邑”，在太行山之东。

2. 以山之北为“阴”的地名。例如，山东省的“蒙阴”，在蒙山之北。山西省的“山阴”，在恒山之北。陕西省的“华阴”，在华山之北。“阴山”，为昆仑山之北支。

3. 以山区或平原上某地之南、之东为“阳”的地名。例如，河南省的“南阳”，位于南召县之南；“舞阳”，位于北舞渡之南。河北省的“平阳”，位于阜平县之东。山东省的“莱阳”，位于莱西之东。甘肃省的“阳关”，位于汉代玉门关（位于敦煌西面）之南；“阳坝镇”，位于豆坝镇之东南；“南阳镇”，位于南河县之东；“太阳”，位于太白之东。宁夏的“城阳”，位于古城之东。安徽省的“陵阳”，位于铜陵之南。江苏省的“丹阳”，位于丹徒镇之南。湖南省的“黔阳”，位于黔城之东；“邵阳”，位于新邵之南。广东省的“潮阳”，位于潮州、潮安之南；“揭阳”，位于揭西县之东；“惠阳”，位于惠州之南。广西的安阳（今为都安），位于保安之东南；“都阳”，位于都阳山之南。贵州省的“册阳”，位于册亨县之南。四川省的“绵阳”，位于绵竹县之东。

4. 以、江、河、湖、海之西岸和北岸为“阳”之地名。例如，河南省的“洛阳”，位于洛河之北；“淮阳”，位于淮河之北；“汝阳”，位于汝河之西北；“安阳”，在淇河之北。安阳，在春秋战国时称邶，又叫“宁新中”。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宁新中在七国时为魏邑。秦昭襄王五十年灭魏，“宁新中更名安阳”。安阳，有安定淇河之阳的意思。后来，不知何时，人们将安阳北面之“洹河”改称为“安阳河”了。这样一改，正好与古代之自然阴阳方位相反。因为，按照自然阴阳方位来说，“安阳河”之南应当是安阴，而不是安阳了。辽宁省的“沈阳”，在沈水之北（沈水下流入浑河，旧名小沈河）。河北省的“海阳”，位于渤海之西北岸。山东

省的“海阳县”和“海阳所”，均位于黄海北岸的山东半岛上。山西省的“汾阳”，位于汾河之西北。陕西省的“泾阳”，位于泾河之北。甘肃省的临洮古时候叫“洮阳”，位于洮河之北。安徽省的“水阳”，位于阳水河之西岸。江苏省的“清阳镇”，位于东青河之北。浙江省的“富阳”，位于富春江之北。湖北省的“长阳县”，位于长江之西岸；古时的“襄阳”，位于襄水（汉水在该段的称呼）之北岸。湖南省的“耒阳”，位于耒水之西岸。江西省的波阳原来叫“鄱阳”，位于鄱江之北岸。海南省的“朝阳”，位于南海之西岸。广西的“灌阳”，位于灌江之西岸。四川省的“酉阳”，位于酉水之西岸。上海的“朝阳”，位于东海之西岸。

5. 以江、河、湖、海之东岸和南岸为“阴”之地名。例如，河南省的“汤阴”，位于汤河之南。陕西省的“汉阴”，位于汉水之东。江苏省的“淮阴”，位于淮河之南；“江阴”，位于长江之南岸。湖南省的“湘阴”，位于湘江之东岸。如此等等。

三、背阴面阳的最佳建筑方位。

基于农业自然文化、源于建筑实践活动的中国风水理论，以背山、面水、向阳方位为最佳的自然方位。就方位而言，所谓的背山、面水，就是既位于山之阳又位于水之阳，二者都是向阳方位。考古发现表明，中国古代乃至远古时代的房屋建筑，大都采取坐北向南或座西向东之方位，即在东、南方向开门。这正是该地区较好的自然方位。在中国所处之地理纬度上，又以坐北向南的自然方位为最佳。这种房

屋，在冬至的时候，由于中午的太阳偏低，阳光可以较多地进入室内，有助于提高室内的温度；在夏至的时候，由于中午的太阳偏高，以及房屋出檐的遮挡，炎热的阳光不致于直射到屋里。因而，坐北向南的房屋，可以收到冬暖夏凉之效。在北京一带，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所谓“有钱不盖东西房，冬不暖来夏不凉”的说法。

如何选择最佳的自然方位，是中国古代风水理论的重要内容。其中的许多论述，即便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也是有一定科学意义的。在世界建筑史上，西欧一些国家虽然没有“风水”这个名词，但是同样涉及到了方位的问题。例如，古罗马时期著名的建筑学家维特鲁威（Vitruvius），在他所撰写的《建筑十书》中，就多次谈到过建筑与自然方位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如果在卧室和书房从东方采光，在浴室和冬季用房从西方，在画廊和需要一定光线的房间从北方，那么这也是属于自然的适合性。因为从北方采光，天空的方向由于太阳的运行就不会忽明忽暗，在一日之中常是一定不变的。”他还注意到“在有屋顶的酒窖中并不从南方或西方采光，而是从北方采光。因为在那一方向什么时候也不致发生（寒暑）交替，经常是一定不变的。又根据同样的理由，朝向太阳轨道的天空之下的肉类和蔬菜不会长期保存。”^①

其实，这种关于面向阳光的方位朝向，以及冬暖夏凉的

^① 维特鲁威著，高履泰译：《建筑十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3页，第15页

气温环境的选择，并非人类所独有，而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自然现象。这一点，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有所认识了。据晋代文献《博物志》记载：“鹊巢门户避太岁，此非才智，任自然也。”就是说，喜鹊筑巢时，会使其门户避开太岁星这个不吉利的方向，这并不是说它很聪明，而是顺应自然的结果。

现在，科学家们对于许多动物巢穴出口之自然取向的研究结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据德国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卡尔·冯·弗里施的观察，位于南半球为烈日灼热所烘烤的澳大利亚大草原，是“罗盘白蚁”的家。“它们的塔形建筑物高达5米，长3米，看上去似乎是从两侧压缩而成。建筑物的两端窄边准确地坐北朝南，所以，暴露于正午烈日的表面很小，而长的两边正对着朝阳和夕阳。寒冷的季节，白蚁上午聚集在东侧，傍晚聚集在西侧，以得到它们最喜欢的温度。”另一位科学家“冈特·贝克尔指出，在他的观察中，他的实验白蚁（大白蚁和土蚁）安放其建筑骨架不是南北向，便是东西向。假如把它们骨架反转过来，几小时后它们一定会转回到原来的方向去。在天然土丘中也观察到对方向有同样的选择。”^①

综上所述，中国建筑辨方正位的总体布局，既是中国古代先民生活经验的一种实践选择，也是中国哲学师法自然的

① [德] 卡尔·冯·弗里施著：《动物的建筑艺术》，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116-118页。

一种具体体现。其中，对于天文、地理、气象等自然方位的认识和表述，又渗透着中国古代易学的智慧，留下了中国文化历史的烙印。

第三章

文化方位与建筑象征

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除了丰富多采的天地自然方位之外，还蕴涵着类型繁多的易学文化方位。易学方位又称易图方位，是以自然方位为基础的一种文化方位。这种文化方位，具有较多的象征意义。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易学文化方位（易图方位）与地理自然方位（地图方位）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易学文化方位，是背北面南来看的，因而是以南为上，即上南下北左东右西或“东方为左，西方为右，南方为前，北方为后”（《易纬·易稽览图》）；地理自然方位，是背南面北来看的，因而是以北为上，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两者正好相反。下面所要介绍的，是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常用的一些易学文化方位系统，其方向均以南为上。

河洛方位

河洛方位，包括河图方位与洛书方位。相传，古时候，黄河中出现了背上有图形的龙马，即所谓“河图”；洛水中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神龟，即所谓“洛书”。河图、洛书，被看作是祥瑞的征兆。伏羲效法河图，画出了八卦；大禹效法洛书，制定了《洪范·九畴》即治理天下的九种大法。河图、洛书，早已失传。对于它们的理解，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北宋哲学家刘牧（1101—1064）根据古籍中的记载，按照一定的数理关系，用黑白点绘成了河图、洛书的图形。后来，与刘牧同时的北宋易学者阮逸在假托关朗之名所作的《关朗易传》中，说：《河图》的样子七前六后，八左九右；《洛书》九前一后，三左七右等等。其说，正与刘牧相反。南宋易学者蔡元定（1135—1198）根据《关朗易传》所画出的河图、洛书，得到了朱熹的支持^①。迄今，流行于世的就是由朱熹所认定的河图、洛书。至于河图、洛书的本义，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历史问题。近年来，一些人所谓的揭破河图、洛书千年之谜云云，不过是言过其实的主观判断和任意比附罢了，均难以成立。

^① 李申：《话说太极图——〈易图明辨〉补》，知识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

下面，主要涉及的是河洛方位在中国传统建筑方面的一些具体应用。

●河图方位

用黑、白点来表示的河图如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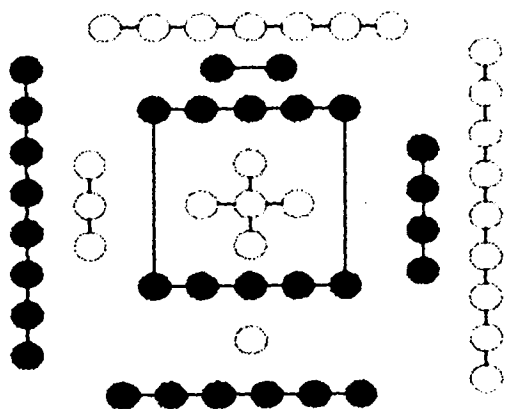


图 7 河图

在图 7 中，阳数（奇数）用白点表示，阴数（偶数）用黑点表示。

用数字所表示的河图如图 8。

《周易·系辞上传》：“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其中，一、三、五、七、九为天数，其和为二十五；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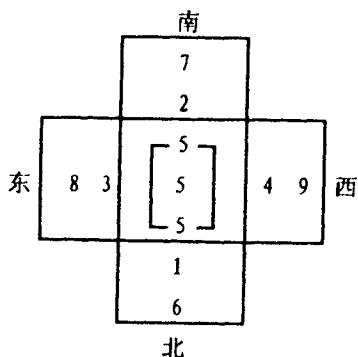


图8 数字河图

六、八、十为地数，其和为三十。天数与地数的总和，为五十五，称之为“大衍之数”。

在十个自然数中，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图08中，每一个方位上的生数与成数之差皆为五：六减一、七减二、八减三、九减四、十减五，均等于五。而且，每一个方位上的生数与中央方位上的生数之差，又均等于该方位上的成数与中央方位上的成数之差。即：五减一、十减六，均等于四；五减二、十减七，均等于三；五减三、十减八，均等于二；五减四、十减九，均等于一。此所谓“盖一、二、三、四，由中宫五十而生，隐藏于四方八数之中”^①。如此等等。

① [清] 江慎修：《河洛精蕴》，学苑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第15页。

这种奇妙无穷的数理关系，象征着宇宙万物统一而又多变的自然奥秘。《启蒙》曰：“《河图》以五生数统五成数，而同处其方，盖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数之体也。”

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河图之数，常常与阴阳、五行并用，或者作为吉祥如意的象征（如明、清时代的天一阁、文渊阁等藏书楼以及钦安殿的设计），或者作为逢凶化吉的象征（如明、清北京紫禁城的东华门门钉之数的处理）。

●洛书方位

洛书方位，又称九宫方位。《易纬·乾凿度》曰：“太乙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

东汉经师郑玄（127-200）注解：太帝居九宫之中的紫宫，八卦神住在其余八方的八宫。太乙神按照一定的顺序巡行九宫。巡行九宫的顺序若用数字表示，即为九宫数字图。南宋数学家又称之为“纵横图”（图9）。

四	九	二
三	五	七
八	一	六

图9 九宫数字图

洛书之数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横竖斜皆合于十五。洛书的方位是：三居东方，九居南方，七居西方，一居北方，五居中央；二、四、六、八分别居于西南、东南、西北、东北四隅。在《黄帝内

经》中，就有用三、九、七、一、五等洛书之数，表示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的实例。

若用符号来表示，即用白点表示阳数（奇数）或天数，用黑点表示阴数（偶数）或地数，则为宋代蔡元定和朱熹所谓之“洛书”（图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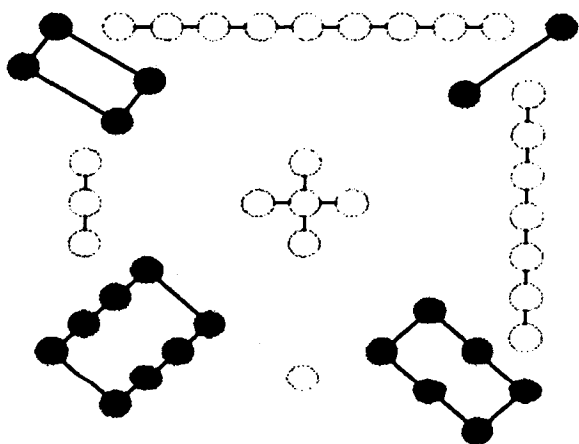


图 10 洛书

在中国建筑史上，严格按照“洛书”方位即九宫方位所设计的典型建筑，首推“明堂九室”。明堂之制，以因时而动为规矩准绳。《淮南子·时则训》曰：“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

朱子曰：论明堂之制者非一，穷意当有九室，如井田之制。东之中为清阳太庙；东之南为清阳右个；东之北为清阳左个。南之中为明堂太庙；南之东，即东之南，为明堂左

个；南之西，即西之南，为明堂右个。西之中为总章太庙；西之南，即南之西，为总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为总章右个。北之中为玄堂（又称元堂）太庙；北之东，即东之北，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为玄堂左个。中为太庙太室。凡四方之太庙异方所。其左右个，则清阳左个即玄堂之右个，清阳右个即明堂之左个也。但随其时之方位开门耳。太庙太室则每季十八日，天子居之欤。（胡渭：《就易图明辨》）明堂九室之平面布局如图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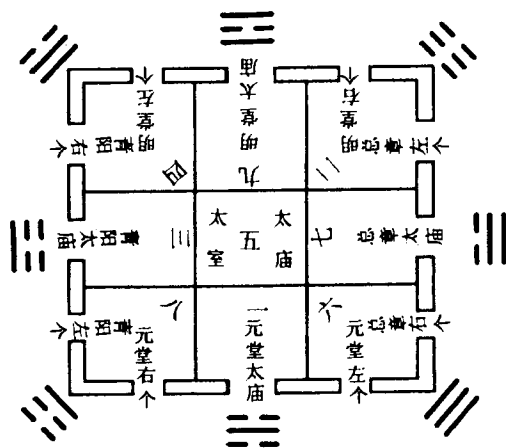


图 11 明堂九室图

易卦方位

按照不同的卦序排列，易卦具有多种类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常用的易卦方位主要有如下几种。

●先天八卦方位

《周易·说卦传·第三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就八卦之自然取象而言，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天在上，地在下。用乾、坤二卦来为八卦定位。艮卦象征山，兑卦象征泽，山上之水流向低处成为泽，泽中之水蒸发上升成为云，两者相互通气。震卦象征雷，巽卦象征风，风雷相互激荡。坎卦象征水，离卦象征火，二者性质相反。八卦之中，乾与坤，艮与兑，震与巽，坎与离，在卦象上均为错卦（又称反卦）。古人认为，八卦可以用来推断以往、预见未来，推断以往是按照发展的顺序往后顺推，预见未来则是按照相反的方向逆推。所以，《易》就是用于逆推未来的一种手段。

后来，北宋的学者邵雍（1101～1077年）依据这一段文字，画出了“先天八卦图”，并托名为伏羲所作，因而又称之为“伏羲八卦图”。其方位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

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其卦序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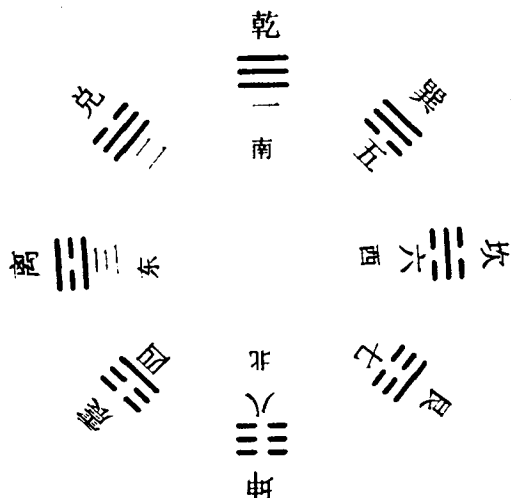


图12 先天八卦方位图

在中国古代的京城建筑中，往往以“先天八卦”之乾、坤、离、坎所象征的天、地、日、月，作为南北中轴线（子午线）和东西中轴线两端即东、西、南、北四正方位的象征。如，明、清北京城之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按照“先天八卦”之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方位来布局的。在南北中轴线上，皇城的南门即天安门，及其北门地安门（又称厚载门），也是按照“先天八卦”乾南坤北的方位来规划的。从八卦的自然取象来看，离为日，为火，在自然阴阳方位中居于阳位，故而“阳”字又写作“炁”；坎为月，

为水，在自然阴阳方位中居于阴位，故而“阴”字又写作“𡇗”。在明、清北京紫禁城北上西门之西的大高玄殿建筑中，就有左右二阁，“左曰炁（注曰音阳）真阁，右曰𡇗（注曰音阴）灵轩”^①。《红楼梦》里所说的“水月庵”中之“水月”，其寓意也为“阴”。

●后天八卦方位

《周易·说卦传·第五章》：“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震卦位居东方，以天象方位而论，象征太阳从东方开始升起；以季节方位而论，东方代表春天，万物的萌芽生长也从这里开始。巽卦位居东南方，在季节上相当于春夏之间，这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阳光普照大地，使得万物鲜

①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638页

明、齐一生长。离卦象征光明，为南方之卦，相当于中午时候的太阳，人们在各个方位都可以看见它；在季节上，相当于夏天；圣人称帝，坐北面南听取天下政务，象征面对光明治理天下，就是取法于这一卦。坤卦象征地，养育万物是地的使命。在空间方位上，坤卦位居西南；在季节上，坤卦相当于夏秋之间。兑卦象征秋天，正是果实累累、万物喜悦的季节；在空间方位上，兑卦位居西方。乾卦位居西北方，正值太阳西沉之时。这时候，阴阳、明暗正处于挣扎交替之中；就季节而论，乾卦相当于秋冬之间。坎卦象征水，位居正北方。这时候，太阳已经完全沉没，白昼已尽，黑夜来临；在季节上，坎卦相当于冬天，正是万物劳累一生之后回归大地之时。艮卦位居东北方，就昼夜之更替而言，正当黎明时分，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它既是前一天的终结，又是另一天的开始；就季节而论，艮卦相当于冬春之间。以上皆为八卦之自然取象。

此外，《周易·说卦传·第十章》，还有关于八卦之人事取象的如下论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乾卦代表天，为纯阳，为父；坤卦代表地，为纯阴，为母。为母之坤卦向为父之乾卦索取一阳爻而生男，最先得到一阳爻的震卦为长男，其次得到一阳爻的坎卦为中男，第三次得到一阳爻的艮卦为少男。为父之乾卦向为母之坤卦索取一阴

爻而生女，最先得到一阴爻的巽卦为长女，其次得到一阴爻的离卦为中女，第三次得到一阴爻的兑卦为少女。

邵雍根据上述文字，画出了“后天八卦图”，并托名为文王所作，故而又称之为“文王八卦图”。其卦序，以《周易·说卦传·第十章》为根据，依次为：乾一、坤二、震三、坎四、艮五、巽六、离七、兑八。其方位，以《周易·说卦传·第五章》为根据。（见图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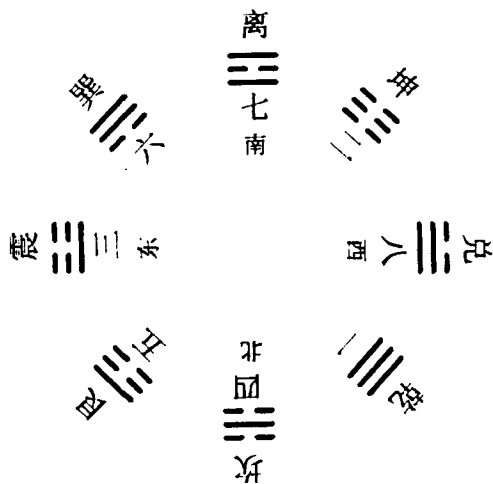


图13 后天八卦方位图

“后天八卦方位”，在中国的皇家建筑和民间建筑中，都有所应用。后天八卦以离坎定南北，离南、坎北，离为火、坎为水。这与正五行之南方火、北方水的方位，是完全一致的。在明、清北京紫禁城中，被道教尊为水神的元天上帝之庙“钦安殿”，之所以建在南北中轴线的北端，正是以此为

依据的。后天八卦方位，在中国古代京城的规划设计中，也有广泛的应用。在后天八卦方位中，乾为天，位居西北方；坤为地，位居西南方。北魏邺城的南城中，西北方位有乾门，西南方位有厚载门。隋唐洛阳城，也是按照这一方位来规划的。其中，天子所居的宫城位于京城的西北乾方，京城的西南坤方有“厚载门”。元上都城内，在宫城的西北乾方，建有“乾元寺”。元代大都城中，在皇城的西北乾方（阜城门内白塔寺西侧）建有“天帅府”。明代宣德年间，又在元代天帅府旧址建有“朝天宫”。明宪宗朱见深（1447—1487）曾有诗云：“禁城西北名朝天，重檐巨栋三千间。”^① 今阜城门东北还有宫门口东廊下、西廊下之旧名。乾方，又称作天门。北京城内，北海公园白塔山上“仙人承露盘”的方位变迁，就是以后天八卦方位为依据的。相传，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迷信长生不老的方术。下令按照一个道士的说法，在建章宫建造了一个仙人承露盘。企图服用天降之露水搅拌的玉石屑，以求延年益寿。元初，在陕西发现了一个铜人承露盘，说是汉武帝的仙人承露盘。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命人运至大都，立在琼华岛的东侧山坡上。因为，按照四季方位，东方属春，主生。据道士说，服用生方之露，可以祛病延年。到了明代，嘉靖（1507—1566）也是一个迷信方术的皇帝。他听道士说，乾方为天门，必须服

①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837页。

用天门之露，才能有效。于是，又下令将仙人承露盘从东山坡移到了西北山坡。这就是现在人们所看到的仙人承露盘所在的位置^①。此外，在陵墓的命名上也反映了明显的方位意识。例如，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其长安都城的西北方，故而名曰“乾陵”。方位意识，在古人生活中的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后天八卦还经常与其它文化方位系统相结合而被广泛地加以应用。

●十二月卦方位

十二月卦，又称十二辟卦、十二消息卦。见表9。

表9 十二月卦与四季方位对照表

十二月卦		一 年	
序号	卦 名	月 份	季 节
01	复 卦	十一月中气	冬
02	临 卦	十二月中气	冬
03	泰 卦	正月中气	春
04	大壮卦	二月中气	春
05	夬 卦	三月中气	春
06	乾 卦	四月中气	夏
07	姤 卦	五月中气	夏

^① 陈文良、魏开肇、李学文：《北京名园趣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91-92页。

续表

十二月卦		一 年	
08	遁 卦	六月中气	夏
09	否 卦	七月中气	秋
10	观 卦	八月中气	秋
11	剥 卦	九月中气	秋
12	坤 卦	十月中气	冬

此说由汉代易学家孟喜所提出。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有十二卦比较特殊，称为十二辟卦。其爻象为：阴爻与阳爻各居一端，互不相掺。孟喜以十二辟卦代表一年十二月，以及一年节气中的中气；十二卦共有七十二爻，代表七十二候。中国古代，将每一年分为十二个月，每个月分为两个节气，每个月的月初称为节气，月中以后称为中气。每一节气又分为三候，即初候、次候、末候，五日为一候，一年共七十二候。

若用黑、白格表示阴爻、阳爻，经过拓扑变形后的十二月卦，再配之以四方、四季、十二地支、十二月分、二十四节气等，又可以得到如下之十二月卦时空方位图（图14）。

其中，刚柔二爻的变化，体现了阴阳二气的消长过程。前六卦，即从复卦到乾卦，表示阳爻自下而上逐渐增长，象征阳气逐渐上升；复卦之爻象为一阳生，临卦为二阳生，泰卦为三阳生，大壮卦为四阳生，夬卦为五阳生，乾卦为六爻皆阳，象征阳气上升到了极点。此为阳息的过程，同时也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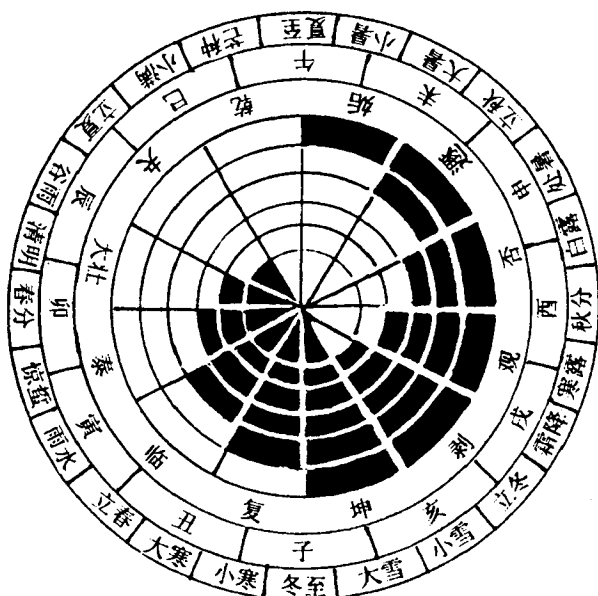


图14 十二月卦时空方位图

阴消的过程。后六卦，即从姤卦到坤卦，表示阴爻自下而上逐渐增长，象征阴气逐渐上升；姤卦之爻象为一阴生，遁卦为二阴生，否卦为三阴生，观卦为四阴生，剥卦为五阴生，坤卦为六爻皆阴，象征阴气上升到了极点。此为阴息的过程，同时也是阳消的过程。关于七十二候，复卦初九爻表示阳气始动，为十一月冬至次候，到乾卦六爻皆阳，表示阳气盛极，为四月小满次候。姤卦初六表示阴气始动，为五月夏至次候，到坤卦六爻皆阴，表示阴气盛极，为十月小雪次候。这样，十二辟卦又象征着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的阴阳

变化。因此，十二月卦又称为十二消息卦。就十二卦之爻象变化而言，前六卦为阳息阴消，因而被称作息卦；后六卦为阴息阳消，因而被称作消卦。中国古代，有所谓“息卦主禄，消卦主刑”之说（《易纬·易稽览图》）。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前面提到的所谓春天主生、秋天主杀，左阳右阴、阳德阴刑观念的一种引申。

从图 14 可知，在一年之中，冬至正处于坤卦向复卦转变之时，乃阴极而阳生之节气；夏至正处于乾卦向卦转变之时，乃阳极而阴生之节气。在中国古代，“天子”在冬至要到天坛去祭天，在夏至要到地坛去祭地。在一天之中，由坤卦转变到复卦之时为子夜，由乾卦转变到卦之时为午时。在清乾隆三年（1738 年）御制冬至斋居诗中，有所谓“灰飞子夜调元律，又喜天心复一阳”的诗句。这一诗句，正是对上述方位的生动反映。

八门方位

《淮南子·地形训》：“八紘之外，乃有八极。自东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苍门；东方曰东极之山，曰开明之门；东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阳门；南方曰南极之山，曰暑门；西南方曰编驹之山，曰白门；西方曰西极之山，曰阊阖之门；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门；北方曰北极之山，曰寒门。”（表 10）

表 10 八方、八极与八门方位对应一览表

八 方	八 极	八 门
东北方	方土之山	苍门
东方	东极之山	开明之门
东南方	波母之山	阳门
南方	南极之山	暑门
西南方	编驹之山	白门
西方	西极之山	闾阖之门
西北方	不周之山	幽都之门
北方	北极之山	寒门

实际上，八门文化方位，蕴含着四象方位（如苍门、白门）、四季方位（如开明之门、暑门、寒门）、八风方位（闾阖之门），以及自然阴阳方位（如阳门），是一种综合性的方位系统。它在实用上，与上述诸多方位系统之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四门方位

这里所说的四门方位，指的是分别位居西北、东南、西南、东北四隅的“天门、风门（又称地户）、人门、鬼门”。《易纬·易乾坤凿度·立乾坤巽艮四门》：“乾为天门。圣人画乾为天门，万灵朝会众生成。其势高远，重三三而九，为阳德之数，亦为天德。天德兼坤数之成也，成而后有九。万形

经曰，天门辟元气，易始于乾也。”“坤为人门。……画坤为人门，万物蠢然，俱受荫育，象以准此。坤能德厚迷远，含和万灵，资育人伦。人之法用，万门起于地利，故曰人门。”“巽为风门亦为地户。……万形经曰，二阳一阴，无形道也。风之发泄，由地出处，故曰地户。户者，牖户，通天地之元气。”“艮为鬼冥门。上圣曰，一阳二阴，物之生于冥昧，气之起于幽蔽。地形经曰，山者艮也，地土之余，积阳成体，石亦通气，万灵所止，起于冥门。言鬼其归也，众物归于艮。艮者止也，止宿诸物。……艮静如冥暗，不显其路，故曰鬼门。”（《易纬·易乾坤凿度》）

东汉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说：“《山海经》又曰：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这里所说的“鬼门”，是神话中的地名。又据《周礼·大司徒疏》引《河图括地象》曰：“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户无下”。由此可知，天门、地户（又称风门）、人门、鬼门，是分别与“后天八卦”中“乾、巽、坤、艮”之四维方位相对应的。这一方位系统，在《宅经》中就有所应用。（见图15，引自《宅经》）

其中，“后天八卦”是由外向里看的。东、南、西、北四正方位，由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十二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来表示。

此外，据考古发现，早在汉代棁盘（六壬棁盘）的方形地盘上，就已经用“天”、“土”（地）、“人”、“鬼”，来分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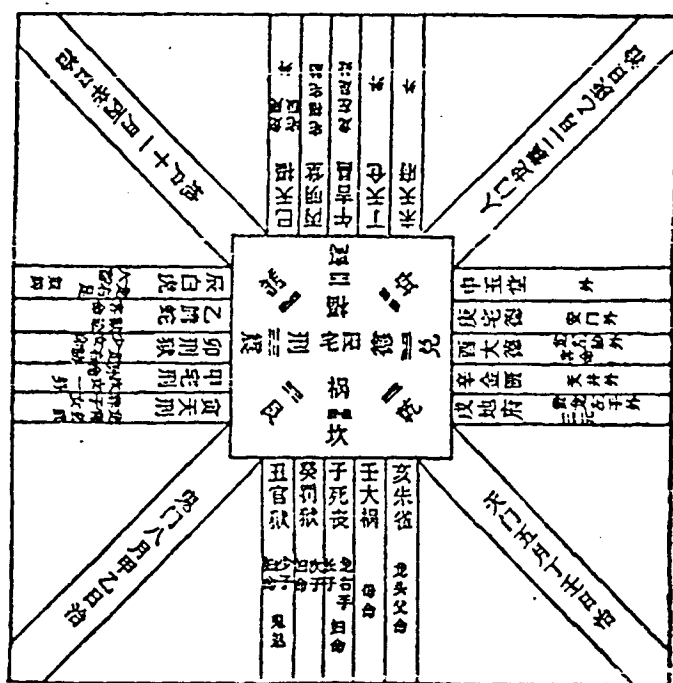


图 15 天地人鬼四隅方位图

表示“西北”、“东南”、“西南”、“东北”四隅方位了。地盘上面是圆形的天盘(图 16)。

在风水理论中,位于乾方的天门,以及位于巽方的地户,常常被用来作为“水口”的方位。天门谓之“入水口”,地户谓之“出水口”。中国的传统建筑,非常注重排水的通畅问题。无论是来自天上的雨水,还是来自渠道的河水,都以排水通畅为好。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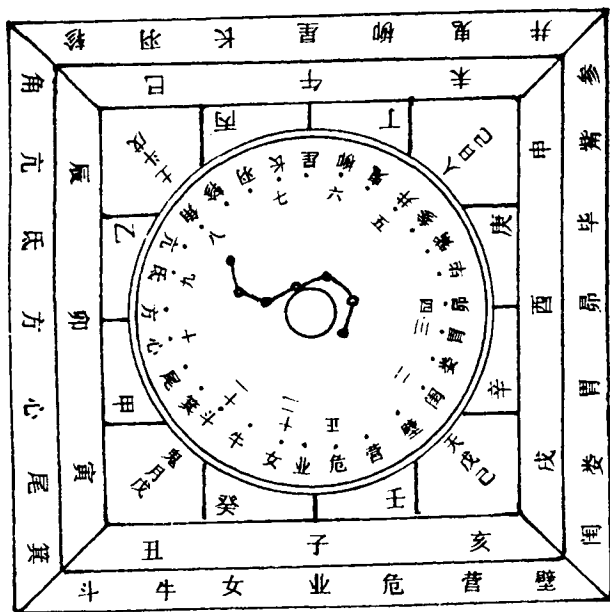


图 16 汉代日晷示意图

低，多数江河的流向都是自西北而向东南。上述地理特点，集中地反映在这样一个著名的神话传说中：“天地初不足，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鳌足以立四极。其后，共工氏与颧项争帝，而怒触不周之山，折天柱，绝地维。故天后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满东南，故百川水注焉。”^①此外，由于“水”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风水理论中还

^① [晋] 张华：《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5页。

有一种说法，叫做“入山寻水口，……凡水来处谓之天门，若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夫水本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则财用不竭”（《入山眼图说·卷七·水口》）此说，在神秘的色彩下，反映了古代先民对于“水”资源的重视。基于这种观念，中国古代的京城建筑，大都把西北乾方规划为“入水口”，把东南巽方作为“出水口”。例如，明、清北京城内的水系，就是自西北乾方的积水潭水关入，自东南巽方的通汇河出；明、清北京紫禁城内的金水河，则是自玄武门（即神武门）西侧的地道入，自銮驾库东南巽方出。在民居建筑中，坐北向南的住宅，也大都在东南巽方开设出水口。其道理很简单：巽者，顺也；求个排水顺畅罢了。至于能否真的因为水口设置的合理而发财，就不必太认真了。

四德方位

《周易》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卦卦辞曰：“元亨利贞。”乾卦取象于天，但不是取象于天之体，而是取象于天之性。天之性为健，即天体运行、永不停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和改变它。天体运行、永不停息的显著标志，就是春夏秋冬四季之交替变更。卦辞是用来解释卦义的。“元亨利贞”，合而言之即为“健”；“健”，分而言之即为“元亨利贞”。古人对“元亨利贞”有不同的释义：释为四季之天象，

即春夏秋冬；释为人事之四德，即仁义礼智。因而，“元亨利贞”又称之为四德。《左传·襄公九年》：“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①“仁义礼智”四德，加上“信”字，又称为五常之德，简称五常。

在《易纬》中，曾以八卦配五行之气和五常之德。其具体配法是：东方配仁，西方配义，南方配礼，北方配信，中央配智^②。在后来所流行的五常方位中，则是东仁、西义、南礼、北智，以信居中。在建筑命名中，最常用的也就是以信居中的五常方位。五常方位与四德方位、四季方位、地理方位，以及主体方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四德、五常方位与自然方位对应一览表

地理方位	东	南	中	西	北
主体方位	左	前		右	后
四季方位	春	夏		秋	冬
四德方位	元 仁	亨 礼		利 义	贞 智
五常方位	仁	礼	信	义	智

① 《左传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798页。

② 朱伯崑主编：《易学基础教程》，广州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18-219页。

四德之中，“仁与义”乃人道之根本。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周易·说卦传》）“儒家者流，……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汉书·艺文志》）。《易纬·易乾凿度》曰：“天动而施曰仁，地静而理曰义。仁成而上，义成而下。上者专制，下者顺从。正形于人，则道德立而尊卑定矣。”在这里，仁义又成了专制顺从、上下尊卑的象征。仁义之中，又以仁为本。所谓“仁者，义之本。”（《礼记·里运》）“义者，人之断制。”（《朱子语类》卷六）“和于气为春，和于理为仁。”（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春为四季之首，仁为四德之首。因而，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仁、义、礼、智”四德，特别是其中的“仁、义”二德，尤其是“仁”德，常常被用来作为执中含和的方位象征。此外，中国古代，文崇仁，武尚义。因而，在方位上，左仁右义，又与左文右武相一致。以历史上的北京城为例：金中都城，左有施仁门，右有彰义门，前有端礼门，后有崇智门。元大都城，左有崇仁门（今为东直门），西有和义门（今为西直门）。明代燕府王城，左有体仁门，右有遵义门，前有端礼门，后有广智门。明、清北京城，东四牌楼中，南北二牌楼皆名为大市街，左面为履仁，右面为行义；在西四牌楼中，南北二牌楼也为大市街，左面为行仁，右面为履义。明、清北京紫禁城内，文华殿前，左配殿曰本仁殿，右配殿曰集义殿；清代太和殿前，左有体仁阁，右有弘义阁；乾清宫左面日精门外有崇仁门，右面月华门外有遵义门；明嘉靖年间改建乾清宫右小阁名曰道心，旁左门曰仁荡，右门曰义

平；明隆德殿前，左配殿曰春仁，右配殿曰秋义；以仁字命名的景仁宫，在东宫；乾清宫，左偏殿曰昭仁殿，右偏殿曰弘德殿；养心殿，左配殿曰履仁斋，右配殿曰一德轩。如此等等。清代乾隆在御制昭仁殿敬志诗中，有如下诗句：“发仁止义斯昭德，得位安居莫忘危”^① 其中，特别强调了四德之首的“仁”的重要意义。

此外，至少从唐代以来，四德方位中的左仁右义方位，已经在里坊制度中有所应用了。唐代长安城，以“仁”字命名的里坊，多在南北大街的左侧；以“义”字命名的里坊，则多在右侧。如：在中间朱雀门大街两侧，左面有亲仁坊、安仁坊，右面有通义坊、宣义坊、敦义坊、归义坊；在皇城两侧，左面有崇仁坊，右面有义宁坊。隋唐洛阳城，洛水以南部分的中轴线两侧，左面有静仁、仁风、怀仁、归仁、利仁、里仁、睦仁、仁和等坊，右面有教义、明义、承义等坊。元大都的里坊命名也是如此，据《元一统志》记载：“嘉会坊，坊在南方，南方属礼。取义周易嘉会之义以名。……由义坊，西方属义故，居仁坊地在东市，东属仁，取孟子居仁由义之言，分为东西坊名。……万宝坊，大内前右千步廊，坊门在西属秋，取万宝秋成之义以名。”^②

① [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7月第1版，第436页。

②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601页。

五行方位

《尚书·洪范》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左传》中就提出了“水胜火”、“火胜金”的“五行相胜”说。“相胜”，又称之为“相克”。汉代文献中又明确提出了“五行相生”说。董仲舒说：“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春秋繁露·五行之义》）并认为“五行者，比相生而间相胜也。”即：“木生火，水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春秋繁露·五行相生》）“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水。”（《春秋繁露·五行相胜》）五行之间“比相生间相胜”的相互关系，可用图 17 示意。

五行学说的流行，对易学和风水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风水理论，是中国最早而又带有神秘色彩的建筑理论。其中，以五行表示方位的所谓“风水五行”，有许多种类。兹择其最为常用者，简要述之。

● 正五行方位

所谓“正五行方位”，即“五行”与“东、南、西、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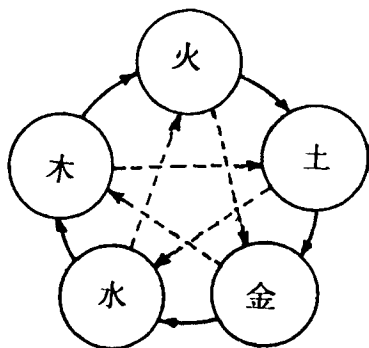


图 17 五行生克示意图

四正方位及“中央”方位相配，并具有逐一对应的关系。正五行与五方之对应关系为：东方木，南方火，西方金，北方水，中央土。（见表 12）

表 12 正五行方位对照表

五 方	东	南	中	西	北
正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


“木（𣎵），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

“火（𤇀），毀也。南方之行，炎而上象形。”

“土（土），地之吐生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行也”。古人视“土”为中央之行，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土为本”的农业自然文化观念。

“金（金），五色金也，……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

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

“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也。”

许慎对五行的上述解释，同“正五行方位”基本一致。正五行用于定方位，即标志中央与四正方位。

在四季方位中，东方属春，主生；木为东方之行，也主生。中国活人居住的阳宅建筑多用木材营造，很可能与此有关。西方属秋，主收；金为西方之行，也主收。故而，秋天又称之为“金秋”季节。唐代长安城中，朱雀门外之东西中轴线大街的东侧城门为春明门，与之相对应的西侧城门为金光门，即分别寓意着春光明媚、金秋时光。

● 八卦五行方位

“八卦五行方位”，简而言之，是将“五行”与“后天八卦”相配。其对应的方位关系为：震、巽为木；离为火；坤、艮为土；乾、兑为金；坎为水。（见表13）

表13 八卦五行方位对照表

自然方位	东北	正东	东南	正南	西南	正西	西北	正北
八卦方位	艮	震	巽	离	坤	兑	乾	坎
五行方位	土	木	木	火	土	金	金	水

“八卦五行”以司形局，也是“大游年方位”的基础。

●天干五行方位

“天干”，是中国古代用来表示顺序的符号系统之一。其内容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符号，又称为“十天干”或“十干”。它常与“地支”相配合，用以纪年月日时，叫作“干支”，取义于树木的干枝。十天干又有阴阳之分，按照各自所处的顺序位置，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素问·入式运气论奥·论十干》：“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五行各一阴一阳，故有十日”。天干五行之对应关系如表 14 所示。

表 14 天干五行方位对照表

五 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 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十天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地支五行方位

中国古代用来表示顺序的另一个符号系统，就是“地支”。“地支”依次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符号，又称“十二地支”或“十二支”。“十二地支”，在时间方位上，除了用来表示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之外，还常用来表示一天中的十二个时辰。每个时

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所谓“小时”，就是“小时辰”，也就是“半个时辰”的意思。十二时辰与二十四小时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15。

表 15 时辰与小时对照表

十二时辰	俗称	24 小时
子	夜半	23—24
丑	鸡鸣	1—2
寅	平旦	3—4
卯	日出	5—6
辰	食时	7—8
巳	隅中	9—10
午	日中	11—12
未	日昃	13—14
申	哺时	15—16
酉	日入	17—18
戌	黄昏	19—20
亥	人定	21—22

“十二地支”也分阴阳；按照其前后顺序的位置，位居奇数位置者为阳，位居偶数位置者为阴。即：“子、寅、辰、午、申、戌”为阳，“丑、卯、巳、未、酉、亥”为阴。“十二地支”与“五行”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16 所示。

表 16 地支五行方位对照表

五 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 行	木	火	土	金	水
十二地支	寅卯辰	巳午未	辰戌丑未	申酉戌	亥子丑

其图示如图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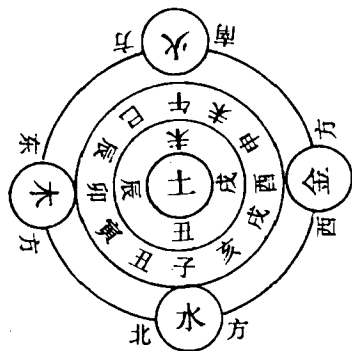


图 18 地支五行方位示意图

在都城建筑的规划设计中，地支五行的子午线，往往就是都城的中轴线。

以上几种，是风水术中最常用的五行方位。此外，还有所谓“洪范五行”（又称宗庙五行）、“四经五行”（“正五行”舍弃中宫只用四正方位之四行）、“三合五行”（由“四经五行”类合而成）、“河图五行”（由“五行”配“河图”而成）等等。^①

^① 王玉德著：《神秘的风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1 版，第 174—177 页。

五色方位

与五行方位密切相关的是五色方位。据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青（𡗗），东方色也。木生火，火生丹”。

汉代班固在《白虎通·社稷》中，称：“东方色青”。

“赤（𡗗），南方色也。从大从火，……古文从炎土。”

“黄（𡗗），地之色也。从田从”。“地，即土地。土，为中央之行。与土地相应的黄色，即为中央之色。

“白（𡗗），西方色也。”

“黑（𡗗），火所熏之色也。从炎上出𡗗；𡗗，古𡗗字。”

许慎在这里虽然没有说明黑色所象征的方位，但是，按照中国古代关于“青、赤、黄、白、黑”五色与五行的相应关系来推断，黑色当为北方之色。五色方位与五行方位之对应关系，如表 17 所示。

表 17 五色与五行方位对照表

五方	东	南	中	西	北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行生克观念及其相应的五色观念，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着很深的影响。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观念在中国的

传统建筑及其使用方面，也有鲜明的体现。

● 京师之地，分为五城

相传辽主燕京五方，五方各镇以塔，按照五行五色方位，塔分五色。但由于战争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只有今天阜城门内的白塔保存了下来。“今四色中，黑塔、青塔废，其寺在，人呼黑塔寺、青塔寺云。”^① 这里所说的黑塔寺、青塔寺，即大天源延圣寺与永福寺。^②

元大都时期，大都城按照五行分为五个城区加以管理。据《天府广记》记载：“京师之地分为五城，……每城设有兵马司，其制始于元。……兵马司夜巡，赴尚宝司领令牌，东城木字，西城金字，中城土字，南城火字，北城水字。”^③ 这种制度，至明、清一直沿用了下来。据《燕都丛考》记载：北京“内城周四十里，门九。清时定制分五城”。

● 八旗拱卫，方位相胜

据瀛云萍先生考察，“‘满洲’一词接替女真族名使用，

① [清]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82-183页。

② 《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75页。

③ [清] 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1页。

始于清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次年改国号为“清”。满、洲、清三个汉字都含有三点水。使用这三个汉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因满洲人非常重视‘五行生克’学说。当时汉族的明帝国有三重‘火’的意识在内；汉族之称，来自汉朝，汉以火德王，用赤旗，称炎汉。‘炎’字分明是双火组成的；‘明’字是日月二字组成的，日有火意，而帝室姓朱，朱赤色亦有火意，故朱明之合亦一火也。故用满洲族名之双水以灭‘炎汉’，用清之一水以灭明火。因五行生克，‘水能克火’也。”^①从“大清”入关之后的一些行为来看，此说是不无道理的。

据《八旗通志》记载：“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分列八旗，拱卫皇居。镶黄居安定门内，正黄居得胜门内，并在北方。正白居东直门内，镶白居朝阳门内，并在东方。正红居西直门内，镶红据阜城门内，并在西方。正蓝居崇文门内，镶蓝居宣武门内，并在南方。盖八旗方位相胜之义，以之行师，则整齐纪律，以之建国，则巩固屏藩，诚振古以来所未有者也。”^②即用镶黄旗和正黄旗来守卫北城，象征土克水；用正白旗和镶白旗来守卫东城，象征金克木；用正红旗和镶红旗来守卫西城，象征火克金；用正蓝旗和镶

^① 瀛云萍：《八旗源流》大连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87页。

^②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78页。

蓝旗来守卫南城，象征水克火。八旗无黑，以蓝代之。此外，据说当年在北海小白塔后面，还立有五根号杆，俗称五虎号杆，并备有蓝（青）、红（赤）、黄、白、黑五色龙旗和五色灯笼，以为防变指挥之用。相应地，在东、西、南、北四面城门上，各自备有号杆及其五行色的龙旗和灯笼。若敌人在白天东面攻城，东直门、朝阳门的号杆上就挂起蓝色龙旗，白塔山上的号杆也随即挂起蓝色龙旗。夜间有变，就挂起蓝色灯笼。城内八旗看到蓝色龙旗或蓝色灯笼，就立即集合队伍，去东城迎敌。若敌人同时从四面进攻，白塔山上就同时挂起四种颜色的龙旗或灯笼。若城内有变，或敌人已经攻入城内，就挂起黄色的龙旗或灯笼。在挂起龙旗或灯笼的同时，还要放二十一响信炮^①。值得注意的是，八旗分四种颜色，只能象征金、火、土、水四行。这里，五行单单少了一个木行。让正蓝旗、镶蓝旗以蓝代黑象征水行，而不是以蓝代青象征木行。究其原因，就是由于东方之木能克中央之土；以木行象征旗兵，则有威胁中央皇权之义。这同八旗部队防备外侵、拱卫皇居的职能是背道而驰的。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凡是用正五行来象征皇家居中央地位者，都要遇到一个木克土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一尴尬的局面，都要在东方木行上做些文章。在这里是采取的五行缺木的办法，在明清、北京紫禁城东华门的建筑设计上，则是采取的将每扇门

^① 陈文良、魏开肇、李学文：《北京名园趣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85—88页。

的门钉去掉一行，从而将门钉从阳数降为阴数，使阴木不能克阳土的办法（详见本书“易学象数与皇家建筑”部分的有关论述）。

●社稷坛台，五方五色

古代都城建筑中所谓的“左祖右社”之“社”，即社稷坛。社稷坛乃历代帝王和诸侯隆重祭祀之场所。据《白虎通义》：“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土地广博不可遍敬也，五谷众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上尊。稷五谷之长，故封稷而祭之也。”

都城设立的社稷坛，称作太社太稷，由帝王主祭；各郡县设立的坛称作社稷，由帝王派出的郡县官吏主祭。明、清时代北京城的社稷坛，是一座二层方台，“四出陛，皆白石，各四级。上层分作东、南、西、北、中五方，分别筑以东青、南赤、中黄、西白、北黑五色土。四周的坛墙各开一门，其颜色与四方之土色相同。五色土分别代表着五方五行，象征着全国各地的领土。

二十四山方位

“二十四山”，又称“二十四向”、“二十四至”、“二十四到”或“八千四维二十四山”。

这是由“后天八卦方位”中的“四维”（乾坤艮巽），
“十天干方位”中的“八干”（甲乙丙丁庚辛壬癸），以及
“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戊未申酉戌亥）所组成的一种方
位系统。（见图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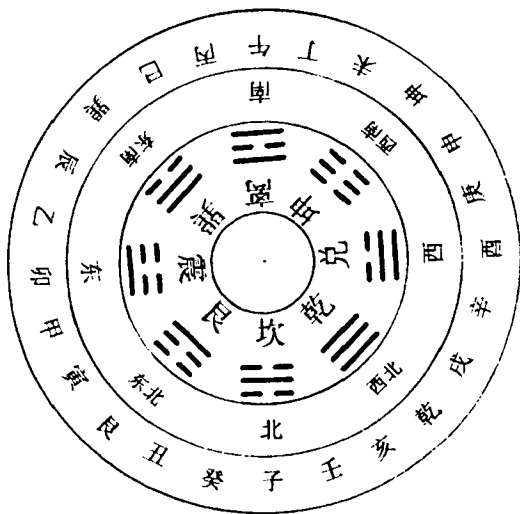


图 19 二十四山方位示意图

这一方位系统，早在汉代栻盘、汉代司南的地盘上，就已经有所应用。后来，又用于罗盘上天盘、地盘、人盘的方位刻度。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这种二十四分法，既用以定向，又用以纪时。作为一种纪时制度，其名称与时序，同罗盘上的“二十四山”完全相同。罗盘上的二十四山，同其他相关的方位系统一样，主要用于确定天地自然方位。

文化阴阳方位

在易学中，由卦象所表达的“文化阴阳方位”，是以“自然阴阳方位”为基础的，是对“自然阴阳方位”的扩展与补充。

● 易卦方位，阴阳分明

在“先天八卦方位”中，乾卦位居正南，坤卦位居正北，离卦位居正东，坎卦位居正西。“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为日”、“坎为水，……为月”（《周易·说卦传》）。其中，天、火、日均为阳，地、水、月均为阴。按照面南而视的易学方位来说，其阴阳方位即是：南为阳，北为阴；左为阳，右为阴。或“东方少阳”、“西方少阴”、“南方太阳”、“北方太阴”^①。少阳，有阳气发动之义；少阴，有阴气发动之义；太阳，有阳气旺盛之义；太阴，有阴气旺盛之义。在前面讲到的“十二月卦时空方位图”中，每一卦之阴爻和阳爻在各个方位上的分布，可列表统计如表 18。

① [晋] 张华著：《博物志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 版，第 28—29 页。

表 18 十二月卦阴阳爻之数量分布统计一览表

四方	东北	东	东南	南	西南	西	西北	北
十二月卦的 阳爻数量分布	6	21	15	27	12	15	3	9
十二月卦的 阴爻数量分布	12	15	3	9	6	21	15	27

其中，就东、西方位而言，是东方多阳、西方多阴；就南、北方位而言，则是南方多阳、北方多阴；就四隅方位而言，是东南多阳、西北多阴。上述文化阴阳方位，同前面所说的自然阴阳方位基本上是一致的，同北半球的实际天象以及先民们避寒趋暖的生活经验也是相符合的。

●传统习俗，左阳右阴

文化阴阳方位随着古代先民概括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发展，“阴、阳”由本来意义上的自然观念上升到了哲学观念。哲学意义上的“阴、阳”观念，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它概括了许多具有对立而又统一的关系。其中，最常见的一些内容，如下表 19 所示。

表 19 哲学阴阳观念常见内容对照表

阳	明	向	上	高	前	左	凸	实	长	粗	大	生	天	日	火	刚	雄	男	德	仁	文	长
阴	暗	背	下	低	后	右	凹	虚	短	细	小	死	地	月	水	柔	雌	女	刑	义	武	幼

文化阴阳方位，在中国的传统习俗中，从皇家到民间，从古往到今来，从生活方式到建筑装饰，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人之相处，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是中国数千年来留下的一种传统习俗。例如，夫妻之间，从生前在正式场合一起站立、落坐和拍照时的所处位置，到死后在墓穴中双方棺材摆放的位置，乃至双方姓名在墓碑或牌位上书写的位置，都讲究左阳右阴、男左女右。这些现象，人们不仅可以在中国的传统戏剧中看到，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也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习俗，可以说都是历来崇尚周礼之风的延续。至于中医在给不同性别的病人诊病号脉时，甚至一些江湖术士在给人看手相时，也讲究个男左女右，个中是否有科学道理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二、石狮摆放，左雄右雌。

在建筑方面，一个典型的实例，就是摆在大门左右两侧的一对石狮子。传说，狮子是由异域传入的兽中之王^①。据《尔雅·释兽》：“狻猊，如虬猫，食虎豹。”《注》：“即师子也，出西域。”^②。狮子可能是随着佛教而传入中国的。据考古发现，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动物造型中，有龙和虎。在同干支纪年相对应的十二生肖（十二属相）中，也有龙和虎。其

① 吴泓、刘江编著：《中国名胜古迹之谜》，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7页。

②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修订第1版，第2009页。

顺序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在《周易》中，关于动物的记载很多。其中，与十二生肖相关的有：鼠、牛、虎、龙、蛇、马、羊、鸡、狗、豕（猪）。此外，还有豹、鹤、龟、雉、蚌等等。唯独缺少一个“狮子”。印度的十二生肖与中国的十二生肖差不多，其顺序为：鼠、牛、狮、兔、龙、蛇、马、羊猴、金翅鸟、狗、猪。其中，只是把虎换成了狮，把鸡换成了金翅鸟。中国古代先民原来是把虎看作兽中之王，这不仅是因为老虎的凶猛厉害，而且同老虎脑门上那三横一竖的花纹正好与汉字中的“王”字非常相似密切相关。据说，印度的十二生肖，原来是十二位神将的坐骑。后来，不知从何时起，来自异域的兽中之王的狮子，就成了守门看户的吉祥动物了。狮子传到中国之后，就逐渐与讲究阴阳之和的中国文化相融合了。在中国，一般说来，看门的石狮子，都是一雄一雌、成双成对的。而且，其摆放的位置都是左阳右阴、左雄右雌。由于中国的石狮子，经过修饰美化之后，都是满头卷毛、威武雄壮的样子，单凭狮子的头部是难分雌雄的。为了区分雌雄起见，工匠们将位于门口左侧的雄狮雕成右前爪玩耍着绣球或两前爪之间有一绣球、将位于门口右侧的雌狮雕成左前爪抚摸着幼狮或两前爪之间卧一幼狮的可爱形象。因此，不管大门是什么朝向，当你从门里出来的时候，爪下有绣球的雄狮总应该在你的左侧，爪下有幼狮的雌狮总应该在你的右侧；当你从门外进入的时候，其方位恰好相反。以北京天安门城楼下面的门洞为例，当你从面向南方的门洞进去的时候，其

两侧的石狮子，一定是雄狮在你的右侧即在门洞的东侧，雌狮在你的左侧即在门洞的西侧；其面向北方的门洞两侧的石狮子，一定是雄狮在西侧，雌狮在东侧。同理，坐西向东的颐和园院墙正门外面的石狮子，是雄狮在大门的北侧，雌狮在大门的南侧；其余以此类推。以上，是在中国建筑物中，带有普遍性的左阳右阴的方位布局。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例如，笔者曾经注意到，位于嘉峪关内侧关帝庙前面的一对石狮子，以及位于曲阜孔府前面、鼓楼门内东华门大街南北两侧的一对石狮子，就有点个别，其爪下既没有绣球也没有幼狮，难以区分其雌雄。特别是位于泰山上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的“孔子登临处”之四柱三门石坊前后两面的两对石狮子，均为左雌右雄，其阴阳方位与通常所见完全相反。其中的奥秘，尚不得而知，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总之，上述左男右女、左雄右雌的文化阴阳方位，与自然阴阳方位相比较而言，在建筑装饰的使用上有着极大的灵活性。至于在门前设置石狮子的含义是什么，历来都没有统一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狮子是吉祥的动物，可以驱除邪恶。而在《北京形势大略》中，所记载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石者实也，狮者思也，言思前人创业后人守成之不易也”。^①前者，既带有几分美好的愿望，又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后者，倒是带有某些激励的成分。顺便说一下，在中

① 岱岳编：《北京趣闻 1000 题》，中国旅游出版社，第 94 页。

国历史上，石狮子作为一种建筑装饰，大都用于宫殿、庙观、衙署以及贵族、巨商住宅的门口。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些商家争相在其商店门前设置石狮子的时尚。据报道，在有的城市，甚至还为此而爆发了一场所谓的“石狮子大战”。其实，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分寸的问题，即哲学上所谓的“度”；过分了，都会适得其反的。否则，大街通衢恐怕会真的要变成“狮子林”了。若是这样的话，一来会使得本来就已经十分紧张的街道空间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二来在街道景观上也未必好看。

大游年方位

中国传统建筑，在阳宅布局上，非常讲究方位之和。其中，最根本的方位之和，就是自然方位之和。然而，在城市和村镇等聚落中，最佳的自然方位总是有限的。若必须在不甚理想的自然方位营建阳宅，又想在方位上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或者是某种美感的话，有没有办法呢？有的。明代王君荣在他所撰写的一部堪舆著作《阳宅十书·论大游年第三》中，记载了一种大游年方位系统。按照这一方位系统，可以通过对建筑布局的某种变换，将任何自然方位上的阳宅转换为文化方位上的吉宅。

●八门套九星变爻大游年原理

大游年，又称作八门套九星大游年。这是一种以“八卦五行方位”为基础的易学文化方位系统。它借助于天上的九星来象征地下之九宫，并把九星区分为吉星和凶星。所谓“天上九星为地下九宫，……然吉星惟三，凶星乃六”；“吉星三：生者，生气星，贪狼星也。一木。延者，延年星，武曲星也。一金。天者，天乙星，巨门星也。一土。凶星五：祸者，祸害星，禄存星也。二土。六者，六煞星，文曲星也。一水。五者，五鬼星，廉贞星也。一火。绝者，绝命星，破军星也。二金。辅弼者，一名伏吟，互重房也。二木。”^①。其中，辅弼，为左辅、右弼二星之统称。辅弼，又称伏位。其星吉凶无定，随主而变。主吉彼亦吉，主凶彼亦凶，故曰“辅弼”。五行名称前面的数字，表示阴阳；一（奇数）为阳，二（偶数）为阴。如，“一土”为阳土，“二土”为阴土。其余类推。在后天八卦的八个方位上，用伏位所在位置的卦名，以及九星中除辅、弼之外其余七星之名称之第一个字，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形成八句口诀。将这八句口诀再按照后天八卦中顺时针方向的挂名顺序进行排列，就构成了大游年方位系统的如下八句秘诀，即：

^① 《建苑拾英——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科技史料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648页。

乾六天五祸绝延生；坎五天生延绝祸六；
 艮六绝祸生延天五；震延生祸绝五天六；
 巽天五六祸生绝延；离六五绝延祸生天；
 坤天延绝生祸五六；兑生祸延绝六五天。

其排列顺序的依据，即所谓“八门套九星变爻大游年原理”。变爻的机理如下：首先，设定一个九星排列的如下顺序，即：“伏、祸、天、绝、生、五、延、六”。其次，将伏位上的卦名作为每句口诀之开头一字。然后，将该卦（三画卦）之卦爻（自下而上依次为初、二、三爻）按照如下顺序变为与其性质相反的卦爻，即：初爻变；初、二爻同时变；二爻变；三爻变；二、三爻同时变；初、二、三爻同时变；初、三爻同时变。接着，从伏位的卦名开始，将变爻之后的卦象，按照后天八卦中的顺时针次序，依次标出其顺序号。并将与之相对应的九星之字头，按照该顺序号依次排列，就构成一句口诀。最后，再将每一句口诀按照后天八卦之顺时针卦序（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排列出来，就构成了上述八句大游年方位秘诀。以乾卦伏位为例：其卦象为（☰），序号为1；初爻变，为巽（☴），序号为5；初、二皆变，为艮（☶），序号为“3”；二爻变，为离（☲），序号为6；三爻变，为兑（☱），序号为“8”；二、三爻皆变，为震（☳），序号为4；初、二、三爻皆变，为坤（☷），序号为“7”；初、三爻变，为坎（☵），序号为2。其中，带引

号的三个序号即“3”、“8”、“7”，在九星中分别对应的是天、生、延三个吉星，皆为吉位。其余各伏位，与此类同。初、二、三爻皆变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是本卦的错卦（又称作反卦）。以上原理可用表 20 示意。

表 20 中，所谓的“八门”，是与后天八卦相对应的八种坐向方位的住宅之院墙大门，又称作“八宅”。

●八门套九星变爻大游年方位

按照变爻大游年原理，可得出大游年方位图（见图 20）。在图 20 中，八种坐向方位的阳宅，依据伏位及其与其它三个吉星之对应方位，分为两大类型，即：“东四宅”（坎、震、巽、离四宅）与“西四宅”（乾、坤、艮、兑四宅）。

在大游年这一文化方位中，阳宅之吉凶，依据其门、主之间的八卦重合关系和五行生克关系而定。处于子午线（即南北中轴线）两端之离、坎方位上的门、主之间，以六十四卦中内外两卦的重卦性质论其吉凶；两者所重合而成的既济卦（离下坎上）和未济卦（坎下离上），均为吉宅之象征。子午线以外的其余诸卦方位上的门、主之间，以五行生克关系论其吉凶：五行相生或者五行相比（既不相生也不相克），均为吉宅；五行相克，谓之凶宅。这里，所谓的“门”，是指阳宅院墙之大门（正门）；所谓的“主”，是指阳宅中高大的房屋。这样，无论是东四宅，还是西四宅，两者分别而

表 20 八门套九星变爻大游年原理表

九 星	简称	伏	祸	天	绝	生	五	延	六
	全称	伏位 左右 辅弼 星	祸害 禄存 星	天乙 巨门 星	绝命 破军 星	生气 贪狼 星	五鬼 廉贞 星	延年 武曲 星	六煞 文曲 星
	阴阳 五行	阳木	阴土	阳土	阴金	阳木	阳火	阳金	阳水
	吉凶 象征	不定	次凶	中吉	大凶	上吉	大凶	上吉	次凶
	卦象	本卦	初爻 变	初二爻 变	二爻 变	三爻 变	二三爻 变	错卦	初三爻 变
八 门	卦	乾 ䷀ (1)	巽 ䷸ 5	艮 ䷳ “3”	离 ䷄ 6	兑 ䷹ “8”	震 ䷲ 4	坤 ䷁ “7”	坎 ䷜ 2
		坎 ䷜ (1)	兑 ䷹ 7	震 ䷲ “3”	坤 ䷁ 6	巽 ䷸ “4”	艮 ䷳ 2	离 ䷄ “5”	乾 ䷀ 8
		艮 ䷳ (1)	离 ䷄ 4	乾 ䷀ “7”	巽 ䷸ 3	坤 ䷁ “5”	坎 ䷜ 8	兑 ䷹ “6”	震 ䷲ 2
		震 ䷲ (1)	坤 ䷁ 4	坎 ䷜ “7”	兑 ䷹ 5	离 ䷄ “3”	乾 ䷀ 6	巽 ䷸ 2	艮 ䷳ 8
		巽 ䷸ (1)	乾 ䷀ 5	离 ䷄ “2”	艮 ䷳ 7	坎 ䷜ “6”	坤 ䷁ 3	震 ䷲ “8”	兑 ䷹ 4
		离 ䷄ (1)	艮 ䷳ 6	巽 ䷸ “8”	乾 ䷀ 4	震 ䷲ “7”	兑 ䷹ 3	坎 ䷜ “5”	坤 ䷁ 2
		坤 ䷁ (1)	震 ䷲ 6	兑 ䷹ “2”	坎 ䷜ 4	艮 ䷳ “5”	巽 ䷸ 7	乾 ䷀ “3”	离 ䷄ 8
		兑 ䷹ (1)	坎 ䷜ 3	坤 ䷁ “8”	震 ䷲ 5	乾 ䷀ “2”	离 ䷄ “4”	艮 ䷳ “4”	巽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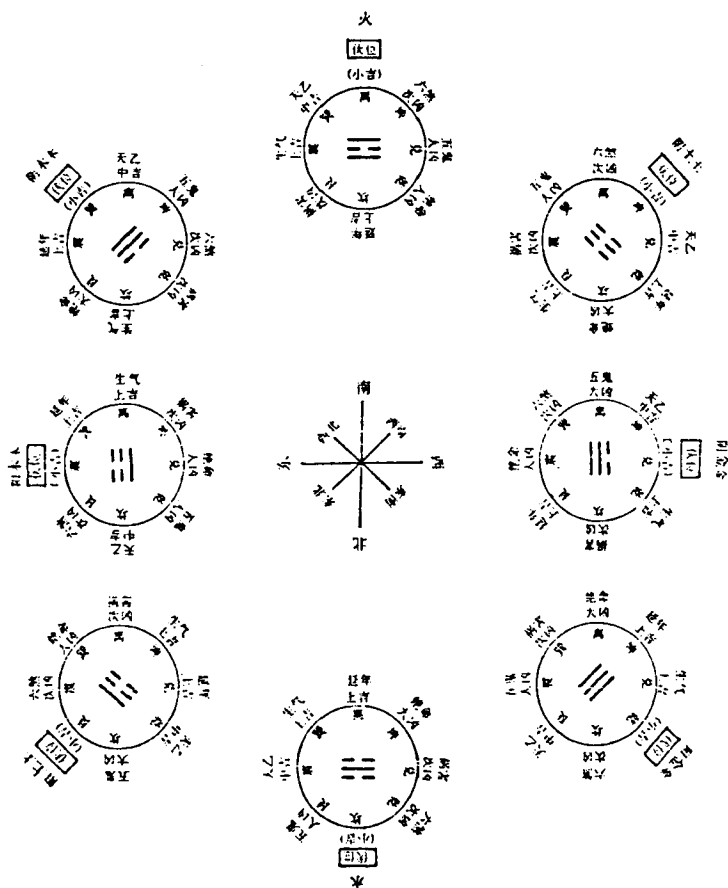


图 20 八门套九星大游年方位示意图

论, 都属于吉宅。但是, 东四宅与西四宅不可相混合使用。否则, 就会出现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火克金的情形。而任何一种五行相克情形的出现, 都将会使得阳宅变成凶

宅。

按照大游年方位，对于坐北向南之坎宅来说，其院墙大门可在震、巽、离方开设。若在离方开设正门，除了官衙道观寺庙之外，按照内外有别的原则，大都要设立照壁（又称影壁）。一般说来，贵族巨商之坎宅，多在离方开设正门。而民间多数的坎宅，则是在巽方即东南方开设正门。这样，东厢房南面的屋山，就起到了内外有别的作用。这就是四合院建筑的一般格局。对于坐西向东的兑宅而言，其院墙正门可在乾、坤、艮方开设。不过，若是需要在艮方开设正门的话，一般都要避开艮方而改在丑方或者寅方。因为，在四隅方位中，艮方为鬼门。

概括而言，大游年方位的特殊功用是，无论在何方位开设院墙正门，都可以通过调整其主房的方位使之成为吉宅，而不管其自然方位之优劣与否。大游年方位的实质是，以“八卦”、“五行”为手段，以“崇尚和谐”为精髓，在文化心理上追求一种理想的境界。

综上所述，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把“趋吉避凶”看作是人的行为应当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吉凶，即利害。“趋吉避凶”又称“趋利避害”。中国文化将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视为“吉”；把有害于人的生存发展和身心健康，看作“凶”。从而要求人们在利用、创造有利条件，争取良好效果的同时，把不利的条件及其有害的效果降低到最低限度。这种思想观念，在建筑行为中，就体现为人们在自然的客观环境和文化的心理环境方

面的以上探索 and 追求。诚然，在文化心理方面的各种调节手段，只不过是表达了人们的某种美好的愿望罢了，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并不能保证人们一定会得到吉祥如意的结果。正如人们之间的美好祝愿，同日后的实际情形，不一定具有必然联系一样。更何况，这些文化方面的调节方式，还充斥着诸多神秘性质的历史积淀。但是，这些探索 and 追求，却蕴含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道理，即：阳宅建筑，要以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益而无害为准则，要使人的身心都感到舒适为好。这一点，至今仍然是有价值的。至于文化环境问题，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就不必拘泥于诸如五行生克之类的传统观念了。

第四章

方圆意识与建筑造型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孟子·离娄上》）。这种“方、圆”意识，最早起源于对天地自然的象征，并且逐渐演变成社会象征，以致建筑象征。

方圆意识的自然象征

“方、圆”意识与“天、地”观念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先民，最初，由于其生产、生活等社会活动所受到自然力量的极大制约，以及对于自然现象的神秘莫测，而产生了对天地自然的朴素认识和尊崇信仰。之后，随着对天地自然因素在社会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又进一步增强了对“天、地”的敬畏和崇拜。这种尊崇“天、地”的观念，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众多典籍中，还是在中国传统的社会心理中，都占有很高的位置。

● 尊崇天地的自然文化

在《周易》中，“天、地”与“人”，合称“三才”或者“三极”。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周易·系辞下传》）“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周易·系辞上传》）《周易》这部著作，就是关于“三才”之道、六位成章的学问，也是古代圣人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周易·系辞下传》）之后，对于“天、地”自然的摹本。《周易》视“天地”为万物之本。所谓“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上传》）；“天地之大德曰生”（《周易·系辞下传》）；在取象于天地万物的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中，以象征“天、地”的“乾、坤”二卦为首、为本。荀子也把“天地”看作是一切生命之本，并把“上事天，下事地”视为“礼有三本”的“三本”之首。所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荀子·礼论》）这里所说的“天、地”，均系自然之天地，而非天神、地祇之天地。

在社会心理方面，中国历代所尊崇的“天、地、君、亲、师”，均以“天、地”为先。中国历代皇帝的意志都是以“天”的名义来下达的，每一道圣旨均以“奉天承运”为开端，然后才是“皇帝诏曰”的内容。明代北京紫禁城南门

曰“承天门”（成化元年即1465年建，清改为皇城正门曰天安门）；内有奉天殿、奉天门（清改称太和殿、太和门）。中国历来的志同道合者，义结金兰之好，也都是对“天、地”而盟誓。直到今天，中国人在举行传统的婚礼仪式中，仍然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然后才是“夫妻对拜”。“拜天地”成了结婚仪式的同义语，以及合法婚姻的标志。

就上述意义而言，中国文化就是以尊崇“天地”为中心的自然文化。

●象征天地的方圆文化

一、象征天地之性的“天圆地方”说。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将“天、地”观念与“方、圆”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古籍之一，就是《周易》。其中的主要记载如下：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周易·说卦传》）

“坤为地，为母，……。”（《周易·说卦传》）

坤卦主爻爻辞：“六二，直方大，……。”（《周易·坤·六二》）

“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周易·坤·文言传》）

在这里，“圜”与“圆”同。《周易》中的“方”、“圆”，是作为“乾、坤”二卦的卦德即卦的性质而出现的。“圆”，

象征天上之万象变幻不定；“方”，象征地上之万物各有定形。《周易》在谈到用蓍草行筮的过程中，“蓍”与“卦”的性质区别时，也是在类似的意义上用“方”、“圆”来作象征的。所谓“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周易·系辞上传》）。“神”，指阴阳不测，形容其变化之奥妙无穷。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传》）“神也者，妙万物而言者也。”（《周易·说卦传》）因为，在用蓍草行筮的时候，需要三变四营而成爻，“十有八变而成卦”（《周易·系辞上传》）。其结果究竟会得到什么卦，完全是捉摸不定、不可预测的。故而，称之为“圆而神”。“方”，是指结果有定，形容每一卦的内容都是一定的；“知”，就是指卦的丰富内容。故而称“方以知”。实际上，纯阳之“乾”就是刚健、纯阴之“坤”就是柔顺。二者皆取象于“天”、“地”之性。因此，“方圆”就成为“天地”、“乾坤”、“阴阳”、“刚柔”、“动静”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方圆”可以视为万物变化之两种对立形态的同义语。如，《庄子·知北游》中所谓的“物已死生方圆”。这里所说的“方圆”、“死生”，都是泛指天地万物变化的两种对立形态。

这些，都是在哲学意义上，以“天地”之性为象征的“天圆地方”观念。

二、象征天地之体的“天圆地方”说。

与此相应地，在中国古代的其他典籍中，还记载有许多以“天地”之体为象征的“天圆地方”观念。例如：“人能正静者，筋而骨强，能戴大圆者体乎大方。”（《管子·心术

下》)《文选》(晋)束广微(皙)《补亡》诗:“恢恢大圆,茫茫九壤。”“人能正静,皮肤裕宽,耳目聪明,筋信而骨强,乃能戴大圆而履大方。”(《管子·内业》)这里所说的“大圆”或“大圜”,指的是“天”;“大方”,指的是“地”。所谓“戴大圆而履大方”,可理解为顶天立地。东汉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明确地指出:“圜,天体也。”

在对宇宙结构的认识方面,中国古代天文学上最早出现的就是“天圆地方”说。这种认识,到了战国时期,发展为“盖天说”。所谓“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晋书·天文志上》)“盖天说”主张:“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以后,又改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这种认识,是同当时肉眼观察的科学实践水平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时候,还没有近现代以来这样精确的仪器观察,也没有近现代以来的环球航行,更没有什么航天飞行等社会实践。古代的先民,通过对日月星辰等天体及其视运动轨道形状的肉眼观察,形成了“天圆”的观念;通过对局部范围内四面八方之地理环境的地面考察,形成了“地方”的观念。

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天圆地方”的观念,在中国历来的社会生活中,都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方圆意识的社会象征

中国文化主张法地则天、师法自然。《周易》一书，就是以物象而喻人事，以言辞而明教化的。其中，谈天又说地，中心是讲人。中国古代的君主，出于其政治上的目的，历来都提倡“敬天法祖”，以借助于天经地义的自然之道，稳固其长久统治的地位；利用人们对天地自然的崇敬心理，增强其至高无上的权威。因而，在中国古代的易学哲学和天文学中，所形成的关于天地自然的“方圆”意识，自然也就被用来作为社会上政治、伦理关系的象征，乃至社会心理、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象征。

●体圆法方，其国乃昌

关于用“天圆地方”的观念来象征社会政治伦理事物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有许多记载。诸如：

“天圆地方，道在中央，日为德，月为刑。”（《淮南子·天文训》）

“国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谓道者，体圆而法方，背阴而抱阳，左柔而右刚，履幽而戴明。变化无常，得一之原，以应无方，是谓神明。夫圆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圆而无端，故不得观（其形）；地方而无垠，故莫能窥其门。”

(《淮南子·兵略训》)

“戴圆履方，抱表怀绳；内能治身，外能得人；发号施令，天下莫不从风。”(《淮南子·本经训》)

“天道圆，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吕氏春秋·季春纪·圜道》)

在这里，所谓的“天圆地方，道在中央”，可以作如下理解。从《周易》的卦象而言，在六爻卦中，象征“人道”的三、四两爻，处于象征“地道”的初、二两爻与象征“天道”的五、上六两爻之间。在三画卦中，象征“人道”之爻，也是处于象征“天道”与“地道”的两爻之间。君主，又称君王。号称“天子”的君主，理应融会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只有能贯通“三才”之道的君主，方可称为有道之明君。所谓“背阴而抱阳”或“背方州，抱圆天”(《淮南子·冥览训》)，就是说处于天地之间、治理天下的君主，应当贯通“三才”之道，成为有道的明君。所谓“主执圆，臣处方”，或“圣人则天，贤者法地”，都指的是君臣之间上下尊卑的政治伦理关系。这样，“天圆地方”，就成为上下尊卑、井然有序的名分，左柔右刚、履幽戴明的德政，阳德阴刑、宽猛相济的方略，以及天长地久、江山永固的地位等政治伦理事务的象征。这种用方圆来表征等级之高低的意识和习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是深远的。至今，人们仍然可以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看到它所留下的某些遗迹。例如，国内刻制公章就有方圆之分，而且一般是以圆形的规格

为高、功能较大，方形次之。

● 苍璧礼天，黄琮礼地

中国古代，祭祀被视为国家之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各种祭祀之中，最大的事情，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特别是祭天。所谓国之大者在祀，祀之大者在郊。中国古代，各朝的君主都自称“天子”，说自己是受“天命”来主宰人间的。所谓“君权天授”。因而，“天子”祭天，不仅是合情合理的敬天活动，而且也是“天子”借以显示其崇高与尊严的最高礼仪。一国之内，在祭祀天地特别是祭天的礼仪活动中，谁担任主祭的问题，关系极为重大。因为，只有“天子”才能担任主祭。在改朝换代的时候，谁担任主祭，就意味着谁是新的“天子”。“祭天”，成了合法“天子”的一种标志。因此，祭祀天地，尤其是祭天，被视为国家大事中之大事。这种观念和传统，一直继续到清朝末年。甚至，到了民国初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做他的皇帝梦时，还演出了一幕“祭天”的丑剧。

在祭祀天地的活动中，“方圆”意识的象征，主要表现在两种最重要的礼仪玉器上。在周代，有六种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礼仪玉器，它们分别是“璧、琮、圭、璋、琥、璜”。这六种玉器，被称之为六种“瑞玉”或“六器”。当时，还有所谓“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据《周礼·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

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璧”，是一种扁圆形的礼仪玉器，中间有小孔。“琮”，是一种外方内圆的粗管形玉器。从出土的文物来看，不同的朝代，在“璧”的色彩、大小方面，并无统一的定制；“琮”的色彩、高矮也各有差异。但是，在用内外皆“圆”的“玉璧”祭天、用内圆而外“方”的“玉琮”祭地这一点上，历来都是一致的。直到明代，其“祭祀之制”，仍然对此有明确的规定：“洪武初，定郊庙社稷先农为大祀，已而改先农及山川、帝王、先师、旗纛为中祀，诸皆小祀。……天地日月加玉焉，玉三等：曰苍璧，曰黄琮，曰玉。”^①清袭明制。在“乾隆四年御制冬至有事于南郊敬成八章章八句”中，就有“惟予小子，敬捧苍璧”的诗句；在“乾隆二十二年御制冬至圜丘礼成述事”中，又有“配藜佳气煊樵蒸，奠璧圜丘祖业承”的诗句。^②

●规天为圆，矩地取法

据传说，中国人以“方圆”而取法于天地自然的文化传统，早在伏羲时代就开始了。所谓“庖牺生有圣德，于时未

① [清] 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209页。

② [清] 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926-927页。

有书契。规天为圆，矩地取法。”^①“庖牺”，即伏羲。就是说，早在还没有刻字的书籍出现的时候，伏羲氏就已经以“方圆”来规天矩地了。这种“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不仅在古代的政治生活、礼仪玉器中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在日常生活的冠履服饰等方面也有鲜明的体现。

据记载，古时候甚至有一种说法，叫做“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履句屨者，知地形”（《庄子·田子方》）。此处，“句”与“方”同。“屨”（jù），泛指鞋子。其意思是说，儒士戴圆帽的，知晓天时；穿方鞋的，熟悉地形。这种说法虽然是牵强附会的，但它却表明了“天圆地方”的观念，对于中国社会生活深刻影响之由来已久。实际上，历代君主的冠冕，均有“前圆后方”之制。例如，“汉冕广七寸，长尺二寸，前圆后方，朱缘里玄”^②。直到明代，仍有关于皇帝冠冕“前圆后方”的明确规定。“皇帝冕服，洪武……十六年定衮冕之制，冕前圆后方，元表纁（xūn）裏”（《明史·舆服志》）。其中，“元”与“玄”同，指黑色。“纁”，指浅红色。“永乐三年，定冕冠以皂纱为之上覆曰絰（tíng），桐板为质，衣之以绮（qǐ），元表朱里，前圆后方。”（《明史·舆服制》）“絰”，指古代覆在冠冕上的装饰。“绮”，指有花纹

① 《建苑拾英——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科技史料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67页。

② [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85页。

后图案的丝织品。“嘉靖八年，定冠制，以圆匡乌纱冒之，冠上有覆板，长二尺四寸，广二尺二寸，前圆后方”^①。直到清代，官服上的补子，仍有“方圆”之分，以示尊卑。同历代一样，“圆形”的补子要比“方形”的补子级别为高。清代，皇帝、皇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皆为圆补。其中，皇帝、皇子、亲王、郡王用四团，分别置于两肩及前后胸。贝勒、贝子用两团，置于前后胸。其他文武官职，从一品至九品，皆用方补^②。这就是古代所谓的“方圆不易”之理。此外，清代乾隆年间曾制有一座大型的铜壶滴漏放置在北京紫禁城交泰殿内，以报时刻。乾隆在御制“刻漏铭”中，也有以“方圆”象征尊卑的如下诗句：“范金规木，制兹漏莲。玉注金筒，水火燥寒。协其高卑，别以方圆。”

此外，方圆意识，在数学理论、思维方式，乃至人们的行为规范中，都有很深的影响。据《周髀算经》记载：“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墨子·天志中》则指出：轮人有规，匠人有矩。“今夫轮人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曰：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人亦操

① [清]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185页。

② 上官丰编：《禁宫探秘——宫闱典故·轶事·趣闻》，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版（修订版），第102页。

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方与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谓之方，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方。是以方与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在这里，“圆法”与“方法”具有同等的意义。后来，只是由于“方法”一词广为流传，“圆法”一词不再使用罢了。基于以上种种方面的原因，以致于人们把懂方圆、守规矩，看作是合乎行为规范的代名词。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又可以称作象征天地的方圆文化。

方圆意识的建筑象征

了解了“方、圆”意识在天地自然方面的象征，在社会政治伦理关系以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象征之后，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它在建筑方面的象征了。

“天圆地方”的观念意识，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规划设计中，历来都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一方面是出自施工技术上的需要。北宋建筑学家李诫在《营造法式》中，就曾引经据典地指出：“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垂，衡者中水”；“韩子曰：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班（指鲁班）亦不能成方圆”；“万物周事而圆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大匠诲人以规矩赋》中，说：“运斤取法，必先正于方圆。”宋东平人董道在《秦铭跋》中，说：“大匠与人规矩，使知方圆之法。”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将要着

重讨论的出自文化内涵上的需要。

● 方圆造型的坛庙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有所谓礼制建筑与实用建筑之分。一般说来，礼制建筑，是指专门用于祭祀活动的建筑物。一年之中，除了君主在里面举行祭祀大典之外，常年关闭不用。里面只留有少数的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和准备工作。实用建筑，则是指用于日常起居和进行社会活动的建筑物。

在礼制建筑中，祭祀天、地的建筑物，根据“天圆地方”的观念，分别称之为“圜丘”、“方泽”。据记载：“古者祀天于圜丘，祭地于方丘。南郊地上之丘，丘圜而高，以象天也。方丘者，北郊泽中之丘，丘方而下，以象地也。”其中，“方丘”，因为是“泽中之丘”，又称“方泽”。“圜丘”、“方泽”，即后来所谓的“天坛”、“地坛”。

北京的“天坛”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是明、清两代帝王祭天的地方。“天坛”在创建之初，名为“天地坛”，合祀天、地。明嘉靖九年（1530年），在北郊另建“方泽”，在“天地坛”内建“圜丘”，从此天、地分祭。“永乐十八年，北京天地坛成，每岁合祀。……嘉靖九年，敕建圜丘于大祀殿之南，……建方泽于安定门外”；到了明代嘉靖十三年（1534年），“圜丘”、“方泽”，又改称“天坛”、“地坛”。“嘉靖十三年二月奉旨：圜丘、方泽今后称天坛、

地坛。”^① 无论是最初的“天地坛”，还是后来的“天坛”和“地坛”，在建筑造型上，均以“方圆”为主要象征。

就“天坛”的建筑平面来看，其原来的内外两重围墙之北面均呈“圆形”、南面均呈“方形”。这种北“圆”而南“方”的围墙，叫做“天地墙”；位于其中部的南面“方形”围墙之北侧的中间部分，即成贞门所在的一段围墙也呈“圆形”；“圜丘”四周，又有“方形”的矮围墙相环绕；“圆形”的祈年殿，也建在长“方形”的围墙内。这些用多种“方”、“圆”结合方式的构图形式来设计的建筑平面，都是对“天、地”结构的象征。现存的“天坛”，特别是其南面围墙的形式，之所以与原来的设计大有出入，是由于近年来其建筑面积被新的建筑所侵占因而受到了很大破坏的缘故。在“天坛”内部稍偏东侧，贯穿着一条长 359 米的南北中轴线。这是一条砖砌的高甬道，通称为“丹陛桥”。在这条中轴线上，汇集着天坛内的主要建筑物，诸如，圜丘、皇穹宇、祈年殿等。而所有这些主要建筑物的造型，都呈“圆形”。“天坛”是圜丘和祈谷两坛的合称。祈谷坛，是三层石台的圆形建筑物，其形状与圜丘相同，只是尺寸比圜丘大一倍。祈年殿，是在祈谷坛上用来遮雨避雪的建筑物。祈年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取名为大祀殿。当时，它是宽十二间、纵深三十六间的黄瓦玉陛重檐垂脊的方形大殿。明嘉靖九年，

①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年 5 月版，第 921—922 页。

天、地分祭后，大祀殿废弃。嘉靖十七年，拆除大祀殿，改建为金顶圆形攒尖式的大享殿。现存的祈年殿，是清代的建筑物。这些以圆形为基调的主体建筑，都是“天圆”观念的外在体现。

与“天坛”南北相对应的“地坛”建筑，从平面空间的分割到建筑造型的设计，均以“方形”为基调。“地坛”，又称“方泽坛”或“方丘坛”（《明典汇》）。“泽”与“丘”，皆为“地”象，以“方形”象之。与“天地坛”同时建筑并左右对应的“山川坛”，其外围墙也是呈北“圆”而南“方”的形状。建于山川坛内的“太岁坛”、“先农坛”及“观耕台”等建筑物，其形制均为“方”形。明代嘉靖年间，又在山川坛内“建圆廩方仓”，其“中廩制圆”。建于北京东郊的“朝日坛”，其围墙呈东“圆”西“方”形；建于北京西郊的“夕月坛”，其围墙则呈“方”形。所有这些建筑，无论是在平面空间的分割上，还是在建筑造型的设计上，都充分体现了天地自然的方圆象征观念。

此外，在其他寺庙建筑的造型中，天圆地方观念也有多种体现。诸如，明、清北京皇城内，位于北海琼华岛上小白塔前面的善因殿；北京城外西北郊大钟寺内，悬挂明永乐大钟的钟楼等，均为上圆下方之重檐建筑。大钟寺，以悬挂永乐大钟而得名。其原名叫觉生寺，位于北京城西北曾家庄。清雍正十一年（1734年）建钟楼，“高五丈，下方上圆，四面皆窗，后有旋梯，左升右降”（《燕京岁时记》）。在乾隆二十六年建的仁寿寺中，其“殿中圆外方”。在乾隆二十七年

建的宝相寺中，其大殿的形制为“外方内圆”，并另建有“圆庙方庙”。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体法方圆的明堂建筑

与祭祀活动关系重大的另一类建筑物，就是“明堂”，即所谓“天子坐明堂”的明堂。“明堂”，是自周朝以来，中国历代帝王宣明政教之处。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其后，宫室渐备，另在近郊东南建明堂。在中国的古籍中，有许多关于“明堂”的记载。如：

关于“明堂”的性质，有所谓“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孟子·梁惠王下》）明堂不是一般性的建筑，而是帝王用于祭祀活动的礼制建筑。

关于“明堂”的意义，有所谓“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白虎通义》）明堂是用来调节天人关系、进行文明教化、端正行为道德、显示才智能力、褒奖行为规范的活动场所。

关于“明堂”的建筑思想和设计原则，有所谓“明堂之制，静而法准，动而法绳，春治以规，秋治以矩，冬治以权，夏治以衡，是故燥湿寒暑以节至，甘雨膏露以时降。”（《淮南子·时则训》）明堂建筑以自然为师、以天地为本、以气象为节、以四时为准。因而，其建筑设计以法天地、象四

时为原则。

关于“明堂”的建筑造型，有所谓“明堂上圆下方”（《水经注·湿水》）；“明堂之制，五户八窗”和“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牖”^①；“唐时明堂制度，其宇上圆，覆以清阳玉叶。”^②。关于夏、商、周三代的明堂，有所谓“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的记载。又据《礼图》记载：“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礼图》上还绘有图样，“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这种“上圆下方”的建筑造型，是对帝王顺天地、应四时，以求四季风调雨顺、年年国泰民安、世代江山永固之美好愿望的象征。

从以上各种记载来看，“明堂”建筑，在其文化内涵上，有明尊卑、明礼义、明方位、明时序、明教化、明礼制等方面的含义；在其建筑形式上，有明朗开敞、空灵通透、四通八达、对称均衡、结构严整、富于变化的特点。

但是，由于明堂建筑时代久远，最初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人们对于典籍所载又各有不同的理解。因而，直至明、清，人们对于明堂之制的解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历史上，不同时代的明堂又各有自己的特点。据考古研

① 《建苑拾英——中国古代土木建筑科技史料选编》，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第455页。

②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922页。

究，已经发掘出来的明堂建筑，建于距今两千年前的公元前 4 年。这是汉代末年王莽掌权之后，进行托古改制时的礼制建筑。其建筑的平面、层数和立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该建筑群的周围环以水渠，符合《礼记》等古籍记载中对明堂建筑的要求，即所谓“周旋以水，水行左旋以象天。”在正北方，水渠中的水又被引到一条圆形的水沟里。该水沟环绕着一个由围墙所封闭的方形院子。院内四角建有曲尺形的配房四座。方形院子的中央为一圆形土台，圆形土台的中央便是方形带折角的主体建筑。这座建筑群由外而内的空间造型序列为：圆形水沟→方形围墙→圆形土台→方形明堂^①。古代的建筑师们，在这里以双重的方圆象征，强调了“天圆地方”的寓意。

在历史上，明堂建筑，还往往同辟雍、太庙等建筑混为一体。据《礼记·王制》记载：“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这里，“泮（pàn）宫”，指古代的学校。“辟雍”，古代“太学”的别名。《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辟雍”。“雍”与“雍”同。汉代的高诱、蔡邕，晋代的纪瞻等人，也都以为明堂、清庙、太庙、太室、太学、辟雍是一回事。东汉文学家蔡邕在《明堂论》中，认为：礼制建筑“取其宗祀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向明，

^① 刘天华：《中国古代五大奇观·巧构奇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年 8 月第 1 版，第 35—39 页。

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四面环水，圆如璧，则曰辟雍。异名而同实，其实一也”。在《黄图》一书中，关于明堂的记载，有所谓“堂方”、“屋圆”之说：“堂方……方象地。屋圆，……圆象天。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天）阳也。”清代乾隆时，在北京所建的辟雍，是乾隆到国子监讲学的地方。它位于这座国家学堂的中心，以体现其全国最高教育场所之建筑地位。其殿为正方形，位于圆形水池的中央，象征“四面环水，圆如璧”。

●内圆外方的城门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的宫城建筑，非常讲究尊卑分明。而尊卑之分明，莫大于天地。因而，将“天圆地方”的观念，用在宫城建筑的规划和设计中，也就顺理成章了。下面我们会看到，在现存的明、清北京城及其中的紫禁城中，就有许多以“方圆”意识为象征的宫城建筑。其中，首先碰到的就是它的城门。

明、清北京城共有四道城墙，由里而外依次称之为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除了紫禁城以外，其余各城的城门，一般都呈“上圆下方”的形状，以象天地。紫禁城的城门，在造型设计上，虽然也运用了天地、方圆的观念，但是，它无论是在寓意的具体内涵上，还是在外形的精心设计上，都有其独特之处。

北京紫禁城又称皇宫，今称故宫博物院，简称故宫。在它的城墙上，共有四座城门，即：东面的东华门，南面的午门（又称五凤楼），西面的西华门，北面的神武门（清康熙之前称玄武门）。其中，东华门、西华门和神武门各有大小三个门洞，午门有大中小五个门洞，共计十四个门洞。凡是到过北京紫禁城并留心观察的人，都会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这四座城门上的所有门洞，从外面往里看，都是“方形”的；从里面往外看，都是“圆形”的。这种“内圆外方”的造型处理，从形式美的角度来看，的确有其外观上的方圆变化、曲直对比的美学效果。对此，美学家们已经有所探讨^①。然而，其深层的文化内涵，则是以“天圆地方”观念为象征的君臣君民之间，上下尊卑之礼制。

君主，对上天来说，自称是天之子；就地上而言，又自称是民之天。紫禁城作为“天子”的住宅，就是地上人间的“天庭”。紫禁城的城墙（又称宫墙），就是现实社会中“天”、“地”之别之分界线；紫禁城的城门，就是连通这一现实社会中的“天”上与“地”上，或皇家与人间两个世界的通道。城门以内，为皇家居住之“天上”；城门以外，为百姓生活的“人间”。这里，有诗为证：

①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第228页。

御沟流水晓潺潺，直似长虹曲似环。
流入宫墙才咫尺，便分天上与人间。

春波十顷碧琉璃，白日楼台照影时。
好为画船多载酒，半酣西望碧参差。

水南沙路雨清尘，桃李花开蛱蝶春。
三月京华寒食近，东风十里酒旗新。

这是元代文学家马祖常（1279—1338）所作的三首《御沟春日诗》。这里所说的“宫墙”，指的是紫禁城城墙。“御沟”，从其中后面两首诗句所描述的景色来看，当指紫禁城护城河（俗称筒子河）以外与其相连的水域。据清康熙二十五年，清初词人朱彝尊（1629—1709）编辑的《日下旧闻》记载：“紫禁城有护城河，河外即御沟也。河自北闸口分流，经内官监、白石桥、大高玄殿之东，北上西门（原在玄武门和景山之间的西侧——引者注）之外，至紫禁城下而东而南，……”。“御沟”经紫禁城护城河，自玄武门西侧从地沟流入紫禁城内，即为内金水河。据《燕史》记载：“紫禁城内之河，则自玄武门之西从地沟入”。马祖常在上述第一首《御沟春日诗》里，早已将咫尺相隔的紫禁城宫墙内外，直乎为“天上与人间”。又据清乾隆七年（1742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

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中外阻绝，判若天人。”^①明、清时期，紫禁城里又称作“大内”。这些都表明了，从明代起，北京紫禁城内、外之间，就有着极大的地位差别。其差别之大，犹如天上、人间。紫禁城城门之“内圆外方”的造型，就是这一差别的特殊象征。这种“内圆外方”特殊造型的紫禁城城门，时刻提醒着君臣人等，不可忘记各自所处的上下尊卑之地位。

●上圆下方的龙井结构

太和殿，处于紫禁城的中心位置，而且又是紫禁城中最高大的建筑。太和殿内的天花正中央，是“上圆下方”的藻井（又称龙井）。这种结构，即所谓“上仿象夫天体之圆，下效法乎坤德之方”。藻井中部的八角井，满饰云龙纹图案，里面为一金光灿烂的圆井。圆井正当中为一巨型突雕蟠龙，蟠龙口中衔一硕大明珠。真可谓“穹隆圆顶内，盘卧巨龙，俯首向下，口衔宝珠，庄严生动”^②。宝珠的正下方，就是人间至高无上、万人之尊的皇帝用以面南称王的蟠龙镂空金漆宝座。这颗宝珠，又称作“轩辕宝镜”或“大圆宝镜”。

①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官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圣谕”第1页。

② 上官丰编：《禁宫探秘——宫闱典故·轶事·趣闻》，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版（修订版），第55页。

据中国古代的一种传说，天上有五方之帝，即：苍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五帝之中，黄帝位居中央。象征轩辕黄帝在天上中央方位的“轩辕宝镜”，又是象征“上天”即前面所说之“大圆”的“大圆宝镜”。据《青瑀杂记》记载：“太和殿殿九楹，……殿顶俱五彩隔尘，金碧灿烂，中一室悬镜如星，中悬一轩辕镜，直御座上。”清代，在慈禧太后居住过的储秀宫正殿内，及其在颐和园中颐养天年的仁寿殿内，正面都悬挂着书有“大圆宝镜”的匾额。两者，虽然在形式上有着实物与文字之别，但就其象征意义而言，则大体相同。上圆下方的龙井中之巨型蟠龙，象征着《周易·乾卦·九五》所说的“飞龙在天”，即处于“君位”。龙口中所衔着的“轩辕宝镜”，则进一步象征性地强调了处于其正下方的宝座（汉代以前的宝座，曰法座），是合理合法的“天子”的正位；坐在这一宝座上的君主，是法定的正宗“天子”。不过，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太和殿宝座，已经不在“轩辕宝镜”的正下方了。据说，这是当年袁世凯在称帝的时候，害怕这颗悬在宝座正上方的“宝珠”掉下来伤坏自身，因而下令将整个宝座向后移动了一段距离^①。不管怎样，太和殿中这一立体的“上圆下方”之龙井结构和“大圆宝镜”，毕竟留下了当年以所谓有道明君自居之封建帝王的权力地位在建筑造型上的庄严象征。

① 上官丰编：《禁宫探秘——宫闱典故·轶事·趣闻》，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版（修订版），第223页。

此外，在以天象为象征的寺庙建筑中，也有上圆下方之类似结构。如，清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建有一座普乐寺。寺中有仿北京天坛祈年殿式样建造的二重檐圆攒尖顶的“旭光阁”，阁内正上方有一圆形藻井，其结构与太和殿藻井之上圆部分类似。阁内圆形藻井的正下方，是一架方形木质的立体曼陀罗。这种上下对应之方圆建筑，是一种宇宙结构的立体模型。

●天地相交的方圆建筑

位于太和殿与保和殿中间的中和殿，以及位于乾清宫与坤宁宫中间的交泰殿，在建筑造型方面，都运用了“上圆下方”之象征。两者都是单檐四角攒尖正方形建筑，攒尖处覆以渗金圆顶。据《旧都文物略》：“太和殿后为中和殿，规制较小，方檐圆顶，建造殊异。”“乾清宫后正中南向者为交泰殿，渗金圆顶，制如中和殿。康熙御笔匾曰‘无为’。”其文化内涵，在清代乾隆皇帝的《交泰殿铭》中，已经点破。即：“殿名交泰，象取地天。”在《周易》中，象地为坤，取天为乾；坤上乾下，谓之天、地相交之象，即泰卦。

交泰殿与中和殿，在建筑造型上，虽然都有着上圆下方的形式，但是，就其方圆象征的文化内涵来说，则是各有特点。前者之方圆，象征宇宙之天地；后者之方圆，象征人间之夫妇。

中和殿之方圆造型，象征着天地交而万物生，寓意天地

合气、万物化生、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每年仲春，皇帝在去先农坛祭祀、躬耕之前，事先都要在中和殿敬“阅祭先农祝版”、“阅耕具”。而且，其仪式十分庄重。据《翁文恭日记》记载：“黎明入至中和殿，陈设农具讫，撤包袱，东西两案在祝版案北。辰初，上（指皇上——引者注）至，由东阶绕至后，进后隔扇，西向立。维时太常寺官捧祝版，由太和殿来供案上。太常寺堂去包袱，上敬阅，一跪三叩起，仍西向立。祝版出，上正中立，目遣送祝版。后随阅农具，东西两案皆到，御前大臣引，仍由后隔扇出，余等出右翼门。”又据《国朝宫史续编》记载：“凡亲诣之祭，前二日太常寺奏请皇上于祀前一日阅祝版。方泽、太庙、社稷祝版御中和殿阅视，……。”

“乾坤者，万物之男女也；男女者，一物之乾坤也。”^①交泰殿之方圆造型，所象征的则是夫妇合气、子女化生、人丁兴旺、万事兴隆。乾隆皇上御书联曰：“恒久咸和，迓天休而滋至；关雎麟趾，立王化之始基。”《周易》六十四卦，分为上经与下经两部分。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上经以乾、坤二卦为首，讲天地宇宙；下经以咸、恒二卦为首，讲男女人事，即着重讲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之礼义关系。咸卦的“咸”字，取交相感应之义。咸卦之卦体，为兑上艮下。从易卦的人事取象来看，兑为少女，艮为少

① 郑灿订正：《易经来注图解》，巴蜀书社，1989年5月第一版，“来瞿唐先生易注自序”

男。男女相感至深，少男少女相感尤深。就宇宙而言，最大的交相感应为天地合气；就人事而言，最大的交相感应即夫妇合气。而“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周易·序卦传》）。交泰殿之方圆象征，寓意国家之第一夫妇即皇帝与皇后之间，和睦美满、地久天长、多子多孙、后继有人。

●地久天长的方圆建筑

在紫禁城北部的御花园中，有两座“上圆下方”的亭子，格外引人注目。一座是位于中轴线东侧的“万春亭”，另一座是位于中轴线西侧的“千秋亭”。“春秋”，是一年四季的简称。顾名思义，这两座东西对称的亭子，象征着帝王的江山千秋万代长治久安。千秋万代，无非是形容寿命长久的意思。世上之寿命，何者最长？何者最久？长不过天，久不过地。所谓“天长地久”或“地久天长”、“地老天荒”是也。而“天地”之象征，莫过于“方圆”，已如上述。因而，“上圆下方”的建筑造型，在这里，又成了寓意万春千秋或千秋万代的最佳选择。

●等级分明的方圆造型

从紫禁城神武门出来，我们再到北海公园来欣赏一下方圆象征的建筑造型。北海，是元、明时代皇城内西苑太液池

的一部分。明代，称瀛台为南海，称蕉园为中海，称五龙亭为北海。现在的五龙亭，是清代的建筑物。五龙亭，是由五座亭子所构成的建筑群的总称，又称天地亭。这是君、臣垂钓的地方。处于正中间的一座，为五亭之首，名为龙泽亭。其建筑规格也最高，为上圆下方的重檐形制，即上檐呈圆形、下檐呈方形。圆形，属天象。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在这里垂钓。左右各有两座方形亭子。方形，属地象。这四座方亭，是文武大臣陪钓的地方。龙泽亭东面为澄祥亭，再东面为滋香亭；西面为涌瑞亭，再西面为浮萃亭。其中，紧靠龙泽亭的左右两座方亭皆为重檐结构，最外边的两座方亭皆为单檐结构。在这里，方圆形式的建筑造型，象征着等级分明的君臣关系。五龙亭，实际上，是一组以方圆造型为象征的等级建筑。它告诉人们，在君主专制的王朝中，各级文武大臣，即便是在陪同君主消遣的时候，也有着严格的地位等级之分。从五龙亭这组群体建筑的方位布局、排列顺序，到其中每一座单体建筑的规格形制、造型设计，都充分表达了君臣之间尊卑地位之“方圆不易”的含义。

综上所述，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源于天地自然的方圆意识，有着极为丰富的象征内容。同时，中国的传统建筑，在表达方圆意识的建筑造型方面，又有着极为灵活的处理方式。

第五章

易学象数与皇家建筑

在中国的易学文化中，数字不是枯燥无味的东西。易学中的象数，有着极为丰富的哲学内涵。它作为一种隐喻、借喻、象征的工具和手段，在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的规划设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和体现。其中，以三极、乾坤、阴阳、河图等易学象数的运用，最为典型。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

在《周易》中，“三”是象征天、地、人“三才之道”或“三极之道”的一个数字。在三画卦中，下面一爻为地爻，中间一爻为人爻，上面一爻为天爻。在六画卦中，下面初、二两爻是地爻，中间三、四两爻是人爻，上面五、上两爻是天爻。此所谓“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周易·系辞上传》）六十四卦中的每一卦，都包含着三极之道。易学中

所谓的坚守正道，即坚守天、地、人“三极之道”。

●以“三”为根本的易学文化

贯三为王 东汉许慎说：“三，天地人之道也”；“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就是说，能够融会贯通天、地、人“三极之道”的人，方可称王。基于这种以“三极之道”为立身、立家、立国、立论之根本的易学观念，“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在中国社会的许多领域，都可以看到运用“三”这一数字，所作出的内容丰富的文化象征。

以三为多 在数量关系中，数量之“多”、体量之“大”、程度之高，都常常用“三”来表示。例如，《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宋代苏轼《答毕仲举书》曰：“三复斯言，感叹无穷。”等等。这里所说的“三”，未必就是实指一、二、三的三，而是形容“多”的意思。在汉字的构成关系中，也是如此。例如，以“五行”中之“金、木、水、火、土”为例，三金为“鑫”，形容金多；三木为“森”，形容树木多；三水为“淼”，形容水大；三火为“焱”，形容热度高；三土为“垚”，形容山高。据说古人“宋子虚名友，五子以鑫、森、

森、焱、垚立名^①。其它，如：三人为“众”，表示人多；三石为“磊”，形容高大；三日为“晶”，形容亮度高；……如此等等。在汉语中，“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是说我每天要做多次的自我反省；“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比喻人多智慧多；“三思而行”，是说要经过多方面的反复考虑，然后再付诸行动；“三缄其口”，是比喻说话极其谨慎；“三过家门而不入”，比喻工作极其热心，以致于公而忘私，就像当年大禹治水一样。

以三为礼 在伦理关系中，“三”，又被看作是合乎礼仪或礼节的数字象征。中国成语中的“三衅三浴”，就是以礼待人，十分尊重的意思。此说，源于古籍中的如下记载：“比至，三衅三浴之。”（《国语·齐语》）三国时吴人韦昭《注》：“以香涂身曰衅，亦或为熏。”指的是，春秋时期，齐桓公从鲁国接回管仲时，为了表示对管仲的尊敬，所用的最高礼节，是先让管仲多熏几次香、多洗几个澡，叫做“三衅”、“三浴”。晋、楚两军在城濮之战中，重耳“退避三舍”，作为他曾经许诺过的对楚成王最大的报答（参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古代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三舍”为九十里。三国时期，刘备为了表示对诸葛亮的尊重和诚意，曾经“三顾茅庐”。古代帝王出行车驾，有三种不同规格上的区别，即所谓“大驾、法驾、小驾”。大驾，由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车（皇帝的侍从车子）自秦

^① 《辞源》，商务印书馆，1993年。

汉以来为八十一乘（《后汉书·舆服志上》）；“法驾，京兆尹奉引，侍中参乘，奉车朗御，属车三十六乘”（《三辅黄图六·杂录》）；小驾，祠宗庙时用（《后汉书·舆服志上》）。皇帝出行车驾的属车，又分中、左、右三列行进。古代的“祭祀三饭以为礼，丧祭三踊以为节”（《淮南子·天文训》）。君主祭祀天地、臣民朝见君主、晚辈祭祀祖先之最高礼节，谓之“三拜之礼”。所谓“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二十五史·周书卷七·宣帝纪》）。清初，以“一跪三叩首”为通制，朝会大典则“三跪九叩首”。直到现在，有些礼节仍然同“三”有关。诸如，行鞠躬礼，要“三鞠躬”；拜访亲友中，在敲门时，最有礼貌的做法是敲“三”下；等等。

以三为界 在数量的限度上，也往往以“三”为界。《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乃设钺，即三令五申之。”违令三次者，斩。这就是对后世颇有影响的“事不过三”之制，即人们常说的“有再一再二，无再三再四”。

据说，明、清时代，按照其祖宗定制，皇帝宠幸后宫妃子，若时间过久，则敬事房的总管太监必高唱曰是时候了。帝不应，则再唱。如是者三，帝命之人，则妃子被从帝脚后拖而出。这就是说，连皇帝在皇宫过性生活的时候，都不敢违反“事不过三”之制。

以三为喻 在中国的文化中，为了强调某种意义，用“三”来概括者居多。例如，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待于君子有三愆”、“君子有

三戒”、“君子有三畏”（《论语·季氏》）、“君子有三变”（《论语·子张》）。孔子在齐国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荀子说：“人有三不祥”、“人有三必穷”，并有所谓“三得”之说：“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为亡。”^①。

以三为谦 在中国武林界，以往流传着一句话，叫做“言必称三，手必成圈”。“言必称三”之“三”，一方面，含有自谦和敬人之意，即表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不可妄自尊大；另一方面，也含有武林中人应遵守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武德之意。因此，武中人，以“三”自称者居多。如，清末民初，北京的神跤甄三；从二三十年代起至六十年代初，一直活跃在北京天桥的宝三；以棍闻名于世的山东铁棍周三；六合螳螂名家湖北鸭巴掌魏三；鹞子拳名家陕西鹞子高三等人，均以武艺超群而称“三”。^②

●以“三”为象征的中国建筑

在中国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中，以“三”为象征之

① 章诗同注：《荀子简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第1版，第38，第120页。

② 劳伟勋编：《博采珍闻》第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409页。

处，尤为具体而形象。中国传统的宅院建筑之最高规格，为左、中、右“三路”之制。如，明、清时期的北京紫禁城，山东曲阜的孔庙、孔府等。北京紫禁城内，前朝、内廷的主要建筑均为“三”大宫殿。以太和殿为主的三大殿之基座（又称须弥座），分为上、中、下“三”层或“三”重，又称“三台”。而且，每一层的台阶数，也都与“三”有关；“下重级二十有三，中上二重级各九”；乾清门“中三陛，三出各九级”^①。在最高级别的礼制建筑即“天坛”中，祈年殿屋顶为“三”重檐形式，基座呈“三”层；圜丘坛也是三层，而且每一层的台阶数，均为“三”的倍数。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周易·文言传》又进一步指出：“乾元用九，乃见天则。”所谓“天则”，指的是自然规律。“用九”，表明了天道的变化无常，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若在天道突变之时，仍然能够善于“用九”而不为九所用，就不仅是天下可治，而且是体现了天道之法则了。这是只有具备了“天德”的圣人，才能达到的一种极高的境界。鉴于自然数中的“九”，在易学中所蕴含的上述哲理，再加上乾卦之

^① 《清官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50，第404页。

六爻皆以“龙”来作比喻，因而，在龙的传人的心目中，“九”就成了一个非常吉利而且有些神秘的数字。从易学哲学到社会生活，从皇家礼仪到民间风俗，都可以找到“九”的影子。

●天德用九

在《周易》中，“九”是个非常重要的数字。《周易》六十四卦，均由阴、阳二爻构成。其中，阳爻称“九”，阴爻称“六”。此说，源于《周易》筮法。根据《周易·系辞上传》记载：“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一、三、五、七、九，为天数，又称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地数，又称阴数。天数之和，为二十五，地数之和，为三十。《周易》筮法，始于天地之数。”

据现代易学家金景芳、吕绍纲先生考证，所谓“大衍之数”，即天地数的总和，即十个自然数之和，为五十五。而筮法是人为了。用49根蓍草行筮，是因为49根经过四营三

易的结果才能得出七、八、九、六这四个数^① 在这四个数中，七、九是阳数，六、八是阴数。七为少阳，九为老阳，八为少阴，六为老阴。按照古代人的数学观念，阳数以进为大，九为阳数之老，无处可进乃退，退而变八，阳变为阴，故而九为变爻；阴数以退为大，六为老阴，无处可退乃进，进而变七，阴变为阳，因而六也是变爻。

乾卦，乾上，乾下，六爻皆阳。在行筮的时候，若所得之数全是九，由于九是变爻，乾卦就要变为坤卦。六爻都是九，谓之“天德”，即至纯、至萃、至精之德。乾卦六爻全部用九而不用七，谓之“用九”。这时候，乾卦处于乾坤转变的关键时刻，不可为首。人处在这种时候，亦当顺其自然，遵守三极之道，不可枉自为首。《周易·乾·用九》曰：“见群龙无首，吉。”《周易·象传》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周易·文言传》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不是指的某一爻，而是包括乾卦的六爻在内。故而称“天下治”，即天下大治。“用九”，是说应当善于运用阳刚变化之客观法则，即要刚柔相济、宽猛相济；掌握并运用了“用九”的法则，方可做到天下大治、天下太平。

也许是一种巧合，在北宋邵雍的所谓“先天八卦图”（又称“伏羲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又称“文王八卦图”）中，都蕴含着一个“九”字。例如：在“先天八卦图”

^① 金景芳、吕绍纲著：《周易全解》，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第485-490页。

中，八卦的方位与其卦序之间，有如表 21 的对应关系。

表 21 “先天八卦”卦序数字的方位分布对照表

卦名	离	坎	乾	坤	震	巽	兑	艮
方位	正东	正西	正南	正北	东北	西南	东南	西北
卦序	三	六	一	八	四	五	二	七

在表 21 中，任何对称方位上的两卦的卦序数目（俗称卦数）之和，均为“九”。

在“后天八卦图”中，八卦的方位与其卦序之间的对应关系如表 22。

表 22 “后天八卦”卦序数字的方位分布对照表

卦名	乾	兑	坤	离	巽	震	艮	坎
方位	西北	正西	西南	正南	东南	正东	东北	正北
卦序	一	八	二	七	六	三	五	四

其中，以乾卦为起点，按照逆时针方向数去，直到坎卦为止，每相邻两卦的卦序数目之和，也都是“九”。个中之奥妙尚不得而知。中国古代以所谓“真龙天子”自居的君主，为了宣扬其天德，大都对“九”抱有明显的特殊兴趣。

● 象征用九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历来习惯于用“九”及其倍数作象征。其中，所涉及的领域和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例

如：

一、天高九重。

九为老阳之数，九九谓之重阳之数。高为阳，低为阴。在中国历史上，最常见的用法，就是以“九”或“九九”之数，作为至高无上之“天”的象征，即把天称作“九重”、“九天”或“九霄”。战国时期，在《楚辞·屈原·天问》中，就有“圜则九重，孰营度之”的发问。意思是，圆形天体有九层，是谁的设计经营？明代，在明文渊阁大学士张治的七言绝句中，有所谓“大明宫阙九天开，中使传宣殿里来”的诗句；在田霖的诗句中，有所谓“宫漏漫从三殿报，炉烟别向九霄多”的描述^①。这里所说的“九天”、“九霄”，与“九重”的意义相同。“九重”，又称“九成”。汉代马季长（融）《长笛赋》：“托九成之孤岑兮，临万仞之石蹊。”郭璞注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数之多也。”《孙子兵法》十三篇中，第八篇为“九变”，即多变之义。

在中国的农历中，九月初九谓之“重阳节”，以九九重阳之数来形容深秋之天高。此外，按照中国的民俗，从冬至开始计阳气上升之日数或冬去春来之日数，有所谓“九九消寒图”。据明代刘侗、于奕正的记载：“日冬至，画素梅一枝，为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尽而九九出，则春深矣，

^① [清] 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726页。

曰九九消寒图。”^①明代宫中，盛行“九九消寒图”。据《酌中志》记载：“冬至节，宫眷、内臣室中，贴司礼监刷印‘九九消寒图’。”据《养吉斋丛录》：“道光初年，御制‘九九消寒图’，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字皆九笔也。懋勤殿双钩成幅，题曰：‘管城春满’。内直翰林诸臣按日填廓，细注阴晴风雪，皆以空白成字，工致绝伦，每岁象沿，遂成故事”。《逸农笔记》也有类似记载：“道光朝，宫中作‘九九消寒图’。成庙书‘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字各九画，每日书一笔，至八十一日始毕。宫人皆效为之。”^②

二、韶乐九成。

《尚书·虞夏书·益稷》曰：“《箫韶》九成。”《箫韶》，是舜时的乐曲名，又称韶乐。“九成”，郑玄曰：“成，犹终也。每曲一终，必变更奏。故《经》言九成，《传》言九奏，《周礼》谓之九变。”意思是说，演奏古乐曲时，奏完一曲为之一成，又叫一奏，或叫一变。九变而乐终，至九成完毕，称为大成。

三、天保九如。

古人在祝贺福寿绵延不绝的祝福之辞中，曾经连续用了九个“如”字：“如山如皋，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

^① [明]刘侗、于奕正著：《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版，第70页。

^② 《清官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552页。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诗经·小雅·天保》）。以“天保九如”为祝寿之辞，寓意万寿无疆。

四、天子九赐。

相传，古代的帝王赏赐大臣的器物有九种，称作“九锡”。“锡”，与“赐”同。《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诏书中，有“乃加九锡”语。在不同的古籍中，关于九锡的名目大同小异，排列的前后顺序也不尽一致。^①

五、官分九品。

据《国语·周语》记载：“外官不过九品。”《汉书·古今人物表》把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周代，官有九等之命。自魏、晋开始，立九品之制。文、武官员的九品之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

六、天子九贡。

周代的时候，征纳贡物有九种名目，称作“九贡”。《周礼·天官·大宰》：“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一曰祀贡，二曰宾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旃贡，九曰物贡。”这种以“九”为定数的纳贡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按照从清太宗时期延续下来的定制，蒙古喀尔喀各部每年要向清朝皇帝进贡“白驼一，白马八”，

^① 《辞源》，商务印书馆，1983年12月第1版，第109页。

谓之“九白之贡”^①。后来，对不同地方纳贡数目的增减，也都是按“九”的倍数来规定的。例如，清康熙十三年（1674年）曾题准：每年过节，科尔沁等十旗，共进十二“九”之数的贡物，计有羊一百零八只、乳酒一百零八瓶；鄂尔多斯六旗、吴喇特三旗，共进九“九”之数的贡物，计羊八十一只、乳酒八十一瓶；其余二十五旗，共进三“九”之数的贡物，计羊二十七只，乳酒二十七瓶。

七、九九大庆。

为了显示“天子”的至尊至贵，在重大的庆典中所用的食品等方面，也往往以“九九”之数为最高规格。清代宫廷的年节大宴，包括水果、蜜饯、点心等，共计九十九品。清代皇帝过生日即所谓万寿日，要举行盛大的娱乐活动，共有“九九”八十一一种节目，叫做“九九大庆会”。据清《内务府奏销档》记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内务府为帝天花，呈进供品红喜字酥九盒，红太史饼九盒，红鼓盖九盒，苹果九盒，百合九盒，春桔九盒，炉猪九盒，熏肘九盒。”在这里，同治皇帝享用的是八九盒。据清末《宫中档差务杂录》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万寿，总管内务府大臣于初八日进九九盒。……清代皇帝每年万寿日，皇太后万寿暨皇后千秋正庆，内务府大臣例进九九盒。慈禧晚年万寿，虽非正庆，亦进九九盒。盒数为八十一，内各装

^① 清代官史研究会编：《清代官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60页。

吃食。”此外，皇帝在敕建寺庙时，铸佛之数量与重量，也往往以“九九”之数为最高品位。例如，清代，在乾隆皇帝的六十寿辰的时候，蒙古王公为给皇帝祝寿，共铸造了“九”尊无量寿佛，供在承德博仁寺宝相长新殿内。后来，为了庆祝乾隆皇帝的七十二寿辰，诸内外王公、文武大臣人等，共计铸造了二千二百九十九个“九”即两万零六百九十一尊佛。^①

八、君子九德。

古时候，检验一个人的行为，以九种美德即所谓“九德”为最高准则。据《尚书·虞夏书·皋陶谟》记载，“九德”包括：“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意思是说，“宽宏大量而又谨小慎微，性格温和而又独立不移，老实忠厚而又严肃庄重，柔和驯服而又刚毅果断，为人耿直而又待人和气，志向远大而又注重小节，刚正不阿而又实事求是，坚强不屈而又符合道义”。此外，在《逸周书·常训》、《逸周书·文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国语·周语下》等古籍中，都有关于九德的记载，内容随文而异。

九、君子九思。

孔子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① 劳伟勋编：《博采珍闻》第三辑，广西人民出版社，第75—76页。

(《论语·季氏》)。意思是说,“君子有九件需要认真思考的事情:看的时候,要想一想看清楚了没有;听的时候,要想一想听清楚了没有;自己的脸色,要想一想保持温和了没有;自己的态度,要想一想做到谦恭了没有;说出话来,要想一想做到忠实诚恳了没有;做出事来,要想一想做到认真敬业了没有;疑惑的时候,要找出具体的问题,进而去虚心地请教他人;忿怒的时候,要想一想可能引起的后患,以反身修德、自我克制;看见有利可得的时候,要想一想得到它是否合乎理义。”在这里,孔子用“九思”强调了君子在素质修养方面应达到的最高境界。

● 建筑用九

在传统建筑特别是皇家建筑中,用“九”作象征之处就更多了。兹简述如下。

一、京城规划,以九象天。

关于王城的建筑形制,早在《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这部古籍中,就有如下明确的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匠人营国”,是指建筑工匠丈量土地建筑都城。“方九里”,是说王城之规模,为东、南、西、北四面每边各九里。“九经九纬”,指城内南北(经)、东西(纬)方向,各有九条道路。“经涂九轨”,指纵、横方向的道路的宽度均为车轨的九倍。此外,其中还规定:“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王城之制,“内有九室,九

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九卿治之。”这里，从建筑到管理，均以“九”为准。

在中国的神话中，天帝所居之紫微宫开设有“九门”。唐代诗人李白就有“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扣关阍者怒”的诗句（《李太白诗·三·梁甫吟》）。依照古制，天子所居之宫城正面中轴线上的城门，也有九门，以象九天。《楚辞·九辩》曰：“君之门以九重”。其“九门”，由里而外分别为：路门、应门、雉门、库门、皋门、城门、近郊门、远郊门、关门（参见《礼记·月令·季春之月》“毋出九门”郑玄《注》）。后人又用“九门”、“九重”或“九重城阙”，泛指皇宫或京城。皇宫正门之前，又称作“九龙口”。唐代诗人李商隐在《隋宫》中，有“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的诗句；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的诗句。后来，在元代欧阳原功的诗中，也有“丽正门当千步街，九重深处五云开”的句子。到元末明初，元朝的故宫业已冷落。这时候，明代文渊阁大学士宋讷在《壬子秋过元故宫》诗中，又有“九重门辟人骑马，万岁山空树集鸦”的诗句。这里所说的“九重”或“九重城阙”，均指帝王所居之京城。

明、清北京城的内城，就开设有九座城门，并设有九座旗炮房。九座城门各有不同的用途：南面有三座城门，正中间的正阳门（俗称前门）只供皇帝出入。一般说来，皇帝也只是在冬至祭天的时候，才乘大驾由此出入。据《震垣识略》记载：“正阳外门设而不开，惟大驾由之。月墙东西设

二洞子门，为官民出入”。左面的崇文门，走酒车（称作酒道）；右面的宣武门，明代为点兵选将出入之门，清代走押送犯人的囚车。北面有两座城门，左面的德胜门，走帅师出征和得胜归来的军队（打败仗回京也走德胜门，这次没有得胜就下次得胜）；右面安定门，走粪车（称作粪道）。东面有两座城门，左面的东直门，走运木材、木炭的车（称作柴道），右面的朝阳门，走运粮食的车（称作粮道）。西面有两座城门，左面的阜城门，走运煤的车（称作煤道）；右面的西直门，走给紫禁城送水的车（称作水道）。明、清北京城内外，还有皇家的九座祭坛：祭天的天坛；祭地的地坛；祭太阳神的日坛；祭二十八宿和其他星辰的月坛；祭山川的先农坛；祭云雨雷神的天神坛；祭天下山神的地祇坛；祭蚕神的先蚕坛；祭土地神和五谷神的社稷坛。从明、清紫禁城内的太和殿正面，由里而外，从紫禁城到皇城有太和门、午门、端门、天安门、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辛亥革命后称中华门）等五座城门，再加上作为内城正门的正阳门两重，以及外城中轴线南端的永定门两重，共计“九重门”。据《南苑册》记载：清代，还将南苑的城门增至九个：正南叫南红门，东南叫迥城门，西南叫黄村门；正北叫大红门（又称北红门），稍东叫小红门；正东叫东红门，东北叫双桥门；正西叫西红门，西北叫锁国寺门。古代的皇宫，在平面空间的划分上，也往往采取“九进”院落之最高规格。后来，由于皇帝对孔子的尊崇和抬举，山东曲阜的孔庙也被特许以

“八进”之制，孔府中路则有十一进院落。^①

二、皇家建筑，以九为尊。

在京城中单体建筑的形制上，用“九”作象征之处，也很普遍。例如，明、清北京城内城以里，处于南北中轴线上的重要建筑物，如，正阳门、天安门原来的建筑高度，均为九丈九尺。正阳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的中间重楼，以及太和殿、保和殿、乾清宫、坤宁宫等宫殿，均为九开间。其中，以太和殿的规格最高。由于太和殿是重檐庑殿顶（即前后左右四面均为斜坡的屋顶），因而，其屋顶有正脊一，垂脊八，共有“九”道脊。一道正脊的两端与八道垂脊的下端，各有一个龙头吻，共计十龙，有所谓“九脊封十龙”之称。其殿宽为九开间，而且，每间有九柱。所谓“太和殿殿九楹，每楹朱漆柱九”^②。现在人们看到的太和殿为十一开间，这是因为在清代改建时，将东西两面的廊子包进去的缘故。中和殿，虽然没有九开间的殿宽，但仍蕴含着一个“九”字。据《大清会典》：“中和殿，纵广各三间”。“纵广各三间”，三三见九，实际上就是九间。交泰殿，制与中和殿同。甚至，连乾清宫后暖阁的间数以及皇帝睡觉时所用的床数，都离不开“九”字。据《宙载》：“明代乾清宫后暖阁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359-360页。

② 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50页。

凡九间，有上有下，上下共置床二十七张（即三九之数——引者注），天子随时居寝，制度殊异。”北京紫禁城的四座角楼，均为九梁十八柱（两个九）、七十二（八个九）道脊，共计为九九之数（十一个九）。此外，明、清时期，城门、院门等，每扇大门上的门钉的数目也有严格的规定。其中，以“九路”门钉，即九行、九排共计八十一颗门钉为最高规格。在雕龙照壁中，龙的数目有三、五、七、九之分。其中，最高的规格为“九龙壁”。如，北京紫禁城东路的九龙壁、北海公园内的九龙壁、山西大同的九龙壁等。北京紫禁城内的九龙壁上有九条巨龙，它们是用二百七十块（三十个九）七色琉璃瓦拼接而成；壁顶斗拱之间采用了四十五块（五个九）龙纹拱板。紫禁城的四个角楼，皆为九梁十八柱（两个九）七十二道脊（八个九），加起来正好是九十九（十一个九）。颐和园中的十七孔桥，同样蕴含着一个“九”字。即，无论从桥的哪一端开始向中间数去，处于正中间位置的最大石孔，都是第“九”孔。

三、天坛建筑，处处用九。

在单体建筑中，天坛内的主体建筑，可谓精心“用九”之典范。例如，天坛中的祈年殿，殿高九丈九尺，象征九重天。基座三层，每层九级台阶。明代的时候，祈年殿东、西两庑的配殿各九间，后来又建有二十七间（三个九）配殿。直到清乾隆年间，才撤去东西两重庑。在祈年殿东北面，又

有曲尺形长廊七十二间（八个九），俗称七十二连房。^①

至于取象于天的天坛圜丘坛，则更是一座巧妙“用九”的奇特建筑。圜丘坛为三层圆形建筑。其上层的中心，是一块圆形石板，谓之“太极石”，又称“天心石”。太极石周围，镶嵌着从一九到九九之数的扇形石板。即，扇形石板分布为九圈，第一圈有九块，第二圈为十八块，直到第九圈为八十一块。明嘉靖年间，当圜丘坛落成时，就有人在贺词中说，圜丘坛的建筑完全仿效了《太玄经》之规定，即：“九九”之数，象征“九重天”。一九，象征第一重日天；二九，象征第二重月天；三九，象征第三重金星天；四九，象征第四重木星天；五九，象征第五重水星天；六九，象征第六重火星天；七九，象征第七重土星天；八九，象征第八重二十八宿天；九九，象征第九重宗动天，即上帝的起居室。圜丘坛的中间一层与下面一层，均以其上层坛面为中心，镶嵌着九重扇形石板。每一重扇形石板，都是九的倍数。整个圜丘坛，以其三层坛面中的“九九”之数，把个“九重天”的意境，表达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明代的时候，就连天坛南天门西边望灯台上的望灯杆，都注意用九。此杆创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杆长为营造九丈九尺九寸。清雍正八年，将杆长改为营造尺九丈。

① 陈文良、魏开肇、李学文：《北京名园趣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3年6月第1版，第158页。

飞龙在天，九五至尊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每一卦有六个爻位，自下而上依次称作“初、二、三、四、五、上”。阳爻称九，阳爻居五爻位称作“九五”。九五，上卦居中，阳爻阳位，得中得正，其位至尊至贵，又称作君位。因而，刚健中正之“九五”，在每一卦中都是最好的一爻。乾卦中的“九五”，尤其尊贵。乾卦九五，刚健中正，纯粹而精，既有君德又有君位。乾卦六爻皆以龙为象，龙自下而上，由“潜”而“见”，由“惕”而“跃”、而“飞”。至“九五”，龙已经飞上了天。“九五”的爻辞也最为吉利，所谓“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以人而论，九五德高位高，已达到了圣人的境界。《周易·象传》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此处，“大人”释“龙”字，“造”释“飞”字。《周易·文言传》曰：“飞龙在天，上治也”、“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所谓“上治”，即居上以治下。“位乎天德”，是指的既有君位又有君德。位乎天德之君主方可上治。“九五”之数，在易学中所处的这种至尊至贵的地位，及其在政治文化方面的上述内涵，使得中国古代许多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君主，都热心于以“九五至尊”而自居，借以标榜其君德、炫耀其君位。因而，“九五”之数，就成了皇家建筑中数理象征的一种最佳选择。

在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中，“九五至尊”的象征，主要

体现在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的一些重要建筑物上。

皇城的正门天安门，辟五阙，重楼东西广九楹，南北进深五楹，彤扉三十六，前临御河（又称外金水河），跨石梁（外金水桥）七座。“广九楹纵五楹”，以象“九五至尊”；“彤扉三十六”与“石梁七”，象征“三十六天罡”与“北斗七星”。上述之九、五、三十六、七等数字，合在一起，就象征着以往钦天监俗称之“罡星朝拱，九五天安”^①。所谓“罡星朝拱”，是把君主比喻为北辰（北斗星），以宣扬其君德。因为，孔子曾经说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所谓“九五天安”，是说有君德之圣人居于“九五至尊”的君位，普天之下平安无事。

端门、午门，也都有“九五至尊”的象征。端门，是紫禁城的重门。其建筑形制与天安门同，辟五门、上覆重楼九楹。紫禁城的正门是午门，上覆重楼五座，又称五凤楼。其正中面南之城楼，广九楹。紫禁城内，规格最高之大门为太和门。“太和门，广宇九楹”，门前“玉河（即内金水河——引者注）环绕，金水桥五座”^②。太和门内，是紫禁城内最高大的主体建筑，即外朝之太和殿。其原来的设计为广九楹、深五楹。内廷大门为乾清门，“乾清门，广宇五楹，中

① 魏建功等著：《琐记清官》，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57—158页。

②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官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89页。

门三陛三出，各九级”。内廷中最高大的建筑“乾清宫广九楹，深五楹”。这些建筑，均以“九五至尊”为象征。

若将这些“九五”之数的重要建筑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从皇城的正门（天安门）起，经紫禁城的重门（端门）、正门（午门），到紫禁城内的主体建筑（前朝的太和殿、内廷的乾清宫）止，“九五”之数一路呼应，把个“天子之居”的至尊至贵形象烘托得活灵活现。

顺便提一下，位于紫禁城内东路宁寿宫最南端坐南朝北的九龙壁，也含有“九五”之数。宁寿宫，是清代乾隆做太上皇时居住的地方。其“宫殿规制仿正宫正殿，全宫亦分中、东、西三路。宁寿宫南面之“皇极殿仿保和殿一座，计九间”。“宁寿宫，官制如坤宁宫”。皇极门对面的这座“九龙壁”，建造于清代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上面的九条龙分为五组，共有蓝、白、紫、黄四种颜色，如图21示意。

在图21中，黄颜色的龙有三条，其余颜色的龙各有两条；以正中间的黄龙为中心，左右各有四条蓝、白、紫、黄相间对称布局的行龙。除了居于中央之位的黄龙为正面的蟠龙以外，其余八条都是上下翻腾，姿态各异的侧面行龙。正中间的这条正面黄龙，无论从九龙壁的哪一端数去，都居于第五位，即居于“九五至尊”之位。此外，这座九龙壁的歇山顶上有五道脊，其正脊上雕饰着九条龙，各攒斗拱之间的拱眼壁，均用“九五”之数即四十五条龙来装饰。这种运用双重的“九五”之数作为象征的建筑语言，进一步强调了“真龙天子”的至尊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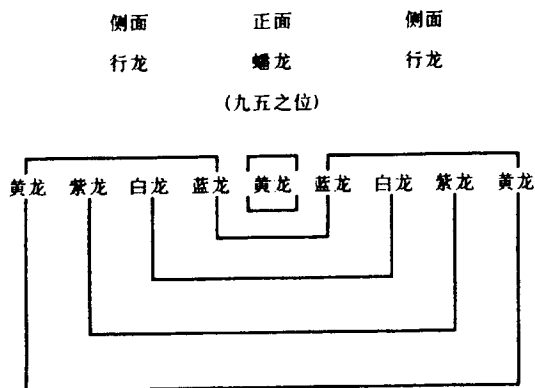


图 21 北京紫禁城九龙壁九条巨龙排列顺序示意图

此外，在北京北海的九龙壁、山西大同的九龙壁上，处于“九五”尊位者，也都是黄色巨龙。

至哉坤元，用六永贞

《周易》六十四卦，以乾、坤二卦为根本。乾卦象天；坤卦象地。天地合气，而万物生焉。“大哉乾元”（《周易·乾·彖传》），天之体无所不包；“至哉坤元”（《周易·坤·彖传》），地之体广而有限。乾之德“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传》）；坤之性“厚德载物”（《周易·坤·象传》）。乾卦刚健；坤卦柔顺。乾卦“万物资始，乃统天”（《周易·乾·彖传》）；坤卦“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周易·坤·彖传》）。乾卦六爻

皆阳，坤卦六爻纯阴。阴爻称六，已如上述。坤卦之卦体六爻皆六，坤卦之卦德顺天承乾，故有所谓“六六大顺”之称。大顺者，乃顺天承乾也。其顺承之性，犹如“牝马之贞”（《周易·坤》）。所谓“牝马之贞”，是指母马性情温顺、任劳任怨、静中有动、善于负重的优良品质。牝马之性，静如慈母而动如脱兔，忍辱负重而日行千里。从行筮过程来看，如上所述，若行筮之结果六爻皆为六，六为老阴之数，无处可退，进而变七，阴变为阳，坤变为乾。坤变为乾，仍然要保持坤之德。以人而论，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要能够做到：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所谓“坤至柔而德也刚，至静而德方”（《周易·坤·文言传》）。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善于“用六”，而不要为“六”所用。而善于“用六”的关键性原则，就是“利永贞”（《周易·坤·用六》）。即永远坚守正道，方可获得吉利的结果。“用六永贞，以大终也。”（《周易·坤·象传》）

上述坤卦之“六六”与“用六”的哲理，在讲究上下尊卑关系的皇家建筑中，最生动的体现就是位于坤宁宫左右两侧的东六宫和西六宫。

东六宫和西六宫，明代是皇帝的妃嫔居住之所，清代为后妃所居。所谓“三宫六院”的“三宫”，指的就是内廷中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又称后三宫；“六院”，指的是东、西六宫。作为中宫或正宫的坤宁宫，是只有皇后才有资格居住的地方。顾名思义，坤宁宫的命名已经表明了皇后所应当具备的顺天承乾之坤德，按照古代的伦理观念：坤顺

乾，则宁。在中国历史上，君主妻妾成群，由来已久。据《礼记》记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传说中的所谓天子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看来并非虚言。秦始皇统一天下，改天子为皇帝，以后，“六宫”数额一脉相传。汉、唐时期，在后妃以下，均设宫宦女职达数百人。明代朱元璋鉴于历代宫女过多之教训，曾经规定六宫定制及宫女出入制度。明洪武年间，在南京所建的故宫中，其内廷为东、西各三宫，合称六宫。但是，即便如此，明宫内的宫娥彩女仍然很多。到了明末，由于皇帝在生活上的穷奢极欲，明宫内的宫女多至九千人。清代，按照康熙以后的规定，“皇后居中宫；皇贵妃一、贵妃二、妃四、嫔六，贵人、常在、答应无定数，分居东西十二宫”（《二十五史·清史稿·后妃传》）。尽管在不同的朝代，对于后妃的人数有着不同的规定，但是，各朝对于后妃的坤德，都有着极其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在后宫的建筑形式上，也有所体现。

明代嘉靖年间，世宗朱厚熜曾经对北京紫禁城内及北京地区的皇家建筑有过较大的增改，史称嘉靖改制。嘉靖十四年（1535年）五月，因西六宫之一的未央宫为其生父兴献帝的发祥之地，遂改为启祥宫，并将东、西六宫中的长宁宫改为景仁宫，长寿宫改为延祺宫，永安宫改为永和宫，长阳宫改为景阳宫，长乐宫改为毓德宫，万安宫改为翊坤宫，长春宫改为永宁宫，寿昌宫改为储秀宫，寿安宫改为咸福宫，咸熙宫改为咸安宫。“钟粹宫，明代初曰咸阳宫，……隆庆

间始更名钟粹宫。”^① 明代“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复更永宁宫曰长春宫”，“长乐宫更名毓德宫，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又更名永寿宫”，东六宫的“永宁宫，崇祯五年八月更承乾宫”^②。明代晚期，又将延祺宫改为延禧宫。清末慈禧当政时期，又将启祥宫改为太极殿。明代的东、西六宫，虽然历经易名，但其建筑形制并未变动。

从东、西六宫的建筑布局来看，它们各有六座院落。而且，这六座院落，又分为前后三排，每一排都被南北方向的虚轴（即东、西二长街）分为东、西两座院落。从而呈现出东、西两个三画卦的坤卦形式。这两个三画卦，共有六个阴爻所组成。而阴爻又称“六”，六个阴爻即暗含有“六六”之数。因而，“六六大顺”的顺天承乾之坤德，可视为其建筑布局的思想内涵。经过历次易名之后，东、西六宫的中间一排靠近中宫（又称正宫）的两座院落，格外引人注目。它们的名称分别为“承乾”、“翊坤”。“承”，是以下对上而言的，是承载、承受的意思。“承乾”，是指坤顺天承乾，寓意位居中宫和两宫的后妃应当顺承天子。“翊(yì)”，是辅佐、帮助的意思。“翊坤”，寓意两宫妃嫔应当辅佐、协助位居正宫或东宫的皇后。这两宫的命名，犹如画龙点睛一般，概括

^① 《清宫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696页。

^② [清]于敏中等编纂：《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529—532页。

地说明了东、西六宫的主人所应当具有的坤德。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又在“承乾宫”和“翊坤宫”的前殿，分别题写了“德成柔顺”和“懿恭婉顺”的匾额。这两个匾额，更进一步强调了对坤德之柔顺的严格要求。自明末以来，“承乾宫”、“翊坤宫”的名称始终未变。清代晚期，虽然对东、西六宫进行了一些改建，但其原来的整体布局，至今仍然依稀可见。

明代末年，北京紫禁城内廷之东、西六宫的建筑布局，及其多次易名之后的名称（圆括号内为最后一次更名前的原名），如图 22 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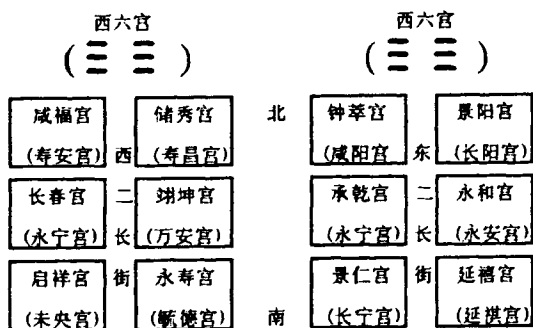


图 22 明末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平面布局示意图

阴阳象数，法地则天

在十个自然数之中，奇数一、三、五、七、九为“阳

数”，又称“天数”；偶数二、四、六、八、十为“阴数”，又称“地数”。建筑的“法地则天”，亦表现为法天地之数。

● 圜丘方泽，阴阳分明

明嘉靖九年，在北京的北郊建造方泽（地坛）以祭地，在南郊原来的天地坛内建造圜丘（天坛）以祭天。在圜丘、方泽的建筑设计中，对天、地之数的运用，有着严格的区别。专门用来祭天的圜丘坛，只用“天数”，不用“地数”；专门用来祭地的方泽坛，只用“地数”，不用“天数”。其中，圜丘坛的建筑，在运用“天数”的思路和技术上，尤为巧妙。

据《北京名园趣谈》，古代的工匠，在圜丘坛的建筑中，为了保证纯粹的“天数”而不掺一个“地数”，全部结构都是用鸳鸯尺丈量出来的。所谓的鸳鸯尺，即古尺与今尺混合使用。当时的今尺叫做营造尺，古尺在名义上是所谓周尺，实际上是清康熙年间圆明园蒙养斋“内算学”的教习们所编写的《御制律吕正义》中所说的周尺。具体的解决办法是，用古尺丈量三层台面的直径，用今尺丈量坛台的高度。最高一层台面的直径是古尺九丈，名为“一九”；中间一层台面的直径是古尺十五丈，名为“三五”；最下面一层台面的直径是古尺二十一丈，名为“三七”。这个丈量法，将一、三、五、七、九等五个“天数”全部用尽。而上、中、下三层台面的直径总和为古尺四十五丈，这理又包含了“九五”之

数。圜丘坛三层台面上所嵌的石板的圈数和块数，均为九的倍数。上层台面从中心石向外数，第一圈石板为“一九”之数即九块；第二圈石板为“二九”之数即十八块；……依此类推，至第九圈石板为“九九”之数即八十一块。上层台面，合计为四十五个“九”即四百零五块。中间一层台面由里向外数，第一圈为九十块石板，然后以“九”块石板之数逐圈递加，至第九圈为一百六十二块石板。中间一层台面，合计为一百二十六个“九”即一千一百三十四块石板。下层台面由里向外数，第一圈为一百七十一块石板，然后以“九”块石板之数依次递加，至第九圈为二百四十三块石板，合计为二百零七个“九”即一千八百六十三块石板。

到了清代，圜丘坛各层四周的雕花栏板数，也符合最大的天数“九”的倍数。上层台面上，每一面的栏板数为十八块，由二个“九”组成；四面共计七十二块，由八个“九”组成。中间一层台面上，每一面的栏板数为二十七块，由三个“九”组成；四面共计一百零八块，由十二个“九”组成。下层台面上，每一面的栏板数为四十五块，由五个“九”组成；四面共计一百八十块，由二十个“九”组成。上、中、下三层台面上，合计每一面的栏板数为九十，由十个“九”组成；四面的栏板数共计为三百六十块，由二十个“九”组成。三百六十块，恰好符合历法中一周天的三百六十度。

与圜丘坛相反，方泽坛（地坛）的建筑，全部都用“地数”（阴数）。方泽坛分为上下两成（层）。“上成方六丈，下

成方十六丈六尺，均高六尺。上成正中六六方，外八八方，均以八八积成”。“砖用六八阴数，黄色琉璃，青白石砌，四击陛各八级”。“护坛地一千四百七十六亩”。^①

●朝日夕月，阴阳各异

朝日坛（又称日坛）西向，一层。日坛西向，意味着祭祀者在祭日的时候，面向太阳升起的方向。据《春明梦余录》记载，“坛方广五丈，高五尺九寸，坛面用红琉璃，阶九级，俱白石”。

夕月坛（又称月坛），坛东向，一层。月坛东向，意味着祭祀者在祭月的时候，面向月亮升起的方向。月坛“方广四丈，高四尺六寸，面白琉璃，阶六级，俱白石”，而且有“护坛地三十六亩”。朝日坛全用奇数即阳数；夕月坛全用偶数即阴数。

不仅如此，到了清代，皇帝亲自祭日和祭月的时间也分阴阳。皇帝只在十天干中的阳数之年亲自祭日，阴数之年则委派大臣代为祭天。在十天干中，甲、丙、戊、庚、壬为阳，乙、丁、己、辛、癸为阴。据《大清会典则例》记载：皇帝祭日，隔一年亲祭一次，甲、丙、戊、庚、壬年，皇帝亲祭，“余年遣官致祭”。据《明嘉靖祀典》记载：皇帝从十

^① 岱岳编：《北京趣闻 1000 题》，中国旅游出版社，第 20-21 页。

二地支的阴数之年即丑年开始，以后每隔三年在阴数之年与阳数之年轮换致祭；即皇帝祭“夕月坛每三年一亲祭，以丑、辰、未、戌年行事”，余年委派大臣致祭。清袭明制。

● 宫殿建筑，阴阳有序

明、清北京宫城的建筑，在阴阳象数的运用方面非常讲究。这里仅就其中轴线上的一些主要建筑为例，作如下探讨。明、清时代北京的皇家建筑，就其总体而言，是逐步完善的，也是越来越讲究的。这一点，我们从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城门门阙、城门重楼、宫殿、宫门建筑之开间数量的分布，就可以看出些眉目。

其一，位于全城中轴线上的皇城城门、紫禁城城门、紫禁城内的宫殿大门的门阙数，及其门楼的开间数，甚至连紫禁城内砌地砖的层数在内，均为三、五、七、九等阳数。

大清门（明代称大明门）正中三阙。天安门五阙，上覆重楼九楹、进深五楹。端门五阙，上覆重楼九楹。午门五阙，上覆五凤楼，正中面南重楼九楹，角楼四座，每座纵、广各三间，每座共九间，含五个九，还有两侧长房各十三间。太和门九楹、三门；太和门左侧之昭德门，连廊共五楹；太和门右侧之贞度门，连廊五楹。乾清门，广五楹；坤宁门，东、西两庑各有九间房。神武门三阙，门楼五楹。在前朝三大殿中，太和殿，广九楹（清代扩展为十一楹）、进深五楹。中和殿，为仿效明堂形制而建，纵、广各三楹，

“连廊共五间”。保和殿广九楹。在后廷三座宫殿中，乾清宫广九楹、进深五楹。交泰殿制如中和殿，纵、广各三楹，连廊共五间，五五二十五间，为“一、三、五、七、九”五个“天数”之和。据清代乾隆年间高宗《交泰殿宝谱叙》，连交泰殿内所贮放的国家玉玺也定为二十五枚，所谓“国朝受天命，采古制为玺，……今交泰殿所贮，历年既久，记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爰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坤宁宫，广九楹。此外，据文献记载，明代在建筑北京紫禁城的时候，“紫禁城内砌地砖横竖七层”。这种用纯阳数来处理宫城中轴线上全部建筑的设计手法，从易学象数的角度，再三地强调了“天子”之居的至尊地位。

其二，从清代的大清门至太和门，其东西两庑的朝房，大都为阴数开间。

大清门“门内千步廊，东西向朝房各百有十楹。又折而北向，各三十四楹，皆联檐通脊。”天安门以内，至端门以外，“东西两庑各二十六楹”。“端门内东朝房五楹，为礼科公署；西朝房五楹，为工科公署。其东为太庙门，西为社稷门。迤北两庑各四十二楹，均联檐通脊，内东二十三楹，西二十楹，为部、院、府、寺、监朝房，余吏科公署七楹，户部公署九楹，在东。中书科直房六楹，兵部公署七楹，刑部公署七楹，在西。其吏科迤北三楹，……朝房北东出者为阙

左门，西出者为阙右门，……门北东西庑各三楹”^①。此外，“端门之内，……又六科公所二楹，在西。”^②。按照上述记载，除了门阙之外，端门以内的东、西两庑，共计各九十二楹。“午门内东庑二十二楹”，“午门内西庑二十二楹”。这种将南北中轴线上正中方位的宫殿及其门阙重楼，设计为阳数开间，将其两庑方位的东西朝房设计为阴数开间的处理方式，同封建王朝中所强调的君臣之间严格的上下尊卑关系，是完全一致的。

其三，在太和门内，外朝三大殿两庑，以及乾清门里，内廷乾清宫的两庑，均为阳数开间。

“太和门内东庑三十三楹，……东庑中为体仁阁，阁重楼，九楹”；左翼门“门座五间”；“太和门内西庑三十三楹，……西庑中为弘义阁，阁重楼九楹”；右翼门“门座五间”；“乾清门内北向两庑，左为上书房，右为南书房”，“上书房在乾清宫左，五楹”，南书房在乾清宫右，五楹；东庑“端凝殿三楹，西向”^③；西庑懋勤“殿三楹”^④，东向。太和殿

① 《清官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35页。

② [清]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国朝官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第186页。

③ 《清官述闻》（初、续编合编本），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第135，第136，第150，第534页。

④ 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4页。

乃皇帝大典之处，乾清宫为皇帝居住之所。这种将太和殿与乾清宫前面及其两庑的建筑物设计为纯阳数开间的处理方法，进一步增强了这两处空间的“九五至尊”之阳刚气势。

其四，同宫城中轴线上特别是皇帝工作、起居之处的殿宽、进深全部运用纯阳数开间的建筑手法相比，令人瞩目的是，内廷建筑则多用阴数。

“东、西六宫的进深多为阴数开间”^①。据于倬云先生考察：“外朝的踏跺级数、台基、坎墙的砖皮层数多用奇数”；“但内廷中的坎墙、台明、山墙、檐墙和宫墙下肩，以至踏跺的层数，多用偶数的布局方法”；“钟粹宫前殿、前配殿坎墙砌砖六层，后寝坎墙砌砖四层，坤宁宫后檐坎墙十二层，台基砖二十层，另外后宫御路台阶的阶条数也多为偶数。”^②上述各种处理方式，从不同的侧面都体现出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之阴阳有序的观念。

●景山五亭，众阴捧阳

此外，我们在位于紫禁城玄武门正北面的景山上，同样可以找到蕴含有阴阳象数的建筑语言。景山，明代称作万岁

^① 清代官史研究会编：《清代官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第1版，第260页。

^② 《禁城管缮纪》，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20-21页，第42页注。

山。据记载，万岁山是明代开挖筒子河和太液池时用挖出的泥土在元代青山的地方堆叠而成的。据《西元集》，万岁山“为大内之镇山”。景山，又俗称煤山，这是由于当初修建紫禁城时曾经在这里堆过煤的缘故。《野获编》所谓的“相传其下皆聚石炭（煤），以备闭城不虞之用”，纯系误传。据说，原来是在明代的时候，“也先南犯，于谦守城，樵汲路绝，为此说以安民心”。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法军驻在景山，“欲取煤，凿纵横二井，皆不得煤”（《大中华京师地理志》）。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年）改称为景山。据《北京形势大略》释义：“景字从日，言日在京也。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也。山形五台（五座山峰），应天五气（五方之气）捧日也”。景山有五峰，“峰各有亭，踞其颠中曰‘万春’，左曰‘观妙’，又左曰‘周赏’，右曰‘辑芳’，又右曰‘富览’，俱乾隆十六年（1751年——引者注）建。”

乾隆年间，在五座山峰上新建了这五座亭子之后，把个“景字从日，言日在京也”的意境塑造得更加丰满、更加生动了。当我们把景山的五座亭，同离它不远的北海五龙亭加以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们虽然都是以五个为一组的群体亭台建筑，但无论是从建筑手法上说还是从建筑意境上说，两者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它们的建筑外观来看，其方位一东一西、一正一偏，其位置一高一低，其布局一个是平面的一个是立体的。从它们的文化内涵来看，两者在表达天地阴阳、上下主从的内涵方面有一定的共同之处，但这两组亭子在表达同一观念的时候，所运用的建筑语言则是不相雷

同的。如果说，北海五龙亭在表达君臣尊卑的关系上，主要运用的是天圆地方的象形语言的话，景山五座亭在表达上下主从的关系上，则主要运用的是天阳地阴的象数语言。在景山的五座亭中，位于正中间山峰上的万春亭，其位置最高，规格也最高。其亭面纵、广均为五间，是一座三层檐四角攒尖式的正方形建筑。“三”、“五”，皆为阳数。而且，在“一、三、五、七、九”五个阳数之间，“五”居中央；纵、广各五间，即五五“二十五间”。“二十五”为五个阳数之和，象征着景山“景”字中的京上之“日”。但是，这里的“日”，不是实指天上之“日”，而是比喻京中之“日”。万春亭的方形重檐，已经为此作出了注脚；京中之“日”，不是指的天，而是指的天子。景山之“景”字，既是“日”在“京”上，又是“京”在“日”下。唐代诗人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就有“望长安于日下”的诗句。以后，人们就把“日下”比作京都。清代康熙二十五年朱彝尊编辑的《日下旧闻》，以及乾隆三十九年钦定的《日下旧闻考》，均以“日下”命名。其中所说的“日下”，都是指的作为京都的北京。万春亭，建在北京的中轴线上，象征着天子所居得中、得正之尊位；万春亭，建在北京城的制高点上，又象征着天子权力在人间的至高无上。此亭命名为“万春亭”，则象征着居中、得正之天子的江山万代千秋、永世流传。位于万春亭东、西两侧稍低处山峰上的观妙（东侧）、辑芳（西侧）二亭，为二层檐八柱式的八角攒尖顶。位于万春亭最外侧更低处山峰上的周赏（东侧）、富览（西侧）二亭，为二层檐六

柱式的圆形攒尖顶。这四座亭子，在重檐数和立柱数方面，均采用阴数，可以说是象征着其臣民八方来朝、其社稷圆满无缺。景山上五座亭子的这种象数分布，同它们在山峰上的位置分布，及其所象征的上下主从关系，都是一致的。

● 干支象数，阴阳对应

中国古代在天文历数方面的辉煌成就之一，就是“干支纪历”法。即用“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依次组成“六十甲子”的纪年历法。干、支，与天、地一样，都是相辅相成的概念。有的学者很形象地比喻说，干、支“按字面上的意义来说，就相当于树干和枝叶，它们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整体。我国古代以天为‘主’，以地为‘从’，‘天’和‘干’相联叫‘天干’，‘地’和‘支’相联叫做‘地支’，合起来就是‘天干地支’，简称‘干支’”。

“十”与“十二”这两个干支象数，在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建筑规划设计中，也有所体现。后三宫两侧之东、西六宫，合起来为十二宫，与十二地支相符。它们在使用功能上的内在联系，及其在建筑布局上的外在体现，可作如图 23。

东六宫中间有东二长街将六宫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二长街之北端曰千婴门，南端曰麟趾门。“千婴门之北有殿五所，所谓乾东五所也”。西六宫中间有西二长街将六宫分为东西

两个部分，西二长街之北端曰百子门，南端曰螽斯门。百子门之北有殿五所，曰乾西五所。乾东、西五所，合起来为十所，与十天干相符。乾东西五所，原来均为少年皇子、皇孙居住之所在。相对于“十二地支”而言，“十天干”，属阳。以“十天干”为象征的乾东西十所，就其整体而言属阳，分开来看的乾东五所和乾西五所仍然属阳。相对于“十天干”而言，“十二地支”，属阴。以“十二地支”为象征的东、西六宫，就其整体而言属阴，分开来看的东六宫和西六宫仍然属阴。这里所运用的象征天地阴阳关系的干支象数，同乾东、西十所，以及东、西十二宫的使用功能之阴阳属性，是完全一致的。其中，十天干、十二地支与乾东西十所、东西十二宫的对应关系，采用于倬云先生的排列顺序。乾西五所中的四、五两所，即壬、癸两所，已经在清乾隆初年改建成了花园。

在图 23 中，乾东、西十所，与东、西十二宫之间的干支象数关系，也是一种乾坤关系。但是，这里所说的乾坤关系，同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上坤宁宫与乾清宫之间的乾坤关系，以及东西十二宫与乾清宫之间的乾坤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乾清宫，为皇帝所居。坤宁宫是正宫，又称“中宫”，为皇后所居。东西十二宫，为妃嫔所居。坤宁宫和东西十二宫，同乾清宫之间的乾坤关系，是一种同辈之间的夫妻关系。其中，坤宁宫与乾清宫之间，是地位最高的正宫皇后与皇帝之间的夫妻关系；东西十二宫与乾清宫之间，是级别分明的妃嫔与皇帝之间的夫妻关系。而东西十二宫与乾东西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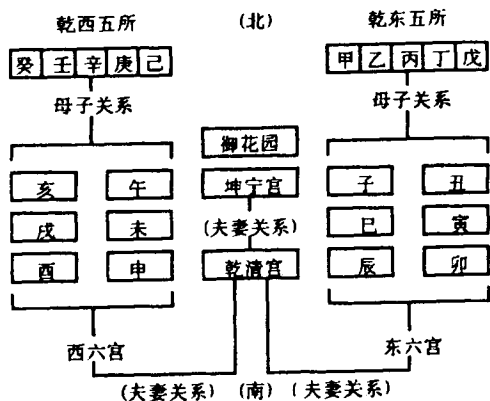


图 23 明、清北京紫禁城内廷建筑的干支象数关系示意图

所之间的乾坤关系，在本质上则是一种长辈与晚辈之间的母子关系。

鉴于中国历来有用天干、地支配合的“干支纪历”的传统，即用有限的干支相配可以计数无限的年代。因而，上述天干、地支之间的象数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乾东西十所、东西十二宫的建筑布局，就寓意着紫禁城后宫中的夫妻和谐、子孙满堂、后继无穷。这种建筑思想，已经由联系乾东西十所与东西十二宫之间的东、西二长街北端的两个宫门的命名“千婴门”、“百子门”，以及其南端的两个宫门的命名“麟趾门”、“螽斯门”所点破。

河图象数，精心营筑

《周易·系辞上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这段话，说明了圣人做《易》是以《河图》、《洛书》为法则的。此外，早在《尚书·周书·顾命》、《论语·子罕》等文献中，就有关于《河图》的记载。但是，在宋朝以前，人们对于什么是《河图》、《洛书》这个问题，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到了北宋，在刘牧的《易数钩隐图》中，才出现了用黑白点来表示的《河图》、《洛书》。但是，以后广为流传的则是由南宋哲学家朱熹所支持的《河图》（即刘牧所说的《洛书》）、《洛书》（即刘牧所说的《河图》）。

朱熹的《河图》，由天地五行生成数所构成。根据《周易·系辞上传》，在十个自然数中，奇数一、三、五、七、九，为天数；偶数二、四、六、八、十，为地数。根据《汉书·五行志》，一、二、三、四、五，谓之生数；五个生数各加五，即六、七、八、九、十，谓之成数。而且，它们与五行（又称五材）即“水、火、木、金、土”之间，又有如下关系：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这种与五行相配的天地生成数，又称之为河图象数。河

图象数，在明、清时代的皇家建筑中，有着十分巧妙的运用。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

按照传统的五行生克说，“水”能克“火”。因此，凡是运用“天一、地六”之河图象数的建筑，都同对火灾的预防密切相关。

一、六龙石雕，独出心裁。

中国建筑，属于木结构系统。紫禁城又是规模极其庞大、建筑高度集中之地，是集宫殿、门阙、亭台、楼阁于一体的建筑群体。其最大之祸患，莫过于火灾。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代皇帝为了防止宫内火灾的发生，以求“钦安”，在紫禁城北端的御花园内，建有一座钦安殿。“钦安殿祀玄天上帝”。“玄天”，系指北方之天。《吕氏春秋·有始》：“北方曰玄天”。在五方五行之中，北方属水；水能克火。“玄天上帝”又称“玄武帝君”，在道教中被尊为北方水神。钦安殿的建筑，就是按照河图象数来设计的。嘉靖年间，由于宫内多次失火。于是决定重修钦安殿，并在垣门上题写了“天一之门”，寓意“天一生水”。清代，改为“天一门”。

按照天地五行生成数之间的对应关系，“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有“天一”，就应当有“地六”。那么，这里的“地六”究竟在哪儿呢，它在建筑上又是以什么方式表达出来的呢？笔者在1992年曾经注意到，这里的“地六”，就在

“天一门”内正中间、钦安殿前的一块丹陛石雕上。在紫禁城中轴线上，其它宫殿前面或后面（如保和殿）的丹陛石上，大都雕有九条龙（共分三组，每一组一上二下共三条龙）。而钦安殿前面的这块丹陛石上，却雕有六条龙（两条龙相对为一组，从上到下共分三组）。六龙石雕，在整个紫禁城内，也是极其罕见的。坤宁宫北面倒有一块六龙石雕，其寓意为“用六永贞”、“顺天承乾”。而钦安殿前面这块六龙石雕，则是同“天一生水”相对应的。

上述设计，在建筑艺术方面，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聪明智慧；在实用功能方面，则不过是一种良好愿望的象征罢了。实际上，从明代钦安殿建成以后，直到清末，北京紫禁城内的火灾，时有发生。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因大火而烧毁了三大殿（《明卓异记》）。正统五年（1440年），重建三殿两宫。正德九年（1514年），明武宗玩火，烧毁了乾清宫，当时他还对左右取乐说：“好一棚大烟火也！”（《明武宗实录》）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乾清宫才建成。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雷雨大作，烧毁了三大殿、文武楼、奉天门、左顺门、右顺门及午门外左右廊（《明世宗实录》）。嘉靖四十年（1562年）重建而成。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乾清宫、坤宁宫又发生火灾，万历二十五年归极门（即通向武英殿的熙和门）发生火灾，延烧皇极等殿。究其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例如，明代除了雷电和皇帝玩火造成的火灾之外，还有一些宦官“既

盗库物，又纵火烧库。”^① 清末宫殿失火的原因之一，也是管事“太监串通放火，销毁证据。”^② 因而，依靠钦安殿，也未必能够保“钦安”。

二、六楹楼阁，别具匠心。

在清代北京紫禁城中，一般的宫殿楼阁，均为奇数开间的建筑。然而，位于文华殿后面的文渊阁，却是一处与众不同的偶数开间的楼阁建筑。文渊阁，“阁制三层，上下各六楹。”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据《会典事例》，其“阁制仿浙江鄞县范氏天一阁”。位于今浙江宁波的天一阁，是明代藏书家范钦的藏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也是中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藏书楼，最害怕的是火。而水能克火，取名“天一”即蕴含“天一生水”之义。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令遍访天下藏书，编辑《四库全书》。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下令仿照天一阁建造文渊阁，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此阁，以贮藏清代编辑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为了分藏《四库全书》的副本，清朝政府陆续在全国建造了六座藏书楼。其中，北京圆明园内的文源阁（建于1774年，已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文津阁（建于1774年）、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

① 《禁城营缮纪》，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49页。

② 魏建功等著：《琐记清宫》，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29页。

(建于1781-1782年),与文渊阁一起,称之为北四阁;杭州孤山的文澜阁、镇江金山寺行宫的文淙阁(已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已毁),称之为南三阁。合称清代七阁。上述建筑之形制,均与文渊阁同。

文渊阁坐北向南,前有长方形水池,上跨石梁一座,引内金水河河水注之,阁后垒石为山。其楼层数,明二暗三:最上层的外观为六开间,内部为一通间,象征“天一生水”;中间为一暗层;下面一层,为六开间,象征“地六成之”。所谓的六开间,实际上是五间半;最西头的半间,实为楼梯间。传说紫禁城内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屋中的那个半间,就是指的文渊阁西头这半间楼梯间。正如《侍文渊阁》歌词中所说的那样:“又题先天生一义,成之地六阴含阳。五奇六耦象结构,最西一架其梯枕。”

清代七阁与钦安殿的建筑,两者相比较而言,同样一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文化内涵,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真可谓各有新意,匠心别具。正如清乾隆四十一年《御制题文渊阁》中所说:“四库庋藏待,层楼结构新。”此外,清代七阁的命名,也颇为讲究。从其表面来看,清代七阁的名称,大都带有三点水,这与藏书楼防火之要义相通;从其内涵来看,这些名称又都表达了一种尊史重文的文化传统。正如乾隆在《御制文源阁记》中所表白的那样:“文之时义大矣哉,以经世,以载道,以立言,以牖民。自开辟以至于今,所谓天之未丧斯文也。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派也,

支也，流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八九门钉，精妙绝伦

一、门钉之谜的由来。

明、清北京紫禁城，有四座城门。其中，南面的午门、西面的西华门、北面的玄武门（清康熙年间改称神武门），这三座城门的每一扇大门上，均设有九路门钉即九行九列共八十一颗门钉。只有东面的东华门是个例外，东华门的每扇大门上，均为八行九列共七十二颗门钉。留意此事的人，无不为之纳闷。久而久之，就成了中国建筑史上难以解释的“北京东华门门钉之谜”。

由于“九九”之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后来曾被规定为皇家所独自享用的尊贵之数。关于门钉的数量，明代以前虽然未见有明文规定。但是，根据考古发现，明代北京十三陵定陵地宫的石门上，就已经雕刻有九行九列八十一颗门钉。从这一事实来看，有理由做出如下推测：明代北京紫禁城所用的门钉之数，已经同尊卑分明的等级制度联系了起来。清代制定的《大清会典》则明确记载道：“宫殿门庀皆崇基，上覆黄琉璃，门设金钉”，“坛庙園丘外内垣门四，皆朱扉金钉、纵横各九”。“亲王府制正门五间、门钉纵九横七”；“世子府制正门五间，金钉减亲王七之二（即减去

七分之二，为纵九横五——引者注）”；“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与世子府同”；“公门钉纵横皆七，侯以下至男递减至五五，均以铁”。清代工部《工程作法》也有类似的记载：门钉的使用，分为九路、七路、五路三种。其中，等级最高的是九路，即纵横各九共计八十一颗门钉。以下等级之门钉数量，依次为纵九横七共六十三，纵九横五共四十五，纵横各七共四十九，纵横各五共二十五。以上各路门钉之总数，均为阳数（奇数）。而北京紫禁城东华门的门钉，却使用了八九之数，即纵九横八共七十二的阴数（偶数）。仅仅从这一传统礼制来看，的确是难以理解的。于是，就出现了诸多猜测。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书籍，对此也时有提起。

二、两种流行的说法。

其中，最为流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即所谓“罪门说”与“鬼门说”。前者认为，“东华门门钉原来也是81枚。明末李自成起义，攻陷北京，明思宗朱由检（即崇祯皇帝——引者注）仓皇逃出东华门，到煤山（今景山）自缢，清初重修东华门时，将门钉减去一行责其未能挡驾之罪。”后者认为，“东华门的门钉为偶数72枚，可能与封建迷信有关。古人认为，奇数为阳，偶数为阴；人生属阳，人死属阴。因为清代几个皇帝——顺治、嘉庆、道光等，死后都是出东华门送殡，进东华门迎灵的，因而门钉用阴数，以象征

‘鬼门’。”^① 笔者经过历史的和文化的考察，已表明上述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②

三、门钉之谜的答案。

实际上，北京东华门门钉的八九之数这一特殊数目，并不是什么“罪门”的象征，更不是什么“鬼门”的象征，而是吉祥和谐的象征。现将其中之奥秘简述如下。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吉，反之为凶。紫禁城属于阳宅，即为活人居住之所。根据《阳宅三要》，决定阳宅文化环境之吉凶的要素有三，即门、主、灶。门，即院墙之大门，为出入必由之地；主，即高大的主房，为起居活动之所；灶，即灶房，为烹制饮食之地方。阳宅先看大门次看主房，按照五行方位，只要门主相生，即以吉断，相克即以凶断。又据《古营造赋》：“生出克入则凶，生入克出则吉。生克论乎其方，吉凶随乎其宅。”就是说，院墙之大门与屋脊高大之主房之间的生克关系，是决定阳宅吉凶的关键。而门、主的方位朝向，又是均系定其生克关系的关键。归根结底，决定阳宅吉凶之关键的关键，在于门、主的方位。这一理论，既适用于民居，也适用于皇宫。北京紫禁城属于阳宅，紫禁城就是它的院墙，紫禁城的四座城门就是其院墙之

① 吴弘、刘江编著：《中国名胜古迹之谜》，中国和平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第11页。

② 韩增禄：《东华门门钉之谜与中国传统文化》，《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大门。紫禁城的建筑，是对多种方位系统的综合应用。其中，与东华门门钉之谜关系最大的是正五行方位系统、十天干方位系统与河图方位系统。紫禁城在大格局上，用的是正五行方位系统，即位于东方之东华门属木，位于南方之午门属火，位于西方之西华门属金，位于北方之玄武门属水，位于正中方位之三大殿属土。按照五行之生克关系，在南北中轴线上，从南向北数，是火生土、土克水，即外生内、内克外，生入克出，属于吉宅；在东西中轴线上，从东向西数，则是木克土、土生金，即外克内、内生外，生出克入，属于凶宅。这里，在决定吉宅的因素中，生入即门生主、火生土是关键；在决定凶宅的因素中，克入即门克主、木克土是根本。因而，形成凶宅的根源，就在于位居东方的东华门。在中国的建筑中，连民居都要追求一个和谐吉祥的气氛即所谓吉宅，而忌讳凶宅，更不要说皇宫了。把皇宫建成凶宅，是要犯死罪的。然而，由于皇家既要居中而处，又要在其院墙上四面开设大门以象征其中央之地位，因此，就在建筑设计上出现了一个天大的难题。面对这一天大的难题，中国古代的建筑师和风水师，是怎样解决的呢？他们基于崇尚和谐、趋吉避凶的易学原则，以及整体思维的易学方法，采取了如下两项措施。

其一，是逢凶化吉，以避凶。也就是说，要设法避免东华门门克主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呢？有。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中国古代的建筑工匠，为了解决这一

难题，巧妙地运用了十天干方位系统、阴阳方位系统，以及河图方位系统。

十天干方位系统与正五行方位系统相配合，即所谓：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中央戊己土，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其中，天干、五行，又各分阴阳，即：

甲木属阳木，如森林之木；

乙木属阴木，如花草之木；

丙火属阳火，如盛大之火；

丁火属阴火，如灯盏之火；

戊土属阳土，如大地之土；

己土属阴土，如庭院之土；

庚金属阳金，如斧钺之金；

辛金属阴金，如首饰之金；

壬水属阳水，如江河之水；

癸水属阴水，如杯盘之水。

这里所谓的阴、阳，在量上有一个大小强弱的区别。墨子说过：“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墨子·经下》）就是说，五行之间也不是经常能够制胜的，以多胜少、以强胜弱罢了。春秋末军事家孙武也说过：“五行无常胜”（《孙子兵法·虚实篇》）。在这里，五行之间相胜（即相克）与否，有一个量的问题。比如，水能克火，然而，阴水则未必能克阳火，所谓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也。木能克土，然而，阴木则不能克阳土！这样，出路就在于将东华门所属之东方木，设计为阴木，而避免出现阳木。

那么，如何区分东华门之阴木与阳木呢？聪明的古代建筑工匠，巧妙地运用了易学象数，即用每一扇城门上的门钉数目之“阴数”（偶数）“阳数”（奇数）来区分其阴阳。就东华门来说，九路门钉即九行九列共八十一颗门钉为阳数，表示阳木或甲木，此木能克土，象征门克主，有凶宅之相，断不可采用。而采用八九之数即八行九列共七十二颗门钉为阴数，表示阴木或乙木，此木不克土，无门克主凶宅之虑。因此，在北京紫禁城的四座城门中，唯有位于东方之东华门的门钉不能用阳数，而只能用阴数。

东华门的门钉数，为什么非用八行九列共七十二这个阴数，而不用其它的阴数呢？这个问题可作如下几方面的理解：八行九列中的“九”，与前面所说的礼制等级有关，是最高等级的象征。它向人们表明：东华门每一扇城门上的门钉总数，虽然降低为阴数，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其皇家至尊地位之礼制。八行九列中的“八”，则与河图象数相吻合。按照河图象数的方位系统：

一六北方水；

三八东方木；

二七南方火；

四九西方金；

五十中央土。

其中，位居东方之天地五行生成数之间的关系是：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就是说，与“东方木”相应的“地数”或“阴数”，正好是“八”！这样，以尊卑之制而论，门钉的列

数采用了至尊之阳数“九”；以河图象数而论，门钉的行数采用了东方之成数“八”。同时，东方之成数“八”，又正好是阴数。八九之总数，避阳取阴，以象“阴木”。于是，一个天大的难题，最后就由于对河图象数的巧妙运用而被化解了。这种处理方法，一举化解了可能出现的凶宅之象，并在文化环境和建筑心理上，体现了一种和谐吉祥的气氛。

此外，东华门门钉所采取的八九之数，无论是从门钉的结构功能上说，还是从门钉的美学功能上说，也都是比较合理的，并无什么妨碍。以致于一般人若不特别留心，就很难发现其每扇门上的门钉少了一行。

其二，是固本扬和，以趋吉。为了烘托皇宫阳宅之吉祥气氛，在化解紫禁城东西中轴线上“木克土”这一凶宅之相的同时，又采取了强化紫禁城南北中轴线上“火生土”这一吉宅之相的如下措施：一个是，将中央主房即外朝三大殿建于“基崇二丈”高的象征“阳土”的高台之上。古人云：“台高多阳”（《吕氏春秋·孟春纪》）。“三”，乃象征天、地、人三极之道的阳数。故而，建三大殿于“三”层高的、“土”字形的玉石台基（又称“三台”）之上，以象征“阳土”或“戊土”。另一个措施是，通过对建筑色彩的巧妙运用，以强化“火生土”这一吉兆气氛。从正五行的色彩方位系统来说，南方“火”行为红色，中央“土”行为黄色。因而，将紫禁城以南北中轴线上的宫殿、宫门为主的绝大部分建筑，处理成红、黄二色，即红色的宫墙、宫门，上面覆以黄色琉璃瓦的色彩基调。这样，将中央主殿建于“土”字形的“三

台”之上，“阴木”就绝无克“阳土”之力了。

通过对北京东华门门钉之谜的上述分析，我们不仅看到了河图象数的妙用，而且领略了古代工匠灵活运用易学文化的智慧。